

●卷一

○成书得书难

《易》更四圣而始备；《书》历二千余年，存者仅存十八篇；《诗》之刚也，夫子十取其一；《春秋》，鲁史之名，记者非一人，其后夫子修之，左氏传之，又其后刘歆、杜预合经传而一之，然后经以传明，事以类著。经之成亦难矣。周衰极文之世，晋韩宣子适鲁，然后见《易象》与《春秋》；吴季札聘上国，始闻《诗》之雅歌颂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。士生其时，得全见六经者无几。《商颂》至正考父才得十二篇于周大师；孔子周旋杞宋间，欲究夏商遗礼而不得；刘歆言汉经秦火，书惟有《易》，至孝文时伏生始口授《尚书》，孝武时壁出者皆朽腐散绝。《诗》之萌或传《雅》或传《颂》，合而成《诗》；其后得书二十篇，以为《尚书》大传，谓为不传《春秋》。唐孔颖达曰刘向、班固、刘歆、贾逵、马融、郑玄、服虔、杜预皆不曾见今《尚书》，建安蔡氏谓杨雄亦未见《尚书》。《余按：《书》出孔壁者，皆科斗文字，凡二十五篇，号为“古文”。出伏生口授者，三十四篇，其后夏侯胜等传口洛阳石经刻之，汉号“今文”。孔壁初出，孔安国上之官，承诏总为五十八篇，作传，传成，会国有巫蛊事，不获上，壁书复湮。行于汉者，伏生三十四篇而已，故壁书世儒多不见。后有张霸者习闻《书》五十八篇之说，伪造二十五篇，并伏《书》为五十八篇。惟刘向父子所著《五行传》是其本法。郑玄注《书》依用之，多乖异。晋兴，壁书渐出，至梅颐为豫章内史，全得孔书，尽上之官，为施行壁书。方《大传》犹缺《舜典》，江左萧齐建武中，姚方兴始献《舜典》，孔传五十八篇始备。隋开皇间始流河朔，见《书疏》。但汉武至前晋凡五百余年间，歆向父子披群书甚精，不应孔书皆不传，直逮晋始得之，故或者亦疑梅颐之意。）宋杨诚斋序《易》曰：“韩起尝见《易象》而喜。然起之所见者，羲文之《易》而已，非夫子之《易》也。今乃得见起之所未见。子贡在三千七十之中尝叹：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。今夫子之《易》，性与天道之言也，乃得闻子贡之所不闻。”其述古人不得多书而读之，备矣。韩柳未出，欧阳公得韩文六卷于汉东李尧辅敝篋中，脱落颠倒无次序，乞归，读之。后官洛阳，与尹师鲁补缀方成全书。穆伯长叙柳文谓：“初不全见于世，亡字失句，阙坠为甚。凡用力二纪，文始成定。”今读韩柳者，未必察也。司马温公《进〈资治通鉴〉表》曰：“臣之精力，尽在此书”。又《与宋次道书》曰：光自到洛之日，专以修《资治通鉴》为事，于今六年，仅了得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六代，奏御。唐文字尤多，梦得将诸书年月编次为草卷，每四截为一卷，自课三日，删一卷，有事故

妨废，以夜补日。前秋始删，到今已二百余卷，才至大历末年。向后卷数增倍于此，共计不减六更，须三年方可粗成编。文须细删，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。”公闲居洛十五年，朝廷许开局自随辟官授廩，命吏给扎，故成此书。使无如许岁月及官主其上，未必成也。蔡氏云：古书自篆籀变而为隶，竹简变而为缣素，缣素变而为纸，纸变而为摹印。摹印便而书益轻，后生童子习见以为常，与器物等藏之者，只观美而已。余谓书少而世不知读，固可恨。书多而世不知重，尤可恨也。唐末年犹未有摹印，多是传写，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，作册亦不解线缝，只叠纸成卷，后以幅纸概黏之。（犹今佛老经）其后稍作册子，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、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，板行之，世方知镌甚便。宋兴治平以前，犹禁擅镌，必须申请国子监。熙宁后方尽弛此禁。然则士生于后者，何其幸也！

○经题签

题签经目虽小节，古人亦审。朱文公见题《伊川易传》者，谓题《周易程氏传》方是。盖后传先经，得尊经之意，且言汉晋诸儒经注皆如此（余按：古传《春秋》者三家，而曰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谷梁传》，皆先《春秋经》）。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说。大名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传是也。《易》以文王序加周字（周，岐阳地名，姬先代所封，《诗》曰：“周原无无”是也，后为代号，因以名《易》），书以上古书加尚字（孔壁只得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，孔安国序《书》伏生之下经曰：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。则尚字伏生加），《诗》以毛萇传加毛字（传诗者初四家，曰齐、鲁、毛、韩，今之《诗》传自汉博士毛萇。因目《诗》曰《毛诗》，以别三家），《礼》述周制加周字（《礼》出刘歆，题周必歆），《传》以左氏作，加左字（以别《公》、《》，未详所始），后来班固《汉书》、陈寿《三国志》皆大名居下，取法于经也。若伏羲始画八卦，重为六十四卦，郑玄以为神农，孙盛以为夏禹，史迁以为文王，惟王弼、孔颖达以为伏羲所重。盖《说卦》曰：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……兼三才而两之，故《易》六画而成卦。”伏羲作《易》之人已言，兼言画六而成卦，则重卦伏羲无疑也。但上《系》言：伏羲以来之制作十三卦，皆云盖取则卦名。伏羲前已有矣。矧画前有易理，且素具乎，况于伏羲前言《易》皆从曰“圣人”，盖有深意。薰叔尝而问朱文公以卦设名之始，公答以无所考。《诗》名之说，或谓国史，或谓子夏、毛萇。而《书·金》曰：“公乃为诗以遗王，名之曰《鸛》。”则《诗》名乃作者自定，至分为风、雅、颂，说者以为始于孔子自卫反鲁，乐正雅颂，各得其所，不知吴季札聘鲁在孔子未反鲁之先，而鲁太师已为札歌风、歌雅、歌颂，则夫子乃衰周之僭礼乐者尔。《周礼》虽有太师掌六诗之说，然先儒谓《

礼》出刘歆，则六诗安知非后世依仿而托之者。余按：鲁《》诗序曰：“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，而史克作是颂。”《乐记》曰：“人不耐无乱，先王耻其乱，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。”《史记》曰：“微子过殷墟而作雅。”观此则雅颂亦作者自别也。孔子序《书》以置篇端始孔安国。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初各一书，后刘歆治《左传》，始取传文解经，晋杜预注《左传》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，于是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二书合为一。因传解经事见《歆传》，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合为一见杜预《左传序》。

○笔史

范蔚宗《东汉?黄宪传》述诸人敬慕之说，而宪之美无可寻，至今读者钦其贤，慕其器。唐史于房杜解善谋善断外，事迹亦不多见，但王魏善谏，英卫善兵，例推为房杜功。项羽残暴，班固书之曰：“羽西屠咸阳。”曰：“所过无不残灭，尝攻襄城，无噍类。”语不激而羽之暴十分著露，此史笔之妙。至于叙列人物，传褒之者赞，贬之者口，称美者传无载（按：史著赞始迁、固，实法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每于事终断以仲尼曰、孔子曰、君子曰，故迁、固法而为赞，史臣曰、太史公曰、臣某曰之类）。盖人非尧舜，安能尽美，作史之道当尔，劝惩之意因寓焉。苏老泉曰：马迁传廉颇，本传不载其议阏舆之失，而见于《赵奢传》；传酈食其，本传不载其谋挠楚权之缪，而载之《留侯传》；传周勃，本传不载其汗出浹背之耻，而载之《王陵传》；传董仲舒，本传不载其和亲之疏，而载之《匈奴传》。盖四臣者，功十而过一，不欲因一以疵十，乃与善之意也。论苏秦曰其智过人，论北宫伯旰爱人长者，班固赞张汤曰推贤扬善。盖四人者，过十而功一，并其一者废之，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心，惩恶不已，甚乎！后之读者宁复识哉！

○孔子师

孔子师老聃之说，肇于《庄子》。庄子师老子，故其著书讥侮古今圣贤，独推老子，甚至假借孔子言语誉之。后来汉儒辑《礼记》承其言曰：闻诸老聃。司马迁《史记?老子传》复增许多老子训诲孔子言语。孔鲋作《家语》，著孔子事实，因据以为证（《家语》后有晋王肃所加，故益难据信）。由是益坚后学之信，不知《庄子》一书多驾空寓言，时去孔子未远，知天下崇信其学，故托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师，庶几聃之道益隆，此庄子抑孔子、尊老子之迹也。后儒不察《礼记》、《家语》、《史记》出《庄子》后，见孔子万世师表，不应礼乐无所自来，而问礼老聃一语，又备见诸书，未详始自《庄子》。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静无为，其著书厌薄礼学曰：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。庄子传其学，从而有揜斗折衡、攘弃仁义、焚符破玺、绝圣弃知等论，则聃之学何礼之可问耶？太史公谓道家虚无为本，因循为用，有法无法，有度无度。

故后之宗者荡弃礼法，蓬首垢面，丧酒吊肉，晋代可证已。岂有以礼训孔子，而勸其徒则废弃耶？孔子于人之有善，若管仲之仁，子产之惠，皆亟称不暇，岂有耽其师而故没之耶？故愚为《庄子》寓言无疑。余尝谓孔子师表盖推周公，彼其梦想犹冀见之。孟子去孔子未远，具曾思之传最的，诵孔子之瓜接不过文武周公，使孔子果师耽于庄子辈，尔耽学之是非庄子述而传之足矣，何必假孔子言明之？此其借孔子尊师可见也。后之卫道者皆与孔子分说，未以寓言及尊师之意照破庄子之妄尔。若孔子从耽之事，《庄子》外篇著耽为周藏史。藏史，书所藏者。耽所职多书，孔子因往问耽焉，容有此理，不然鲁论何无一言及耽，而耽之礼何不书传其后，而甘为弃名检荡礼教之罪人耶？东坡尝谓庄子虽排孔子，实尊孔子，书末叙百家之学，兴曰：“譬如耳、目、鼻、口，各有所明，而不能相通。”故墨翟、禽滑、彭蒙、田骈、慎到、关尹、老耽以至庄周皆列叙名之，至邹鲁之士、绅先生，其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多能明之，则推而不敢斥此。又可见庄子前之推老耽者，借孔子也（余旧辑《素王事记》只据诸书纂辑，未暇辨理，今辄附此）。

○文繁省

司马迁《史记》叙三千年事，五十万言。班固《汉史》叙一百年事，八十万言。晋张辅以此优劣班马。王逢原解《论语》“夫子为卫君”章曰：贤兄弟让，知恶父子争矣。包咸解“子见齐衰者”章曰：哀有丧，尊有爵，矜不成人。朱文公括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”章曰：君子审富贵而安贫贱。视若稽古三万言者有间矣。《左传》叙晋献公杀申生事曰：君非姬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饱。《礼记·檀弓》约以四字曰：君安骊姬。《公》《》叙晋使齐事，由克眇、季孙行父秃、季孙良夫跛、曹公以手傴，齐使眇者逆眇者，跛者逆跛者，秃者逆秃者，傴者逆傴者。刘知几《史通》曰：宜除“眇者”以下句，但云各以类逆足矣，此句烦也。《汉书》：张苍年老，口中无齿。《史通》曰：宜去“年”、“口中”三字，但云“老无齿”足矣，此文烦也。朱文公云家藏欧阳公《醉翁亭记》草前数行，铺叙滁州之山，忽大圈了，但注“环滁皆山也”。梁安贫记武陵桃源事曰：“洞中我问：今乃何代，后历几何，渔人黄道真曰：今晋代，秦后复为汉魏矣。”至陶渊明但曰：尚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司空图曰：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，江岭之南凡资于适口者，若醯非不酸也，止于酸而已；醢非不咸也，止于咸而已，华人以之充饥而遽辍者，知其酸咸之外，醇矣，有所之尔，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。东坡约之曰“梅止于酸，盐止于咸，饮食不可无盐梅，而其美尝在酸咸外，然皆只中庸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”之说。《庄子·山木》篇曰：丰狐、文豹栖于山林，伏于岩穴，静也。夜行昼居，戒也。虽饥渴隐约，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，求食焉，定也。然且不免于网罗、机

辟之患，是何罪之有哉？其皮为之灾也。至《应帝王》篇但一语曰：虎豹之文来田。《列子》叙少壮老死曰：其在婴孩，志气专一，物不伤焉，德莫加焉；其在少壮，则血气飘逸，欲虑充起，物所攻焉，德故衰焉；其在老耄，则欲虑柔焉，体将休焉，物莫先焉；其在死亡，则之于息矣，反其极矣。《庄子》约以四句曰：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逸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《列子》叙人寿无几曰：百年，寿之大剂，得百年者千无一焉。设有一者，抱孩以逮昏老居其半；夜眠之所弭，昼觉之所遗，又几居其半；疾、痛、哀、苦、亡、失、忧、惧又几居其半，量十数年中泰然自得亡介焉之虑者，亦亡一时之中尔。《庄子》叙此则曰：人上寿百岁，中寿八十，下寿六十，除疾病、死丧、忧患，开口而笑者，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。视列语明省多少。诗中如介甫“氏分黄犊草后山，一身当三千”之句，前辈尝评其善约。然语简又须意足，李寿《裴晋公诗》曰：见说风情筋力在，只如初破蔡中时。叙其寿康功业三事于两句中。杨诚斋《挽张魏公诗》曰：出昼民犹望，回军敌尚疑。叙其出督去国，内得人心，外摄夷狄四事于十字中。欧阳公《上杜祁公诗》曰：貌先年老因忧国，事与心违始乞身。祁公年四十即发白，当朝以权幸不悦，未及七十谢事，故祁公谓此两句道尽他一生心事。所以意足方见简之工也。欧阳子谓简而法，惟《春秋》可当之。后学之立言，法乎宋景文修唐史，务简而奇，如雷霆不及掩聪之类，皆以奇而舛，若其犹有未当者。柳子厚《段太尉逸事状》曰：吾戴吾头来矣。《宋史》削去下一“吾”字，曰：吾戴头来矣，河南邵氏谓：去下一“吾”字，戴头来果谁头耶？岂知段之不惧，正以自请一死，词之工，正在下一“吾”字，此则不详文义而省者。

○书史讹名

尧、舜、禹、汤，或以为四圣人名，或以为谥，或以为号。以为谥者，谥法始周，古未有也。以为号者，索之旧说，谓孟子称尧曰放勋，舜曰都君，屈原称舜曰重华（孔颖达《图书疏》曰：《书》遭秦火，《舜典》最后出，江左萧齐时，姚方兴献《舜典》，“重华”句乃方兴所加，不知《离骚》先秦之书已有“差重华之不可迁”，“就重华而陈辞”等语，则孔疏亦难尽凭），《书》中候称禹曰文命。盖放勋谓尧能依仿上世之功化，重华谓舜继尧重光，文命谓禹布文德。然则尧、舜、禹、汤为号，无义，名或近是，况尧命舜之辞曰：咨，汝舜；舜命臣曰：咨，汝禹，若稷契。则知舜、禹尽名也。汤名《论语》著曰“予小子履”，《世本》乃谓汤名天乙，皇甫谧《世纪》谓名履字天乙（不知商代帝王以甲、乙、丙、丁为次，则天乙乃汤别号），至舜命弃为稷养官也。在当时以稷与禹、皋陶并称，名已觉混，及他书凡称弃者并曰稷，不知夏以前祀柱为稷，殷兴始废柱以弃代，谓稷可代弃名，非也。殷史帝乙崩，子

辛立，是为纣。则纣名辛，非受也。《尚书》西伯戡黎及武成皆言商王受。二孔释《书》谓：受、纣，音相乱。郑玄谓纣转为受，及名方曰“其在受德”。孔文释“受德”纣字。余按：殷人名其恶曰纣，其转纣为受，或者伪书者过也，至谥法以残书损义为纣，亦未详，殷无谥法而妄尔。《列子注》：伊尹生伊水之上，故姓从其地。屈原《离骚》、孙武兵书、吕不韦《春秋》、孔颖达《诗》、《书》疏皆著伊尹名摯。渭之尹者，正也，言能正天下（郑玄注尹言究，孔安国注尹口），故号伊尹。而《太甲》、《伊训》等篇述其言曰“惟尹躬克左右厥辟”；曰“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”；曰“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”，皆指尹为自称之名。君前臣名以号与字，可乎？《史记索隐》著太公望姓名曰姜子牙，故《左传》、《毛诗》齐例称姜，姜先封吕，他书复称吕尚，以可师可尚也。孙子兵书存其名，犹称吕牙。谓之太公望者，《史记》曰：文王遇吕尚于渭滨，曰：“自吾先君太公曰：‘当有圣人适周，周以兴。’子真是耶？吾太公望子久矣。”则太公非爵，望亦非名也。后世不察，谬曰吕望、吕尚，盖缘《史记》以太公望与周公旦并称，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，读者从而亦讹。

○雉释文

《左传》：都城过百雉；《周礼》名城以五雉、七雉、九雉，释者谓一雉之墙长三丈，高一丈。其取以名文之义未详（《公羊》：五堵而雉，则二百尺）。山阴陆氏著《埤雅》谓：雉性妒垄护疆，飞不越分界之内，以一雄为长。潘安仁《雉赋》曰“画坟衍以分兀”者，此也。其飞荣不过丈，修不过三丈，所以以雉计丈也。《礼记》“晋太子申生缢死”，郑玄注曰：雉经。《晋语》亦曰：申生雉于城庙。孔氏释：雉性耿介，被获，必屈折其头而死，言申生以介死也。因思城之大有取于雉，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，岂泛然哉。

○孔门多才

孔门多才，可使治赋，可使为宰，可使从政，可使与宾客言。子华之使，冉求之艺，子路良孺之勇（《左传》：微虎宵攻吴，师卒二百，有若与焉。冉求清郊之战，樊迟为我右，则勇非一夫），子贡辞命外善货殖，公冶长能通禽言。言语、德行、文章外无往不有。圣人从而以道德礼乐陶熔之，譬天地间生生职职，各正性命，所以为万古大化治。圣人历聘列国，虽因道德所宗，亦多因弟子而重。楚谋欲以书社封孔子，子西忌之曰：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？王之帅师有如子路者乎？王之使列国有如子贡者乎？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？其后季孙启哀公聘孔子，亦以冉求之胜学军旅于孔子也。《史记》言仲尼没后，弟子大者为诸侯师，小者为卿相。盖其平日琢磨，使有用非止章句之末也。《汉·艺文志》曰：孔子没，群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，名曰九流：一儒、二道、三阴阳、四法、五名、六墨、七纵横、八杂、九农。则孔门之学何所不参

？孔子之教何所不讲？所以为圣而当时共慕，至没而弟子异昔，故曰孔子没而微言绝，异端起而大义乖，春秋之后无圣人。战国孟尝、平原辈亦皆聚客数千，书之史者鸡鸣狗盗、袖椎窃符、纵横狙诈，贾生民之祸而已。下惟是珠履毒瑁，以雄其国，所以士益众，世益卑。近世伊洛学兴，始以修齐平治为教。故胡氏谓伊洛发明，然后人知孔孟可学而至。视汉晋以来，第以词学名儒者有间矣。至紫阳集诸家之大成，其精本之义理，其粗究之经济，尝书储才之说曰：有天下者必諏询咨问取之无事之时，而参伍折衷，用之有事之日，方其事之未及也，无旦暮仓卒之需，则亲之得以久，无利害纷拿之扰，则察之得以精，诚心素著，则可得之多，岁引月长，则所蓄独富。久且精故，知其长短而不谬，多且富故，更迭为用而不竭。今人平居不以才为意，及临事仓卒泛然求之，所以用之欲称其任，难哉！又曰：不以小恶掩大善，不以众短弃一长，不以近遗远，不以小加大。则共聚一时英彦，请之者岂直曰文为而已。又当参尧禅舜、舜禅禹，皆是积岁程年，稷、契、夔、龙之任，曰“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”则决，非以骤致也。若传说起于版筑，胶鬲举于鱼盐，管夷吾举于士，汉祖仓卒罗致，贩缯、屠狗、吹箫、织簿皆为用，则短不可弃长，小不可掩大，又可验也。况物有不求，未有无物之岁，人有不用，未有无才之时。特患教无孔子而取之，之说又不大公尔。

○孔子讳鲁

北魏史著魏之祖诘汾田山泽，见耨耕自天而下，有美妇人称天女受命与诘汾偶，期年复会，果以生男授诘汾曰：此君之子也，自此世为帝王。窃详古帝王受命之符，未有神异如此者。考之当时，魏大武尝命崔浩撰国记，浩书魏先世事，详列通衢事，皆直笔，北人见者无不忿恚。浩以暴扬国恶，身灭族夷。乃知诘汾之偶，史官惩浩失而失之者也。古以讪直取祸不一，若史权所在，尤嫉之招，矧国讳乎？故班固、蔡邕皆不得其死，圣人慎乱邦，安得不以逊言为贵？孔子在《春秋》，凡鲁失多为讳护，《诗》三百例录变风，鲁独著颂，与商周等。《论语》：自既灌而往者曰：吾不欲观之矣。或问谛之说，曰：不知也。夫子礼乐所宗，岂不明者。朱文公谓《礼》不王不，鲁侯国举实僭，故夫子托以不知。郑玄谓则序昭穆，鲁以僖公为闵公庶兄，跻僖、闵上，有逆祀之失，故夫子不欲观（余案：跻僖、闵上乃文公三年孔子仕定公时，阳虎已顺，祀先公无缘尚为逆祀，不观元未详尔）。文姜通淫于齐，书会于禚之类，虽不泯其实，及文姜与弑桓公，不容于鲁，书夫人之归曰：逊于齐，言若逊让而去之义。桓闵二公皆弑死，经例书曰薨。成公适晋为所留，经没不书。其讳国恶也，审矣。昭公娶吴，姬姓，泰伯之后也，陈司败之问正以娶同姓之丑，夫子宁受以为己过，而不别为辩辞。至《春秋》书孟子归曰：夫子至自吴。及其

死也，书孟子卒。不表夫子之为曰氏，盖不殉昭公之失，书孟子凡皆为鲁讳也。皇甫氏谓孔子若不受司败之议，则千载之后遂永信我言，谓昭公果知礼，是乱礼之事从我始，今得司败见非，受以为过，则他人不谬，所以幸也。孔颖达谓孔子于鲁事不可无法者，不夺其所讳，亦不为之过讳，每事讳护则为恶者无复忌惮，后世安知所惩？故为鲁讳，礼也；不为鲁隐，为世教也。《公羊传》：《春秋讳例》曰：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，为中国讳。左氏曰：讳国恶，礼曰讳。史著崔浩才比张良而稽古过之，惜未稽仲尼之法也。

○理根本

秦据崤函，事耕织，修战守，复取蜀为富饶之本，卒灭六国。汉高委萧何治关中，光武委寇恂保河内，曹操抚河济，屯许下，俱济大业。唐兴，因随关中之资；宋兴，籍周之富。视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。若项羽之败，全是汉遣彭越等入楚地谋挠楚故，兵疲食尽，以此不支。羽恃其勇悍，日事外攻略，不于根本究心，一旦兵败，方有“无面目见江东父老”之语。大概根本不立，则进退无据，耕织不偏废，然后表里可以交敷。高宗南渡，胡致堂进计，乞措置荆襄为根本，安行所谓老小者，陛下分部诸将，谨斥候，治盗贼，自以精兵为輿卫，巡历往来，征伐四出，如高祖在荥阳、成皋、京索，而留萧何于关中，光武战临淄、埜坻，而置寇恂于河内。又言置行宫，或建康、南昌、江陵一处，安太后、六宫，量留兵将为营卫，陛下复兵按行，周旋彼此，不为定居。又言既定讲武，其余庶常日力不暇给者，别置行台区处之。此建炎规恢复一大议论也。惜当时玩其说，盖一身在外，则足以御寇，而根本之地不加伤，意于事务之大，庶常日不暇给者，置行台处之则可一意讲武，图所谓兴创之大功。有志天下者致堂，此说万世法程也。

○曹参不伐

山谷以韩信胜赵不自骄而师李左车，为武夫悍将所难，咏以诗曰：“功成千金募降虏，东西置坐师广武。虽云晚计太疏略，此事亦足垂千古。”信事固难矣。若曹参佐汉祖起兵，未有韩彭辈，战胜攻取多出于参，异时论功，争以参为第一者，此也。高祖先项羽入关，参功为最速，逮得韩信，参已封建成侯，一旦举信为大将，不闻参有轧己之嫌，虽信奇才，然参视之实为后出。至信击魏击赵，参皆与俱，击齐，参以相国属焉。则参不特不忌信，乃降心出其下，此于士君子不足道，而见之参则难矣。其谦让不伐不待舍，盖公随萧规而后然，宜其善终于菹醢之世。参本传言：韩信东击齐，参以左丞相属焉。又言信立为齐王，引兵东与汉王共破项羽，讨齐未服者，汉王即帝位，徙信王楚，参国相印，观此则参终始出信下。噫！难哉！

○有国二权

国之大权二：政与兵而已。故权宜专不宜分，分则事无统。兵权宜分不宜专，专则乱生。成王将终，命大臣相康王，时掌兵者齐侯吕，宰臣召公迎嗣子，命仲桓、南宫毛取二千戈、虎贲百人于。先儒谓齐侯掌兵而不可发，召公发兵而必资仲桓、南宫毛，则其权之不统属也尚矣。西汉郡置守一人掌政，置都尉一人掌兵，二者不复相统，置南北两军亦不相掇。高后时周勃以太尉掌宿卫，初得北军而不得南，可证也。唐李府卫制坏，兵聚方镇，卒以取亡。宋兴鉴其弊，郡置通判贰太守，道置转运贰制，有兵权者钱赋不之寄，有钱谷者兵无所预，思虑视古人益密矣。内则政事归于中书，故外戚不得挠，宦官不得与。于兵典以枢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总之，三帅可总之而不可发之，发兵之权归枢密，而枢密置使必置副，欲彼此相制也。州兵典以指挥随郡大小为员多少，每指挥四五百人，给饷在运司，统制领守。神宗尝言艺祖养兵只三十万，京师十余万，诸道十余万，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，则无外乱，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，则无内变，此又内外相制也。

○明辞识时

万事古今有一定之理，亦有随时之宜。汤武征伐虽不若唐虞揖让，然桀纣之暴如是，非汤武伐而除之，天下何时得安乎？所以伊川读《易》先明辞，决议时。如孔子作《春秋》尊王，《孟子》七篇之书教诸侯为王。以时观之，孔子时王室政教犹行，列国义理相尚，使有桓文复出，王室犹可扶持也；至孟子时，七国日事战争，周君曾不能为时重轻，而民生憔悴，虐政日甚一日，故孟子以王道晓诸侯，亦明时者也。张南轩曰：君子救世，时宜而已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文王事殷之心也。孟子劝时君行王政，汤武顺天之心也，惜伯夷叩马。李于江常语司马公，疑孟等作似非识时者。然有武王、孟子之书，又不可无后世于江、温公之说，乃扶持世变之一端。高祖称义兵伐隋，隋炀之恶，视纣尤甚。高祖为隋方伯，有汤武之费，当时声炀之罪，义旗东指，为天下除残，民心响应，举动岂不正大？乃窃臣突厥，遥尊炀帝，别立代王，徐行禅让之理，所以胡致堂谓正大之举反委曲行之，皆不明时者也。孟子有独夫纣之说，南轩曰：王者，天下之义主，民以为王则谓之王，民不以为王则独夫而已。况所谓王者，以其能生杀，能废置，能弭乱息争，纣炀虽苛暴为独夫，生杀废置犹在也。若衰周二君，无纣炀之恶而安于衰弱，使文武德泽斩尽，制度大坏，付天下于自盛自衰，自在自亡，于世治乱茫然不与焉，亦安得不谓之独夫哉！

○十六相四凶

《五运历谱》载黄帝之子相承四百年，次颛帝（即高阳氏）在位七十八年，次帝喾高辛在位七十年，次唐尧在位七十年，以其数考之，意子孙至舜时已六百一十馀年。鲁太史克称舜举十六相、去四凶族，苍舒至叔达八人为高阳氏

之才子，天下谓之八元（如《历谱》之数，八人至舜时已三百一十惊年），伯审至季八人为高辛氏之才子，天下谓之八凯（如《历谱》之数，八人至舜时已一百四十年），少有不才子曰穷奇（至舜时已一百六十馀年），帝鸿氏有不才子曰浑敦（《历谱》曰：帝鸿氏黄帝刹，与颛帝同），颛顼氏有不才子曰祷机（至舜时皆二百一十馀年），缙云氏有不才子曰饕餮（《历谱》曰：缙云氏黄帝，至舜时亦七百馀年）。窃意舜时未必皆尚有其人，虽古人多寿，然数人者不皆寿，纵寿亦未必如此其久也。若曰自其世济美恶者言之，绵历六十馀年之远，未必代代皆元恺，人人为凶类也。夫谓之世济者，世代相仍，积累皆然也。不思尧舜大圣，生朱均瞽；鯀顽圯，生舜；禹父子相去一间，圣愚悬隔，禹治水可谓有大功于世；启少康之外，咸无可称。文武之兴，后稷稼种之休烈犹可存者，成康宣王外，可数无几焉。以帝王之胄犹若此，彼十六相世为元凯，四凶族代为恶人，吾不信也。况更历六百馀年，谓之元凯，其间岂无一凶德败祖宗之美；谓之凶族，其间岂无一良善掩前人之愆。谓皆自其世济而言之亦非也。

○姬周姓

《左传》晋平公以同姓四人备嫔御，郑子产聘晋，言于叔向曰：今君内实有四姬焉。盖指四人，别同姓之丑，非目贱妾为姬也。按古妇人皆有字与谥，或国名下系其姓，先儒谓其不忘本且别他族。今考字下系姓，如周女曰伯姬、叔姬，齐女曰孟姜、季姜，宋女曰孟子、仲子，狄女曰叔隗、季隗是也。谥下系姓如齐女曰宣姜、庄姜，宋女曰声子，秦女曰文嬴，楚女曰江芊，杞女曰定姒是也。国下系姓如秦女曰徐嬴，陈女曰息妫之类。岂惟姬姓后世以目贱人？《战国》曰：幸姬、如姬。《汉史》曰：诸姬、薄姬、爱姬。释者不辨其为用。如薄曰：姬音怡，臣瓚曰：汉内官也，秩比二千石，位婕妤下。惟颜师古谓汉内官无称姬者，周姓贵于众国之女，故妇人美号皆称姬。宋大观间公主易号曰帝姬，贵之也。若世例以目妾，岂反贱乎？然则姬女贵而以姓著，反不若齐、宋女不辱其姓之为愈。

●卷二

○担头上看花

《九畴》兴而《易》道晦，三《传》，作而《春秋》散，《齐》、《韩》、《毛》、《郑》，《诗》之末也，《大戴》、《小戴》，《礼》之衰也。古经为后儒所断者多矣，况去籍于周，坏于秦，杂于汉，魏晋后儒惟郑王诸儒臆说是拘。于是根本不立。故魏鹤山云：人须将三代以前规模在胸次，一一从圣经看来，庶亲到地位涉历，可以自得。若只在诸儒脚下盘旋，终不济事，缘担头上看花，终不若树枝头天然活精神也。此语盖为舍六经、泥训诂者发。朱文

公亦谓《诗》、《易》之类，多为先儒穿凿所坏，使人不见当年立言本意，人须是虚心平气于本文之下，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，及他是何人所尊、所敬、所憎、所恶，一切搁置，惟本文本意是求，则圣贤之指得矣。皆自乱经学，以先入之说汨之也。今人学文者不参六经，而拾韩、柳、欧、苏之绪馀，笔史者不本《春秋》，而希马迁、班固之近似，赋咏者不探三百篇、《离骚》之雅奥，而唐人章句之是寻，故皆只袭古人足迹，不能专门名家者，此也。近时蜀士董梁可曰：文字、用事要从元出处推究，不可只才奢拽他人见成事来使，譬如贾物出产处得来，既可择其美恶，又可兼货并畜。若只他人担上贩来，不惟美恶不辨，亦得少而售狭矣。姑即《庄子》大鹏事言之，就全篇讨论，则知鲲以鱼大而化鹏，鹏从南溟曰天池击水三千里，以六月息，抟扶摇羊角之风，来蜩鸠斥之笑，出《齐谐》志怪之书，是多少曲折，笔端自然活动。若见他人用大鹏事，已亦从而大之，则事狭而意促矣。此亦不欲担头上看花也。

○经根人事作

司马迁谓古人有激而作，书曰：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，乃作《离骚》，左邱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，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，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，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。《诗》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。迁罹腐刑，故有此言，即其言推之，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训，三监乱周而周公作诰，孟子不遇齐梁、患杨墨而述七篇，仲舒、刘向下狱而著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繁露》、《玉杯》等书，柳子厚、刘禹锡、李白、杜甫皆崎岖厄塞，发为诗章。迁之言信而有证也。然考六经《论》、《孟》，皆根人事作，《周易》著吉凶悔吝之理，《春秋》录是非善恶之迹，《毛诗》载政教美刺之词，《尚书》推唐虞三代之懿，《礼记》威仪之详备，《周礼》制度之纤悉，《论语》立身行己之大方，《孟子》发明王道之极致，无有空言者。所谓治道而为经，岂专舒忧泄愤之为哉？

○史阙文

天开于子，地辟于丑，人生于寅，邵康节《十二会》谓气运至子方有天，未有地，至丑方有地，未有人，至寅方有人，三代皆即天地人始处建正。当尧时在巳，今在未，到戌当人物都消尽（《经世书》以十二万四千五百年为一会，自开辟至尧正当中数）。详此则戌、亥、子、丑乃古今一日之夜，天地混沌闭塞之时，尧至宋历三时，凡三千余年，上此寅至巳历四时，当凡三千年，但孔子书断自唐虞，茫昧者不究诘，后儒因只据圣经为说。史家虽上及三皇，然皆裒取后人僻书杂传而成之，非真有得于当时事实也。但以康节尧舜上犹有四时说推来，帝王前世代绵历有《庄子》叙伏羲上犹十一氏，郑玄《六艺论

《周古史》、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、罗泌《路史》及《广雅》皆述伏羲前帝王数十百氏，年逾数万，所谓肇自伏羲，特就其所推者言之尔。又以《易·系》参之，伏羲、黄帝、尧、舜以来之制作十三卦皆云盖取则，《离》、《涣》、《益》、《随》等卦伏羲前有矣。卦画不伏羲始也，司马迁《史记》、刘道原《通鉴外纪》又皆遗伏羲，只断自黄帝始，不思《周易》万世文字之祖经，秦火独完备者也，《大传》言伏羲氏没，神农氏作，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，叙三五传次甚明。二史不然，故东汉张衡、近代朱文公皆咎迁。《春秋》不王吴楚以尊周室，所以严正伪之辨也。后世史官徒知徇编言之说，周史厉王流彘之后系之共和者十四年，而周统中绝，迁固汉史，惠帝崩纪、吕后为政者八年，欧阳公厕武后于《唐·本纪》，司马温公黜蜀帝魏皆拘于编年说也。定夺于文公《纲目》，然后正伪分而统纪明，岂史氏琐琐之见哉？但秦后项梁与诸侯共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，当时合书义帝为正统，然后继以汉，王莽篡汉，汉史为新者十八年，张衡谓时汉元后犹存，只当为后元，《本纪》编年月，纪炎祥，而莽篡事第着之莽本传。更始居位，光武常为之将，后始即真。则光武初亦当以更始为正，文公《纲目》俱不与以汉昭烈之例，岂以其君人之道有未足邪？

○子夏子思

司马温公《通鉴》著魏文侯师卜子夏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来历本《战国策》，以《史记》考之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，则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、鲁定公二年生，孔子卒周敬王十一年、鲁哀公十六年，七十三岁，子夏时二十九岁，后十一年哀公卒，继元王七年、贞定王二十八年、考王十六年、威烈王二十三年，子夏当一百一十四岁。周王更代之际，年有重叠，不过差之三四年，如《史记》则子夏当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亦百零四岁。孔子既没，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说，但不知果得如许岁数否。柳子厚论孔子弟子曾参最少，曾子之死，孔子弟子略无存者。《论语》出于有子、曾子门人，已有曾子启手足之事，则子夏死曾子先矣。《通鉴》书周命三晋为诸侯于威烈王二十年，魏之始侯文侯斯也。或子夏无如许岁数，温公以师子夏为文侯美事，系之，然当加初字以著其始。《史记·世家》曰：盗杀晋幽公，魏斯立其子烈公，烈公立十九年，始命三晋为侯。则师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后事也。《通鉴》又著子思言卫侯事于周安王二十五年，来历本《孔丛子》，时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，伯鱼先孔子卒五年，计伯鱼最末年言卫侯事，时亦已一百一十七年，凡此疑皆往事追书之，但温公既书曰某年，必有实据。

○崛奇可味

骈俪贵整，散文忌律，各有当也。《尚书·禹贡》叙九州地理之分画，山水

之离合，物产之参差，贡赋之高下，功力之作止，铺叙随之而异，更不淆杂。

《顾命》叙成王导扬之语，仪文之列，去之千百载而读者寻丈可辨，此千古文章之妙。故东坡尝推《禹贡》，曾子固谕后山学文且读《顾命》。《周礼》文章之奇不一，而状物最精，《内饗》曰：牛夜鸣则<广西>；羊冷毛而毳，；犬赤股而躁，臊；鸟キ色而沙鸣，、豕盲眠而交睫，腥；马黑脊而盘臂，蝼。五者各物之病与臭也。却行、仄行、运行、纡行，蚓、蟹、鱼、蛇之行各态也。以尸鸣者，以注鸣者，以旁鸣者，以翼鸣者，以股鸣者，以胸鸣者，物之鸣各处也。厚唇口、出目短耳、大胸后、大体短尸，与夫锐喙决吻、数目<肩页>尸、小体蹇腹等语，羽之属各形也。皆随其异而笔之。深其爪、出其目、作其鳞之而，则必拨尔而怒，苟拨尔而怒，则于任重，宜爪不深、目不出、鳞之而不作，则必颓尔如委，苟颓尔如委，则加任焉，必将废措状飞走翕张之势，而无力、有力、轻重可以想见，此犹有形状可写也。若无形无影之声，摹写最难。

《礼记·乐记》曰：上如抗，下如坠，曲如折，止如槁木，倨中矩，句中钩，累累乎端如贯珠。何啻亲聆其抑扬高下之声，后来昌黎听琴等作虽写此而费辞矣。经后文字之奇，推《庄子》大木异窍穴之风声，天籁变为八声之妙，至厉风济则众窍为虚一语，又自有声入无声，乃古人状物之妙。至叙物之递递相生曰：种有几，得水则为，得水土之际则为蛙之衣，生于陵屯则为陵舄，陵舄得郁栖为乌足，乌足之根为蛴螬，其叶为胡蝶，胡蝶胥也化而为虫，生于灶下，其状若脱，其名为鸲掇，鸲掇千日为鸟，其名为乾馀骨，乾馀骨之沫为斯弥，斯弥为食醢，颐辂生乎食醢，黄兄生乎九猷，瞿芮生乎腐，羊奚比乎不^上，久竹生青宁，青宁生程，程生马，马生人，人又反入于机。物生凡十八变而句法十五易，妥律中杂崛曲，是以其语可味。后人以东西南北行文者甚多，平铺直叙外无委曲。东坡《超然台记》：南望马耳常山，出没隐见，若远若近，庶几有隐君子乎？而其东则庐山，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。西望穆陵，隐然如城郭，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。北俯潍水，慨然太息，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。铺叙四顾而文法四易，味其语殆非一索可竭也。后来如洪景卢又多尚此，记马遂良怡斋曰：方吾家居，入怡颜以事父母，出怡，怡色以与兄弟处，暇时读书以怡吾心，食与口怡，寝与体怡。叙五怡事而句四易。又《养拙堂记》曰：人必有所养，以直养气，以蒙养正，以智养情，以寡欲养心，以静养身，以义方养子，以善养民，以学养士，以法制养兵，以节养财，养木于山，养禾于田，养牛羊于牢，养鸡于埘，养鱼于渊，养龙于江湖，养万物于天地，由书契以来，亘古今之理具是矣。一失所养，则位养骄，势养傲，侮养高，酒食养四体，养奸以夸，养盗以窃，养虎以贻害，养稂莠以蠹苗，养虬虱以蕃搔，养痍疽以戕身。反正备论养字之义，文亦四变，又短中搀长，皆惧其律也。景卢如此

甚多，姑录一二以见前辈文法。

○寅正非夏

《易》曰：帝出乎震。震，东方之卦，其行为木，建朔合从寅始。尧以中星定四时。《尚书》：二月、五月巡东南，八月、十一月巡西朔，皆寅正仲月。故孔安国、王肃皆谓自夏至前建寅首正月，刘道原《通鉴外纪》因书禹即位仍有虞，以建寅为岁首，书汤即位乃改正朔。是岁首建寅非专夏正也。孔子曰“行夏之时”，曰“吾得夏时焉”，盖就比较而言之，非推本而言之。后商建丑、周建子、秦建亥，汉兴因秦，至武帝太初元年，始复用建寅为岁首，而寅遂不改。（朱文公曰：孔子取夏正，以阴阳之气终始著明也。盖子月作一阳生时，则阳气未出于地，寅则阳出地上而温厚之气从此始。巳月六阳虽备而温厚之气未终，至未月复穷而温厚之气始尽。五月一阴生时，则阴气未出于地，申则阴出地上而严凝之气从此始，亥月六阴虽备而严凝之气未终，至丑月穷而严凝之气始尽。盖地中之气难见，地上之气可验，夫子所以取寅正也。但自子亥为日一周，日以子始，岁亦寅始，亦有可议。）

○改朔

三代建正大抵改朔，后人不深考，遂谓并改月号（王肃谓：古历遭战国及秦而失）。夫月改则十二月紊其经，时改则四时易其位，月可强改，时有定序，可改乎？余以经求之，无改正之说。《尚书》：舜二月、五月巡东南，八月、十一月巡西朔。随四仲月以巡方，月何尝改？《尧典》：以正仲冬，曰平在朔易。朔，北方，训尽也，万物至此尽而复苏。苏则皆当改易，则岁一周之理也。是犹曰未有子、丑、寅建正之说。若商以丑为正，曰：惟元祀十有二月。商谓年为祀，太甲嗣位，改元而称十二月为首，其后桐宫服阕，伊尹以冕服奉鬯，王归亳告新君，始亦曰：惟三祀十有二月。朔月不改也（或疑《伊训序》称太甲元年，又曰三年复归于亳，不知序作于周世，所以年异祀）。又曰：服田力穡，乃亦有秋。时亦不改也（周建子，《书》亦曰秋大熟，未获）。周以子为正，《毛诗》称首岁虽曰“一之日”，然“一之日发，二之日栗烈”之后继之曰“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”，则未尝不以十二月为岁终。又《十月》、《蟋蟀》之后言曰为改岁，则岁虽改而十月之号不改也。至“四月维夏”，“六月徂暑”，“七月流火”，“九月授衣”，“八月其获”，“九月筑场圃”，“十月纳禾稼”，一与今之气序合，亦不改时也。《周礼·大司徒》曰：正月之吉始和，中春诏内外命妇始蚕于北郊，上春诏王后六宫之人生童之种，正岁十二月斩冰（贾公彦释正岁是夏正月，盖徇周建子，即今十月冰未坚，不得斩之，以此推之，诸言正岁皆建寅月）。《禽章》于仲春、仲秋、逆暑、逆寒司裘，于仲秋、季秋献裘，与夫春、夏苗、秋、冬狩、春祠、夏、秋尝、冬

（贾释《周礼》祭祀田猎皆用夏正），亦与今之气序合，不曰子正而改也。《礼记·月令》所纪四时，亦皆夏正。汉鲁恭谓《书》出秦吕不韦而实周世书，所据皆夏正，改者惟服色、牺牲、号令、器械而已。此犹以秦焚之前论者。秦焚后史最可证，《史记》书秦改年始朝贺皆十月朔，秦以建亥为正，故秦史书年之下皆首书十月。《汉书》文颖解云：周火德，秦以水取火，建亥之月，水得位，故以为岁首。此亦为改朔不改月之证。又秦历应置闰者皆在岁末，《左传》归馀于终之义也。《史记》及《汉书》凡未改秦历之前，屡书后九月，盖闰月于岁终也。颜师古谓不然则径谓之十月矣。此又可见秦以九月为岁终也（《月令·季秋之月》：合诸侯，制百县，为来岁受朔日。秦建亥，戌月言为来岁受朔文可见《月令》秦世书也）。胡文定公引《商书》元祀十月、二月及汉史建亥之下即书冬十月，明周改正不改月。朱文公谓杜元凯《后序》载汲冢《竹书》皆古晋史记，以建口为岁首。又尝曰：改月者后王之弥文，不改时者天时不可改。独疑《孟子》七八月之间旱，为建午建未之月，及“十二月舆梁成”之语，于是门人问答多曰阙疑，但《春秋》用正，伊川以为只周正建子月，非春而书春，则夫子行夏时之意。胡文定传《春秋》周建子正，且曰：夫子以夏时冠周月，垂法后世，以周正纪事，亦无其位不敢专。余以《春秋传》本文考之，则又不然。蜀士王容溪尝著说曰：周果以建子为正，时月与之俱改，则《春秋》何以书“春三月己亥焚咸丘”乎？“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”乎？“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”乎？“十二月祭伯来”乎（凡此纪四序，皆合寅正，可见夫子只用夏时）？杜预注乃曰：四月，夏二月，七月，夏五月，秋乃今之夏，冬乃今之秋。夫月可改也，时可改乎？又“隐三年”《传》书：四月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，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四月取麦、秋取禾，夏时明矣。杜预乃训取为芟践以附会周正之说。“隐九年”《经》书：三月庚申大雨雪。三月当五阳之月而大雪，书之非时也。杜预乃谓夏之正月。正月有雪亦岂异哉？《经》又书：春秋大水，无麦苗。秋种麦生苗，水忽漂之，记异也。杜预记：五月谓之秋，漂杀熟麦及五谷之苗。经言麦苗而预言五谷之苗，不知四月小满，麦已登场，五月又安有麦之可漂耶？威八年春正月乙卯燕。燕，冬祭，春而，非时也。杜预注：夏之仲月。威四年《经》书：正月，公狩于郎。冬猎曰狩，书之正月，重公失狩也。而《左氏》曰：时礼也。大率左氏、杜氏把持周正之说，故每牵合周，而亦有知《经》用夏正处甚多，不知何前后反覆如此。余谓：尧命羲和敬授人时，昧谷、南交、昧谷、幽都，定之方中；出日、纳日，占之昏旦；东作、南讹、西成、北易，测之时气；日中、永、短，齐之晷刻；鸟、火、虚、昴、正之中星；析、因、夷、奥，察之民事；孳、革、〈毛先〉、，验之物类，然后中气定而四序正。此其气序不差，虽巧历莫违。杜预乃移易四序以附

会周正，岂理也哉！（后世魏景初复建丑，唐载建子，未几俱复寅正，盖气序不可得而移者。）

○历代帝陵

西汉刘向疏曰：黄帝葬桥山，尧葬济阴丘垄，皆卧葬，奥甚微。舜葬苍梧，二妃不从（葬苍梧之说见《礼记》与《竹书》，然《孟子》先秦古书，云：舜生于诸逢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。鸣条，卫晋地，实今河中府安邑，无缘葬苍梧，况苍梧在尧五服外，虞夏为荒服之境。或曰陟方乃死，不知舜享年百有馀岁，晚乃传位于禹，十七年而后崩，则巡狩晚，当为禹，舜未必耄年犹任奔走也。考《阿中纪》：市有舜墓，疑象封有鼻，正今道州，或象冢也）。禹葬会稽，不改其兆。殷汤无葬处《崔駰、薛瓚言：汤冢在济阴亳县。《皇览》云：在亳城北。□□□在梁国蒙县北薄伐城中，汉著汤冢隶扶风县，汤冢数出）。文、武、周公葬于毕。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馆右，樗里子葬于武库，皆丘垄之处。惠、文、武、昭、襄五王皆大作丘垄，多其瘞，后尽发掘。始皇葬骊山，坟高数十丈，周回五里馀，石椁为游馆，人膏为灯油，水银为江海，黄金为凫雁，珍宝之藏，机械巧变，不可胜记。又多杀害人，埋工匠。其后项籍焚毁宫宇，虽已发掘，馀空藏，牧儿亡羊其中，持火索羊，遗火烧其棺。夫死者无无穷而国家有废兴，明君智士，远虑无穷，故甘薄葬之诚，乃奉安之道也。余按：《周礼》言天子之丧敛，用圭、璋、璧、琮、璜、琥，皆为渠眉。郑司农注：开渠为眉，令汗得流去也。郑玄注：渠眉，玉饰之沟象冢也，以组联六玉沟象中以敛尸，圭在左，璋在首，琥在右，璜在尻，璧在背，琮在腹。《汉旧仪》曰：帝崩，含以珠，缠以缙纒十二重，以玉为衾属，如铠状，连缝以黄金缕，腰以下玉为押，长一尺二寸半，下至足，亦终以黄金缕。陵制用地七顷，方中用地一顷，深十三丈，堂坛高二丈，坟高十二丈。《皇览》曰：汉家之葬，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，开四门，容大车六马，错浑杂物。《东汉·礼仪志》纪载甚备，其言藏明器数曰：笥八、瓮三、甄二、瓦甕一、彤弓一、彤矢八、卣八、牟八、豆八、笱八、酒壶八、一、几丈各一、盖一、钟磬各十六、钱四、箫四、埙箎笙匏瑟竽筑坎篪干戈箠甲冑各一、兔车九乘、刍灵三十六、瓦灶二、瓦釜二、瓦甑一、瓦鼎十二、匏杓一、瓦案九、瓦大杯十六、瓦小杯二十、瓦饭十、瓦酒尊二、匏勺二。后王弥文益甚，且持不以天下俭其亲之说。周礼汉制未必馀也。经王莽乱，赤眉发前汉诸陵，其玉匣敛者率如生，吕后至遭污辱，独霸陵完。光武美文帝之俭，东都首以薄葬送终，令陵但令流水与丘垄同，明帝亦然。《古今注》载光武陵制：山方三百二十步，高六□□□垣四出司墨门，寝殿钟磬皆在周垣内，堤封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。明、章以下陵制不甚相违。遭董卓乱，吕布尽发诸陵以珍宝，解金缕，探含玃。魏文帝惩

之，故终制曰：世未有不亡之国，亦无不掘之墓。丧乱以来，汉氏诸陵无不发掘，至烧取玉匣金缕，尸骸殆尽，古焚烙之刑也，岂不痛哉！吕不韦生战国末，言荆、齐、燕、宋、中山、韩、赵、魏自此以下亡国不可胜数，其大墓无不掘者，故《吕氏春秋》曰：知生者不以物害生，知死者不以财害死。凡生必有死，孝子重其亲，故有送终之义。葬者，藏也，以生人之心为之虑，则死莫若无动，莫如无利。又曰：死者弥久则生者弥疏，疏则守者弥怠，而藏器如故，理势必掘。今有铭墓曰：此中有金宝，不可掘也。而为之阙庭以自表，何以异彼哉？又曰：欲利而反害之，欲安而反危之。孔子止季孙以蹠斂，为无穷虑也。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传》：田叔以掘冢致富。大概丧之后民无生业，国典复隳，而名丘大墓雄丽自兢，岂达幽冥哉？唐世十八陵，五代周高祖西征，见无不发者（按温韬发唐陵），因遗令世宗曰：我死当以纸衣葬。宋兴，艺祖诏诸道检校前代帝陵，各制札衣一副，常衣一袭，具棺槨。于是西京凤翔、雍、耀等州奏周文、武、成、康、秦始皇，汉高祖、文、景、武、元、成、哀七帝，后魏孝文，西魏文帝，后周太祖、文帝，唐高祖、太、中、肃、代、德、顺、文、武、宣、懿、僖、昭十二宗，凡二十九陵，并曾经开发（《容斋五笔》辨诸陵地理，异正史。又汉文陵据所书后亦发）。宋艺祖至哲宗七陵葬西洛，靖康之变，亦皆不免。绍兴中宗，臣士仁同张焘往省，焘归奏高宗曰：愿陛下万世无忘此贼。时惟昭陵无恙，哲宗犹暴骨。初枢密楼同往，归述昭陵之制曰：陵因乎冈，种柏成道，周以枏橘，阙阁楼观环之，神关内列石人、羊、虎、驼、马、等像，神台三层，高二丈，俱植柏，下广十五为水道，有五大门，门外石人对立，其号下宫者，乃酌献之地，馀陵皆然。昔人谓葬金玉而坟，是为盗标识其处，帝陵不加标识犹将虑盗，况阙观环之乎？下是官庶刻铭勤志，亦未免有类金玉之标识。刘向曰：丘垄弥高，宫庙弥丽，发掘弥速。要知葬也者，藏也，藏也者，欲人之不得见也。安事外饰以为身累乎？（汉武曰：古帝王之葬，不使人知其处。孔子曰：古也，墓而不坟，今丘也。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，于是封之，崇四尺。则坟乃是孔子始。按：墓是葬莹，坟则封土，《尔雅》曰：坟，高也。》

○两韩信非

司马迁、班固汉史《韩信传赞》中皆称两韩信，据其说韩王古韩国之后，项羽杀其父成，复立信为韩王，都晋阳，与淮阴侯韩信不同。刘知几《史通》辟迁、固之谬曰：韩王名信都，古韩国后，姓姬。则名信都者，非姓韩，亦不单名信，二史不别姬、韩两姓，且失韩王名信都字，遂与淮阴侯韩信无辨。余考班马误姬为韩，诚如刘说，但谓韩王名信都，刘知几亦差。王充《潜夫·姓氏论》云：沛公起，张良属焉，沛公使韩信略定韩地，立横阳君成为韩王，而

拜良为信都。又曰：信都者，司徒也，或为胜徒。《汉?功臣表》云：张良以厖将从起下邳，以韩申徒下韩楚。《汉春秋》作信都，信，音申。《史记》亦作韩申徒，良传直作韩司徒。盖信都、胜徒，昔贤谓司徒之声转。然则信都乃张良官名，即非韩王名，知几之说，亦未免缪，何班、马贲乎？

○三策中原

周公瑾胜曹操于赤壁，进计孙权，乞由蜀结韩遂、马超于关中（时超、遂反操于关中），还由襄阳取宛、洛，北方可图也。诸葛孔明说先主亦曰：天下有变，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向宛、洛，将军以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（关中别号），二说皆欲由关以捣魏之里，由襄以制魏之表，使之腹背受敌，则中原可举。公瑾谋之不及行，孔明行之不及竟，又公瑾之谋蜀非吴有，孔明举事荆非蜀有，所以罔功。宋南渡，张德远出帅川陕，实祖周、葛遗策，全有吴蜀又孙刘所无，而竟如是可见兴废有天，善乎诚斋之言曰：天与时相遭，则以百败之汉高取百胜之项羽，天与时相违，则以刘葛之雄杰熟视孱弱之曹丕。

○川陕江河上游

昔人谓川陕系南北重轻，盖其势各占天下上游，得之则可顺流收下流之利。黄河南注，永兴秦凤居其上，故据陕则可顺黄河之险、江汉之险下瞰吴楚，而取中原也易。张德远图复宋祚，首身任川陕，计盖出此，而以富平一跌弃之，岂知公之所以胜者哉！

○子冠氏上

子者，男子通称。孔子大圣，孟子大贤，例只称子。孔子复号夫子者，邢丙《孝经疏》云：孔子尝为鲁国大夫，故弟子连官称尊之，以别余人也，后之尊师者因例曰夫子。近时朱文公称周、程特曰：子周子、子程子，复于姓上系子，按《公羊传》曰：子沈子、子公羊子、子司马子。何休释云：加子姓上，名其为师也，若非师而但有德者，不以子冠氏上。朱子于周、程盖师尊之。

○三大处置

汉初病于诸侯强大，主父偃建分王诸侯子弟之说，诸侯遂弱。唐衰，病于藩镇跋扈，赵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钱谷之计，藩镇遂消。宋南渡息兵，张、刘、岳、韩拥兵方面不释，秦桧各除枢密使召之，由是兵权去手。偃之说贾谊发之，普之说乌重允发之，桧之策范周言之，但偃、普忠谋，桧则奸谋也。

○大横

二《礼》灼龟之法：卜人占坼，汉文入立，卜兆曰：大横庚庚，余为天王。应劭注：龟文正横也，而横所以吉之义未详。按《占人贾氏疏》云：灼龟，灼其腹骨近足高处，占其坼兆，直向背为木，直下向之为水，斜向背为火，斜向下为金，横者为土。朱文公解《易》因谓：汉文兆得横，木得土也，所

以吉。

○十二州

黄帝画野分州，封域才经见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统言得百里之国。《万世通鉴》刘纪善：黄帝土地东至海，南至口，北逐薰鬻，封域皆九州内。舜肇十二州。孔安国传《书》谓：析青为营，析冀为幽、并。郑氏因疑析青、析冀之说，谓《王制》言四海之内九州，州方千里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，七十里之国六十，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。此时并地法行，州有定域，国有定制，不可得而增减者也。今曰析青为营，析冀为幽、并，则二州地削于七州，古制紊矣。况冀为天子之都，岂可削哉（先儒谓《王》言国制与五经背驰，难尽凭，但冀为王畿，乃制度所当先定者，不应泛然在可增可削之外）？或者九州外别建营、并、幽三州，且流共工于幽州，正以罪人屏之荒服外之穷处。若析冀为幽，则近在王畿，何取为流窜哉？今按《书》正文，幽州之州从州。《左传》叙四凶投之四裔。裔，远也，远则非近冀之幽矣。况流四凶在治水前，时未析营、并、幽，无幽州之名，孔子《书疏》著邹衍说，曰：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九尔，中国名赤县，内有九州，《禹》所叙是也，中国外如赤县者亦有九。《汉书》颜师古注亦谓：九州外别有营、并、幽三州（余谓天下之传久矣，竟莫究三州所在，故疑二说荒诞。但地镜尽括地著地中脊曰：昆仑其东南方曰神州。贾氏《礼疏》曰：昆仑在西北，别统九州，其神州东南一州，其禹分为九。又曰：神农上有大九州，曰桂州、神州之类，今惟有神州分为九。征《汉书注》：昆仑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地之中也。《博物志》：昆仑，赤水出其东南，瓠河水出其东北，瓠水出其西北，瓠刺水出其西南。瓠河水入东海，三水入南海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昆仑有五水环其墟，其东南流为中国河。朱文公曰：地形犹馒头，昆仑山犹扬尖处，其水四分，合以山势求之，黄河始昆仑，泻入中国，不应偏居一隅，三隅亦有少焉。据《禹贡》导山、导河、导江皆始于西，则中国特昆仑一面，九州外之州必有无限，不特营、并、幽之名也）。传记言：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，共工氏霸九州，帝尝制九州。则九州古地，益为十二则始舜，禹平水复仍为九。故商以来，但言九围、九有。《周礼·职方氏》亦只列九州（邹衍言水中可居曰州，尧遭洪水，地之高可居者有九，故州以州名。古州惟十有二，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名遂次于州）十二州非古制，明矣。但析九为十二不无紊，并制之疑。意黄帝肇封地之广，容有封制未尽者，舜因其隙复创三州，故三州与九州并列，必尽九州析也。郑疑盖拘孔传，若《王制》难凭，亦为以今九州幅员计之，百里、七十里、五十里之国须数十倍建置可也，岂三十、六十、百二十八国之能限哉？《王制》盖又拘地方千里之论。若流共工于幽州，盖为北裔水居之洲，近冀之幽非也。

●卷三

○古文不相袭

河南邵氏班固作史，不敢辄易司马迁之词，谓孔子作经，读《易》者如无《春秋》，读《书》者如无《诗》，固所不知也。唐李习之曰：六经创意造言，皆不相师，故读《春秋》也，如未尝有《诗》，读《诗》也，如未尝有《易》，读《易》也，如未尝有《书》，读屈原庄周也，如未尝有六经。洪容斋云：六经之后，百家之言与老聃、列、庄至于刘向、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，余观后世读书能得古意者惟昌黎，曰：上规姚姒浑浑无涯，《周诰》、《商》、《盘》佶屈聱牙，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，《春秋》谨严，左氏浮夸，下逮庄骚，太史所录子云相如，同工异曲。李汉曰：《易》繇爻象，《春秋》书事，《诗》咏歌，《书》、《礼》别其伪。皆不以一概视经，窥见古人者熟也。立言如此，意者濂溪《易补》、横渠《正蒙西铭》、邵子《经世书》抉理剔微，皆无一言相袭，至羽翼六经，又汉唐诸子所无也。故陈寿缘迁、固而不美于史，范宁缘歆、向而不美于《谷梁》，《文中子》之书识颇正大而拘拘模仿《论语》，皆后人之疵。宋子京曰：文章必自名一家，然后可以传不朽，若其体规画圆、准方作矩，终为人之臣仆。黄山谷曰：文章最忌随人后。杨东山曰：丈夫自抱冲天志，莫向如来行处行。观此则诸贤所以传不朽者有道矣。

○《左传》非邱明

《左传》叙及韩、魏灭智伯事，时去孔子卒已十六年，后儒以孔子有“左邱明耻之”之语，遂谓传为邱明作。自汉以来，如出一口。唐啖助为《左氏》学，始言别有左氏，若夫子言左邱明，盖史佚、迟任之类，便谓左氏为邱明，非也。宋伊洛诸儒研经最精，伊川谓《左传》无邱明字，未可考。朱公以传叙及韩、魏杀智伯事，谓传是个博记人作。答黄义刚曰：左邱是古有此姓，左邱明自是一人，作传左氏又别一人，必非邱明。程公说：《春秋》分晓，首辨传非邱明，谓《公》、《》皆子夏门人书，疑《传》亦出孔氏门人之门人，盖书多战国秦语也。然未尝剖析指证其迹。乡先达万见春镇尝著论，辨《传》非邱明作，云：古者天子建德，因生赐姓，岂止一邱明姓左哉？卫有胥靡逃之魏，卫君请以左氏易之。韩非《内储说》著左氏卫之都邑，若以邑为姓，则后之子孙皆可得姓，不止邱明可姓也。杨雄曰：左氏品藻。司马迁曰：左邱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独刘歆《七略》断然曰：左邱明与圣人好恶同，亲受经于仲尼而作传。三人同出汉朝，立言异同如此（余按：称传为邱明作始司马迁，刘歆引传解经，书方大传，后人遂皆祖歆）。自歆以《左传》为邱明，其后诸儒从而和之，至杜预集其说注《春秋》，遂锢不可解，所以乘虚袭伪而不察者也。尝以《传》语考之，左氏端为战国时人，当战国时，齐有邹衍著书推五德之

运，以符应为验，而昭九年《传》云：陈，水属也，水火配也，而楚所相。哀九年：炎帝为火师，姜姓其后也。凡此等语皆与邹子同意。周官保章氏虽以星土辨九州土地，然不言某国为某星。自三家分晋之后，堪舆书出（亦出邹衍）。十二次之说行，始有燕为木，赵为火，梁齐为元枵，卫为豕韦，吴越为星纪等说。而左氏昭十一年《传》云：今岁在豕韦，岁及火梁。襄二十八年《传》云：岁在星纪而淫于元枵。凡此等语皆与堪舆书合。酌酒之名起周末，而《传》叙郑人对晋曰：寡人以朝见于尝酌。秦惠王十二年初腊，《传》叙宫之奇之言曰：虞不腊矣。秦孝公时商鞅始立赏级爵，曰不更，曰庶长，而《传》云：秦败绩，获不更女父；又云：秦庶长鲍帅师及晋战于栢。如此数者皆出《春秋》后，而左氏之《传》其为战国时人可知矣。又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使邱明果受经于仲尼而作传，必当达圣人之旨，何公子彭生之为豕，太子申生之请帝，伯有之厉沈，台骀之为祟，鲧化黄熊，石言于晋，内蛇外蛇，新鬼故鬼，鸟鸣亳社，神降于莘等说，累累书之，是足信左氏非受经之邱明，明矣。

○班史出刘歆

葛洪《西京杂记》后叙云：洪家有刘子骏《汉书》一百卷，无首尾题目，但以甲、乙、丙、丁纪卷数。歆欲撰《汉书》编录汉事，未铨次而亡，故书无定本，杂记而已。后来班史始全取刘书，小异同尔。固所不取者，洪抄出为《西京杂记》，观此则固史之妙，端有自焉。

○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

公羊、谷梁二姓自高赤作传外考之，前史及后世更不见再有此姓。万见春尝谓：公羊、谷梁皆姜字切韵脚，疑其为姜姓假托也（按文公《语录》已有此语）。盖战国时去春秋未远，传之所载多当时诸侯、公卿、大夫及其家世事迹，有当讳悔者难直斥之，而事之直者又不容曲为之笔，故高赤传其事，因隐其姓。后世史官于当代难言之事，每缺之或晦其姓名，疑其辞义。高赤缘时忌，没其姓，容有此理。《左传》作者之名曾无真的，是传者亦欲假托也（按：二传皆云出自子夏，子夏授《公羊》高，汉景帝时胡毋子都始以《公羊》著之《竹书》。梁云秦孝公时人，其书宣帝时始传，先儒因谓二书皆作自汉。孔颖达曰：《公羊》，道听途说之学。杜预言肤引《公》、《》，适足自乱大观。群与曰：《公》、《》诡辨之言，非先儒说，或者又汉儒假托也）。

○形容失当

汉武本穷兵黩武之君，相如《谕巴蜀檄》首言蛮夷自擅不讨之罪，次言陛下存抚天下，安辑中国，发使靡有兵革之事等语，虽皆为武帝文过，然初不为尊者讳。唐明皇宠贵妃实为子妇，白乐天《长恨歌》乃曰：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。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。其后诛贵妃实六军迫

之。杜子美《北征行》乃曰：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妹姐。白秘其为子妇，杜归之于内断，皆立论当然也。唐取蜀擒刘闢，韩退之诵圣德曰：婉婉弱子，赤立伛偻，牵头曳足，先断腰膂，次及其徒，体骸撑拄，末乃取，骇汗如沬，胥，挥刃纷纭，争寸脰脯。模写惨毒之状，惟恐不真，不知刑而如此，非宽大之朝所宜有，可谓之元和圣德乎？东坡《钱氏表忠观碑》言河东刘氏百战死守，以抗王师，积骸为山，骊血为池，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。虽影带钱氏不烦兵而下甚好，而于有宋以仁厚兵不血刃之意非矣。此皆文人形容之过。尝记唐牛元翼除制一联，昔人谓语胜《尚书》：杀人盈城汝当深戒，戮尔众朕不忍闻。制自元微之作，信大哉，王言也。

○古事难诘

《礼记》记文、武梦龄之事曰：文王九十七而终，武王九十三而终。据其说武王少文王四岁，然文王崩，武王未及终丧，伐纣其曰十有一年，武王伐殷者通文王九年，大统未集计之也，克商二年而武王崩，出入才七年，是文王七岁生武王，况伯邑考武王兄，刘氏《外纪》且明著文王十三年生伯邑考，不知男子十三有生育理乎？若以武王后文王七年崩较之，生伯邑考才四岁，故梦龄纪年难据（按：文王大统未集而终，越二年为誓，十有一年帅师孟津伐殷，十有三年大会孟津，克商，既二年，《金縢》著王疾，弗豫，则武王后文王崩仅七年）。及武王崩，成王嗣，郑康成《书》注谓年十岁生，《通鉴》谓王三岁，则武王生成王年登八十上。史以成王为武王嫡子，故立，则成王母邑姜也，武王年八十，计邑姜最少亦不下六十矣。史又言唐叔为成王同母弟，邑姜之年又不知几何。孔子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生，二十三年壬子岁父叔梁纥卒，孔子时三岁，故不知父卒葬，诚有之。逮周敬王十七年癸酉岁母颜氏卒，孔子时二十四岁，越明年乃求合葬于防。《礼记·檀弓》言孔子少孤，不知父墓，母死，殡于五父之衢，问于鄆曼父之母，然后得合葬于防。然叔梁纥卒，孔子虽少，其母尚在，岂不能示以父墓所在乎？《史记》著叔梁纥年七十娶徵在少妇，因野合生孔子（先贤释野合为野哉由也，不备礼之谓）。徵在耻，故长不告孔子，缘此孔子不知父墓。窃谓娶不备礼，不告其子，容有之。父死，葬不告处，恐不然也。且孔子万世人伦之表，年如此而父墓不问，何以为孔子？《檀弓》又言孔子既得合葬于防，防墓崩，泫然流涕曰：古不修墓。圣人举事审重，未必旋踵而崩，又不修墓则当听其崩坏乎？凡此见汉儒之言古事，不复验之人情，参之道理，只是臆说。

○洞庭古九江

《汉志》言浔阳九江，曰乌江、蚌江、乌白江、嘉靡江、畎江、廩江、提江、江、源江，孔安国《书传》“九江孔殷”，援以为证，不知浔阳今江州

，在《禹贡》为扬州之域，《禹贡》“淮海惟扬州”在孟渚之下，但言三江既入，至“荆及衡阳惟荆州，江汉朝宗于海”之后，始言“九江孔殷”，“云土梦作”，其后“导蟠冢至于荆山，内方至于大别，岷山之阳至于衡山”及“岷山导江”之后曰：“过九江，至于东陵。”（东陵即巴陵，江北夷陵号西陵。故岳东陵西）以经考之，《周礼·职方》云：荆州藪泽曰云梦。释者谓：云梦，泽名，方八九百里，华容、枝江、江夏、安陆皆其地（据《礼》云梦只一泽。按《书》言“云土梦”，已析云梦为二。《传》昭三年郑朝楚，楚子田于江南之梦，云卅子之女生于文，弃之梦中。入郢则梦，梦，泽也。定四年：吴人楚子涉睢济江，寝于云中，则云一泽也。按江北为云，即今玉沙、监利、景陵等县，江南为梦，即今公安、石首、建宁等县，跨江南北因总谓之云梦）。凡《禹贡》叙九江皆在今荆衡之域，《唐志》以岳州巴陵是九江。《山海经》云：洞庭山在九江中（《博物志》言君山即洞庭山）。张勃《吴录》曰：岳之洞庭，荆之九江也。近世胡旦晁说之皆以九江为洞庭。建安蔡氏释《书》援《水经》曰：九江在长沙下隼西北，又援楚地说曰：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间。按：洞庭，九水所聚，沅水、渐水、元水、辰水、叙水、酉水、澧水、潇水、湘水，九江非浔阳，明甚。郑印亦云：《禹贡》九江在荆州，即今岳州洞庭，但析九江之日，无渐、酉二水，而附锦、靖二水，然均为九江也。唐孔颖达谓：浔阳九江之名起。近朱文公尝著《九江辨》，以洞庭、浔阳九江各不同也。余以《汉志》考，当在九江郡（今淮东江西诸郡），汉复置九江郡（今淮东滁、和、贞、濠、寿九郡）。如此则浔阳九江自秦始，而洞庭九江则古也。

○禽释擒

《易》曰：“即鹿，无虞，以从禽也。”伊川解无虞人而即鹿，是有贪禽之心。“王用三驱，失前禽。”释者云旁走者不射，惟向前背走者射之，不中而已，故失前禽。则鹿言禽，驱走皆禽也。《礼记》：鸚鵡能言曰“不离飞鸟”，猩猩能言曰“不离禽兽”，如《特牲》“邮表禽兽”，下文专以猫虎言之。《月令》“祭禽于四方”及“豺祭兽戮禽”，释皆云：禽者，兽通名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以禽作六贄，雁、雉、鸡、鹜，外虎皮、羔其二。《庖人》：禽兽春羔豚，夏居肃，秋犊，冬鲜羽。因谓凡鸟兽未孕曰禽，且援《白虎通》说曰：禽者，鸟兽总名。《大司马》：“大兽公之，小禽私之。”贾公彦疏曰：已孕曰兽，输之于公，未孕曰禽，曰众得之。又孔颖达《礼记疏》曰：禽者，擒也，方力小可禽制也；兽者，守也，言力多不易擒，须围守而获也。详众说则禽不拘羽，故古人言荒于猎者曰禽荒，曰从禽不别言兽，以小大兼猎，禽足赅之也。又《左传》擒获字例单禽，而柳下惠名获字禽。则禽者擒也，孔说亦然。独《尔雅》言二足而羽为禽，四足而毛为兽。然其言飞曰雄雌，走曰牝

牡，不知《诗》：“雄狐绥绥”，则雄雌不特飞也。《书》：“牝鸡之晨”，则牝牡不拘走也。故贾氏辟其说非通义。余按经中惟二《礼》乘禽，《易》?系》隼者禽也，《公羊》鸛鹤来巢，曰非中国之禽，惟言羽馀多兽通名，使禽果羽之雅言，则《书》之“鸟兽跄跄”、“阳鸟攸居”、“鸣鸟不闻”，《易》之“鸟焚其巢”、“飞鸟遗之音”，《诗》之“黄鸟”、“玄鸟”，《记》之“不离飞鸟”、“故鸟不橘”，《礼》之“罗鸟”、“鸟共卵”等语，圣人皆当易鸟以禽，何必若今之直叙邪？

○终命椽笔

《洪范》九五福：富、寿、康宁、好德外，考终命居其五，此非生者之美也。后人祝颂概曰：五福全备。不知考终命之当讳。晋王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，觉而语人曰：此当有大手笔事。俄而晋武帝崩，哀册谥议皆属草，而笔如椽事，后人不辨为不祥之笔。

○封略自然之险

苏秦说战国诸侯，各言其四封之限。盖国有限界方可自固。狄梁公曰：天生四夷，在先王封略之外，故东距沧海，西阻流沙（沈括云：流沙履之百步皆勒如轩幕上，或人马车驼无子遗，几千余里，四面茫然，以人畜骸骨为志，每风将作，老驼知之则聚鸣，而拥其鼻口，否则危毙），北横大漠（浮沙数千里，逾者进寸退尺，暴风一起，沙卷如席，压人，多不能出，毙者牛九），南隔五岭（瘴雾能死人，其外限以恶溪、沸海。恶溪逾者脚腐，沸海鳄产其中），此天所以限中外也。后世封略不谨，华夷混处（按周东迁而后吴、越、楚、蜀尽蛮，陇、秦、晋、魏悉戎，南陆浑，河西白狄，淮有群舒处诸隗，洛阳有扬拒、泉皋、陆浑、伊洛之戎，衣冠俗无几也，至邾、曾、郚处鲁甸而用夷号，徐在京东而有夷名，当时四夷错居中国，汉魏以来然矣。至东晋中原消磨混一，其原皆出夷狄）。先王荒服之制既混，识者犹欲守在四邻，然泛言守，亦难。尝以天下大势考之，莫不各有自然之险，河北以居庸诸关为险，盖居燕百里外，关外名虎北口，即汉上谷郡，其山西连太行，东亘辽海，狼居胥诸山为襟带，关南北通处路绕两崖间，风起人行，或为所掀。彭文子谓隘如线，侧如倾，其升峻绝，其降如趋井。下有涧，巨石磊块，凡四十五里，甚艰折万状。山外寒气先山甫两月。燕之东百里曰榆关，盖由虎北口下皆乱山层复，至此循海，方有狭径，辽东诸州之障阻。昔时守以士兵，狄不能入。自石晋割关南十六州，刘仁恭割营、平、栾三州赂契丹，由是北自定武达辽海，千里失险，凡汉唐所以限狄者，狄皆有之（按：汉北边之中曰定襄、雁门、云中，各有要害，夷狄患多出朔方，即今灵夏州，而山河无几。其后拓地逾塞，关外皆汉有。光武兴，民苦胡寇，尽徙居关以东，唐藩镇崛起，田承嗣有幽燕十六州也，唐

无北顾之忧者，惟据诸关故也）。宋兴，诸关皆在契丹里，故太祖、太宗尝有志取燕。燕人宋琪时言古北口、野狐门、松亭关三路，晋有古人堡垒成迹，于此置守，南牧自绝。后富弼使北，亦言土人云：若守居庸关、古北口、松亭关、符家寨则虏不得南矣（按：《书·禹贡》：导山自梁、岐、荆山，逾于河，壶口、雷首至太岳，底柱、析城至王屋，太行、恒山至碣石，入海。则河北诸山发原雍西，逾河而冀、而幽、而营，至碣石入海，盖天然华夷之限，秦筑长城起临洮，尽辽东，史亦言因地形，制险塞）。五代失险，周世宗首于深冀间浚胡卢河为限，宋守塘滦而雄霸二州间，塘水不接，遂中置保定军，馀塘水亻漫而保州以无，多植榆为蔽。宣靖间童贯辈争燕云而不取险，故岳飞曰：金坡诸关不获，则燕云未可有役。金人逾关，黏罕叹曰：关险如此，而我过之，南朝可谓无人。由此观之，居庸诸关河北屏蔽也。至越河而南，黄河、潼关乃中原之蔽，宋失汴保江关，河置而不问，又《夷录》载金有蒙患，南徙都汴，保关守河。黄河自洛阳、三门、积津东至邳州、桃园、崔镇，东西长二千馀里，设四行院，每行院管五百里，以精兵二十万守之，夜则传更，冬则敲冰，潼关边西南大小关口三十六，约千馀里，亦设四行省，分精兵十万守之，布置周密，水泄不通，如是垂十五年。北兵渡河不可，越关不能，乃谋闯山东，假道宋，由蜀出襄、邓，金坐此不支。由此观之，黄河、潼关，中原屏蔽也（按：刘宋元嘉中，与魏争河南，魏敛戎归北，宋围魏高敖、滑台、洛阳、虎牢，刘守南岸至潼关，其后魏主引兵南下，四镇各失守。晋杜预尝于孟、潼建河桥，五代兵争者束枪结筏，或候水而渡，则黄河不如江水迅急，及岸甚易，水面或有高于地面处，所以多决，汾河古谈长堤限水，其守必以兵团）。若东南以大江为固，而防人守江多在江北，吴人筑濡须坞，修东兴堤，城巢湖，皆守淮蔽江。淮东地多石碛，险在水，关中地重冈复岭，险在山。胡安国尝言欲固上流，必保汉沔（汉上流曰沔）；欲固中流，必以重兵镇安陆；欲固下流，必守淮泗。张魏公亦曰：淮南之地，正所以蔽大江，无淮南则长江与虏共，彼得淮南因粮就运，以为家计，江南其得安乎？盖淮南鱼盐桑麻之富地，他郡不可比，所以守江者急宜保淮。杨诚斋曰：有淮而后江者吾之江，无淮则江者非独吾之江，亦敌之江也（按：淮水二千里，其北方水道通淮有四，汴、颍、涡、蔡也，其通南方入江，江淮老鹳河故道在淮为南北喉襟，荆襄南国门户者，其地左顾关、陕，前瞰宛、洛，右通吴会，后接巴蜀，昔人谓得人则中原可定，失人则社稷可忧，是也。但处四达之冲，中原交经可入者错出。胡五峰谓其地利进取，不利固守，须以兵险近时固荆）。长安东有函关，南有散关，西有陇关，北有萧关，故号四塞之地。汉祖东据函关，必外严荥阳、京索之守，若西则玉门、阳关，古称天限。汉魏世氏羌徙居关辅，实处其衷，故汉言三辅利害者，欲保西

凉州（其地南隔氐羌，西通西域，北断匈奴右臂。汉武取休屠王地建州，今名姑臧、嫩煌等郡）。唐苦吐番，元载欲城陇山口原州（按：陇西南连秦岭，北抵黄河，东西一百八十里，其坂九回，上者七日乃越。登陇东望秦外，极目泯然，陇外无蚕桑，八月乃麦，五月冻解。汉隗嚣据凉蹇陇，光武遣来歙取之，密谋山道而后济，帝复自帅诸将攻关）。宋经略西夏，韩范议取横山，唐张仁愿守朔方，河外筑三受降城。由此观之，关中四隅之守，又各有要地。蜀险，李熊尝谓：北据汉中、杜褒斜，南守巴郡、拒峡口，东下汉水，可窥中原，南顺江流，可震荆扬。所以计蜀悉矣。近代宋保蜀，以南制北，阶成、岷、凤为藩篱，汉中为门户。绍兴中固蜀专倚凤州和尚原，其后金欲割之，帅臣胡世将力争不可，四州内汉中虽有诸关而支径甚多，故和尚原守蜀之要也。南方限以五岭，瓯、粤无西北之劲，中国反以象犀珠贝所在通焉。三国曹操守洛阳，东拒吴倚淮汉，西拒蜀倚秦岭。故魏明帝以为地有所必争，观此则守国之险可无哉？

○古税不拘什一

《禹贡》田赋别上、中、下九等。《周礼》辨上地、中地、下地、有年、无年。魏平余法亦随上熟、中熟、下熟。《孟子》曰：请野九一而助，国中什一使自赋。则邦中郊外各不等，无概取税也。又：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，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。实九取一。班固《汉?食货志》谓九百亩中除二十亩为庐舍，耕只八百八十亩，符合什一之说。而《孟子》无此文。夏五十而贡，殷七十而助，周百亩而彻，其实皆什一也。百亩取一，彻是也，贡五十，助七十，若何什一乎？赵岐谓耕五十亩者，贡五亩，耕七十亩者，以七亩助公家。说亦什一。孔颖达谓：古者人众田少，故一夫惟得五十亩，殷一夫惟得七十亩，皆不具周数。然画井而田，古制也。具历夏、殷至周，周当生齿，富倍二代，岂有愈久愈耗乎？贾公彦谓：《周礼》地有一易、再易、不易之分，贡乃一易地，二百亩而税，百亩助，则上地百亩，菜三十亩，而税其半。彻则上地全税之。夫地古今共，是天下无缘可专有。贡地殷兼有物地与菜，而周全有彻也。此皆求合什一之说不通，因臆说也。按《春秋》鲁宣公初税亩（收公田外取八家私田）。杜预注：什取二，故曰：二，吾犹不足。《公羊》曰：大桀小桀，过于什一也；大貉小貉，轻于什一也。《周礼》载师凡任地园廛二十而一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，近郊十一，远郊二十而三，甸稍都鄙皆无过什二。则古税各随地之宜，不拘什一也。

○不署字之福

宋兴，王全斌平蜀，杀降兵三千人，曹彬争之不可，但不署字，收其文案。他日艺祖诘责，彬以不署字得明。文潞公、刘沆同官中书，仁宗不豫，有告

禁卒谋反者，潞公诘知无他，令斩告者。或启公委刘相处分，遂属沆。仁宗疾平，沆白上曰：陛下病时，彦博斩告反者。索卷视之，沆独无着笔，遂得释。二臣当危疑间，皆以不署字脱祸，若曹本不与谋，而沆乃同事异心，又从而讪之，真岌岌乎小人之用心。余邑旧有帅司酒，课例设监酿一员，月有薄给，宰每私人某宰处以处客，客智士也，受给不废。督视第酒计出入，不犯一笔，后客去，帅司磨酒课，迫逮合千人，客独以无迹免，此亦不署字之福也。

○大计不惜小费

司马温公曰：天地生财，止有此数，不在官则在民，譬犹夏旱则冬涝。虽曰救正荆公一时之偏，实古今财计乘除一的论也。然有国者操敛散之权，后世又有摘山煮海，曲尽阜生之道，非止天地之生也，犹曰乏财，拙亦甚矣。唐刘晏领漕运，与造船执事钱皆过与曰：当先使之私用，无窘则官物坚完矣。其后有司减半，漕运遂废。谢君直论六国成败曰：秦兵百万，六国兵不下四百万，秦能灭六国者，黄金、爵级、敢战，则得六国所有美人、珠玉也。沛公兵十万，项羽兵四十万，沛公终能灭楚者，轻侯王以赏战士，捐金帛以富功臣。项氏即方元可而人心已在敌国矣。高祖令陈平间疏楚君臣，予以黄金四万斤，纵其出入，盖足陈平之私用，然后可责其为汉用。大率喜事赴功之人未必高洁不污之士，贤如王述犹有足则自止之论。矧平等皆楚降汉者乎？晋羊祜深知王，或言志奢侈，难信任，祜曰：浚有大才，将以济其所欲，必可用也。后卒平吴。使智勇建功，惟豁达大度者方可语此。唐李绛曰：钱用尽更来，机事一失不可复迫。所以晓世主者，至矣。宋艺祖经制西北边臣，悉厚以官爵，宽其绳墨，所部租税一不计其如何，故皆得其死力。赵普常言：桑维翰爱钱难用。上言：苟用其长，当护其短。又曰：契丹精兵十万，我以二十匹绢易一胡人首，止费我二百万绢。规模宏远如此，宜其光启一代也。

○忍字二义

小说著太公劝忍之言曰：吞钩之鱼，悔不忍饥；罹网之鸟，悔不忍飞；人生误计，悔不忍为。故唾面将襟拭，嗔来把笑迎，则知辱之当忍矣。被骂招功德，嗔来送福田，则知忍之为福矣。数语虽不真出太公，而著忍字之益，甚备。又唐人诗曰：忍事敌灾星，灰心缘忍事。张公艺至以百馀忍字九世同居，皆有得于惩忿窒欲之效然也。然忍有二义，鄱阳饶氏解《论语》“是可忍也”章，谓忍有甘忍之忍，有容忍之忍。甘忍之忍，正夫子责季氏之意，如州吁阻兵而安忍及经言残忍、忍人，大抵甘忍，为之而不顾。其说忍字有是非。梅亭李氏言：忍有二，有抑情之忍，有知道之忍。抑情之忍如饥忍食，砭忍楚，堤漏川决闲之惟艰；知道之忍则克己而复于礼，礼人而反其敬，如壹而霁，冰而澌，容而消之，所过皆化。其说忍字有浅深。人能由抑情之忍，以造知道之忍

，又能戒其甘忍之忍，然后忍字之义方备，不然季氏州吁之忍亦忍也。

○温公独乐园

古人遇不可有为之时，多有所记以自晦，文王囚里，忘忧于《易》；孔子辙环不遇，寄志《春秋》；范蠡知勾践不可共乐，游五湖而去；张良知高祖难与保终，托赤松子而行；萧何虑高祖之疑，买田宅以自污；陈平当禄产，擅权饮酒戏妇人；司马懿见曹爽等用事，假病为饮啜不收之态；刘伶、阮籍、羊曼、谢混，一皆用醉酒远祸。前儒谓张良智计过人，岂不知神仙为荒诞哉？萧何系狱，韩彭沮醢，良之明哲保身不特著，而为先蹈高隐，出汉初人物，然则陈平辈以酒避事，饮非真饮，醉非真醉也。司马温公熙丰间言：不见用，退居于洛，创独乐园，以浇花种竹为事，自比晋唐间人，公岂独乐者哉？伯父怡庵尝曰：古人之用晦不一，如豫让漆身吞炭，使人不识，是晦其形；范蠡去，号陶朱公；元结隐，称猗于子，是晦其名。公羊、梁，今古无此姓，独高赤托焉，是晦其姓。鲁三桓浚，公室乐官，师摯以下适齐、适楚、适秦、入河、入汉、入海，舍鲁而去，是晦其居。余因谓萧何、陈严、刘、阮辈假酒自困，是晦其行，张子房是晦其智，司马懿是晦其奸，若盟公自比晋唐间人，似欲晦其为宋忠贤也。

●卷四

○识其大者

六经后子书皆昔人垂世之言，惟《孟子》为经者，谈王道，贵仁义也。韩柳并称，昌黎独得祀孔庭者，辟佛老，扶正道也。《离骚》怨而实忠，所以骚名经。杜诗一饭不忘君，所以诗称史。苏老泉著《衡书》、《权论》，杨龟山曰：书名已不正，岂有山林逸民乃汲汲于用兵？王荆公编百家诗，置李太白于后，曰：十首九说妇人与酒。子美、退之各有示儿诗，子美曰：曾颜游夏则导之圣贤。退之曰：玉带金鱼则诱之利禄。宋文章多粹，伊洛发明孔孟，推究性理，便觉欧苏气焰不长。《毛诗?国风》，后代骚人极力摹仿不到；郑卫之诗，淫奔语也，被之弦歌，圣人必远观。此则所谓大者可识矣。虽然，此以文论也。鲁昭公如晋，自郊劳至赠贿无失礼者，女叔齐以为非所以守其国家，行其政令，无失其民者也。今政在大夫，公室四分，民食于他，鲁侯焉知礼。翟璜与魏成论功，李克曰：璜所进五人，君皆臣之；魏成东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，君皆师之。吴起与田文论功，将三军，摈秦赵，实府库不如起，至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亲，则起咋舌不敢谈。陈平为宰相，不问钱、谷、讼狱，丙吉为宰相，不问横道死人，但以镇国家、理阴阳、亲诸侯、附百姓为事，汲黯为九卿，拾遗补过，范文正公所至为政，敦礼教、厚风俗，皆识其大者也。故昔人论治必首三代，论人必希圣贤，论文必本六经，非过于矫亢也。

○今存经注

古之学者专门名家笺注经文者不一，其徒各守其师之说，所以某氏《易》、某氏《书》、某氏《诗》传授异派。自唐太宗诏诸儒撰定五经疏义，于《易》取王弼，于《书》取孔安国，于《诗》取郑康成，于《春秋》取杜预，由是他说尽废。今板行经注，四家之说独存，始太宗也。

○孔子生年

《左传》记孔子卒而不记其生，《公羊》记孔子生鲁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，《谷梁》以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，与《公羊》差一月。《五行书》谓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时。考庚戌乃鲁襄公三十二年、周灵王二十一年，与《公》、《谷》年月俱差，如《公》、《》则孔子乃生己酉，非庚戌也。故刘《外纪》谓：孔子年七十四终，与他书生庚戌终壬戌不同，三人之说异，从《公》、《谷》也。信《五行书》固不若信《公》、《谷》。然《公羊》言十一月庚子，而杜预《长历》鲁襄二十一年庚戌岁十一月无庚子（《左传》书孔子壬戌岁夏四月己丑卒，杜注岁四月无己丑，有乙丑）。故《孔子家谱》、《祖庭广记》俱云鲁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，与《公》、《谷》、《五行书》俱差，不知又有所本乎？或谓周建子，鲁襄十月实寅正八月，以改朔不改月之说推之，又不然。

○瞽瞍武后

古今事关纲常处最要知体，桃应问孟子：舜为天子，瞽瞍杀人则如之何？盖即其难处者覘之。孟子曰：执之而已。前辈卑孟子此答，以为天子父尊之至也，岂有身为天子不能屈法申父之理？《史记》著石奢相楚，奢父杀人，奢曰：以父立政，非孝也。遂自刎死。五代周世宗父柴守礼杀人，世宗不问。朱文公《纲目》特书之，以能权轻重也。欧阳公谓世宗宁受屈法之过，以申父子之道，且刑一人未必能止杀，残其父则灭天性，是固有当权轻重者，非可以杀人论也。张南轩莅官日，有以嫌疑讦父者，南轩以事关纲常，置状不省。近时某官宦江西，有子讦父私牛者，官论父罪，合杖。徐询子曰：汝居家孝否？子曰：孝。又问：子孝曾为父母代劳否？子对曰：尝代劳。遂移父杖杖之。处置真得体。陈□□曰：直躬之直，直也，君子以为可以无直，不可以无父；仲子之廉，廉也，君子以为可以无廉，不可以无母。其论美矣。又尝以武后篡唐，昔贤所以处之之说曰：武后易唐为周，得罪唐室，中宗武后子，又当有唐祚，尊其子而除其母，实于名义未安。然五王召祸，正为贼后未除。胡致堂谓：武后易唐为周，不得为高祖太宗之妇，大臣当告之宗庙，废之，中宗不得以母庇也。议论甚正，处置亦有理，且谓桀纣失道，汤武不得以臣庇君，管蔡间王室，周公不得以弟庇兄。文公《纲目》俱不之录，今于卫辄拒蒯事，识公去

取之意，公谓蒯得罪先君而出奔辄，只当见父子之为亲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，如卫大夫以蒯为先君罪人，请命天子，讨之，可矣。然辄听大夫所为，又似假手他人以胁父，于辄处心终未安，故只逃去为得策。《纲目》不录想为此也。然此可以全中宗母子之天难，以洗唐室篡移之祸。故南轩谓当并易中宗，盖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，非可私中宗母子。又尝究胡文定传《春秋》：文姜与弑鲁伯，其子庄公嗣位。文定曰：徇私情则害天理之大义，举王法则伤母子之至恩，此固论之难断者也。然文姜逐于鲁，孔子书之曰：夫人逊于齐。《传》谓去其姜，因绝不为亲也。文姜逐齐即归，哀姜逐齐不反，孔子例书曰：逊不缘以公。示轻重深绝之也。然则恩轻而义重矣，梁人有继母杀其父者，子杀之，有司欲当论逆，孔子季援文姜绝不为亲之说，但以非司寇擅杀论。武后迁中宗于房陵，岂有母子之恩乎？汉光武中兴，以吕后杀刘氏三王，背高帝约束王，诸吕几危社稷，谓不遗配享高庙，即位后迁吕后别祭园寝，追尊薄太后，为高皇帝庙配祀。然则致堂告庙弃废之论亦有本。

○言不相副

李长吉诗云：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王荆公曰：是儿言，不相副也。方黑云压城，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。昌黎《送孟东野序》首句：“物不得其平则鸣”乃一篇大意，然其叙言咎、禹假言以鸣，夔假韶鸣，伊尹鸣商，周公鸣周，此岂所谓不得其平者乎？东坡序《六一文集》前面言欧阳子之学推韩愈、孟子以达于孔、周，著仁义礼乐之实以合于天道。又云：自欧阳子出，天下争自濯磨，以通经学古为高，以救时行道为贤，以犯颜敢谏为忠，议论关涉什么大到，末后却只说：诗赋似李白，记事似司马相如。故皆启昔贤之讥，然则措辞立论，其可苟乎？

○矫古说之过

世人谈王者鄙霸，崇义者薄利，饰治者厌兵，秉正者贱术，循实者陋名，尚行者轻文，此正说也。余以古说参之，亦有后世矫之之过，霸于古为伯，《公羊》著周、召二公分陕东西而治，号二伯。释者谓：九州除王畿千里外，二伯各治四州半，故《传》曰：五侯九伯，女实征之（各四州半，而言九伯举全数也）。《诗·清庙》之私周公朝诸侯率以祀文王，则周以二伯领诸侯，实霸之始，特未有霸之号。《左传》：五伯之霸也。杜注：霸，把持也，把持天子之政（孔颖达曰：五霸字或作五伯。颜师古伯读为霸。司马温公曰：二伯职废，乃转为霸）。故《周礼》：九命伯，《礼记》：五官之长曰伯，三国吴求封为九州伯，晋桓元侈其父温曰：父为九州伯，皆长诸侯之号。司马温公曰：方伯连帅，能率其属尊天子谓之霸。又曰：王、霸，非若白、黑，甘、苦之相反。荀子论霸政曰：辟田野，实仓廩，便备用，阅材技，存亡继绝，卫弱禁

暴。又曰：不欺其民，不欺其与。又曰：重法爱民，皆非不善之目也。虽以粹驳辨王霸，然李于江曰：西伯霸而粹，桓文霸而驳，三代王而粹，汉唐王而驳。则王亦有驳，霸亦有粹也。盖王道所以安天下，霸道所以尊京师，本无粹驳之分也。《祭义》曰：至弟近乎霸，使臣子扶持王室能如弟之顺兄，何不可之有？自孟子羞称五霸，说者遂视霸为强梁之义，不知仲尼不道、孟子羞称者，以桓文假公济私，非真有扶持周室之心，羞其人之不诚也。岂谓霸为不足尚哉？又孟子多有激而论战国诸侯，慕尚桓文又迷于功利，慕桓文而不至，故曰：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。孟子方以王道进诸侯，因例卑桓文。今承其言，果谓霸为非，不可也（南轩但以公私辨五伯，王者无所为，伯者有所为）。“利”之一字大，《易经》，四圣之书，“利贞”、“利有攸往”等语每卦必言，何尝不择利而行者。财利虽曰害义，孔子赞《易》：“何以守位？曰仁”。便次以“何以聚人？曰财”。十三卦之制作，首以畋渔之《离》，耒耜之《益》，交易之《噬嗑》，且舟车致远以通之，击柝弧矢以卫之，所以为财计者甚密。然后宫室、棺槨、养生送死可无憾也。孟子言王道之始，在墙下之桑、鸡、豚、狗、彘之畜数语，人主享有天下之奉，膳服、祭祀、宾客、朝覲、聘飨、水旱、兵凶，尤非可以空谈理也。故禹平水土，必先贡赋。《周礼》衡虞亦且设官，世儒不察，何必曰利一语激于齐梁，懵不知义，遂谓财利孔孟不尚，则士当知讳。不幸国用告急，则仓卒聚敛之不恤，是皆识偏论固之所致也。不知君子惟当见得思义，谓当讳、不尚非也。兵者所以威不轨，备不虞，羲、黄、唐虞可谓淳矣，而神农伐补遂，黄帝伐涿鹿、征蚩尤，尧伐兜，舜伐三苗，皆不得已而有者也。矧叔末血气之私愈炽，利欲之争不息，饬仁义者动以去兵为美谈，不知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秦销锋镝，卒肇锋镝，晋去武备，卒开武备。宋襄仁义，梁武讳战。皆不满识者一笑。可以卒伍之法、车乘之赋、菟阅之时、击刺之教、侵伐之事轻之，国家常政，干戚卫文德，俎豆寓军旅，虽圣人不废。或者顾谓孔子不学，不知有激而云也。故古人戢兵，不曰去兵，偃武不敢忘武。今饬治者欲讳兵不事亦非也。术之一字，只道理之巧者尔。天下之事有不可直，遂须委曲斡旋，成之，亦是道理理合如此，不成，朴直付之无可奈何，便已。齐王爱牛，孟子进以仁术，是乘其善心之发诱之充拓，不成，谓其不足进此，安其爱牛而止。今之治众有方曰政术，教人有方曰道术，思虑之巧曰心术，术非不善之目也，特随所施之邪正有美恶尔。名由实正，犹形影相随，故名教、名检、名节皆砺世之具。君子修之则善名生，小人悖之则恶名著。三代之王必先令闻蚤有，誉于天下，中庸取之。卢毓曰：常士畏敬慕善，然后有名。宋范尧夫曰：人若避好名之嫌，则无为善之路矣。士处穷约，若无美名，人何从？知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，特在上之人因名索实尔！今谓之鄙

，亦非也。若夫文之为文，古不专以辞采言，凡文之义只有条理不相紊乱之谓。俗学之说兴，谈文者指为末技，不思尧、舜、禹大圣，《书》赞之曰：文思、文明、文命，孔子称尧曰：焕乎，其有文章。子贡称夫子之文章：子以四教，曰文、行、忠、信，值匡人之围曰：天之将丧斯文，天之未丧斯文，此岂摘华藻之末哉？先儒谓文乃古先圣王经世之道，有以制度礼乐言者，有以道德言者，有以辞藻言者。辞藻则世人浮华之辞；道德则六经精粹，万世之辞；制度礼乐则圣人制作维持斯世之法程也。盖上古洪荒朴野，斯人禽兽之不如也，圣人出而污尊A饮易为俎豆揖让，土阶茅茨易为上栋下宇，蕢桴土鼓易为八音六律，兽皮鸟裳易为袞冕黻舄，事有条制，上不可陵，卑不可僭。凡其粲然可观者，皆文也。故语曰：文之以礼乐。特上古生齿未富，俗淳事简，羲黄可以游乎无为之天，而文为可略。尧舜以来，俗日熙，事日繁，儆不事为之制，尚仍朴野之旧，则世浸以紊，故夫子称尧曰：焕乎！其有文章。称周制作大备曰：郁郁乎文哉！皆美制度礼乐之文也。子由古史曰：文之为言，犹曰物各得其理尔。昔者生民之初，父子无义，君臣无礼，兄弟不相让，夫妇之伦理不立，后圣审其淆乱，从而属父子，辨君臣，联兄弟，正夫妇，削去鄙野之习，遂文于前世，此世所以称治也（《考工记》：青与赤谓之文，赤与白谓之幸。亦曰：绘画之事后素功）。周衰，王政不纲，幽厉以乱，故诗人刺之曰：动无礼文，天下荡荡无纪纲。文章盛衰系世治乱，如此向使冠昏飨射之制存，则乖争之俗不作矣；朝觐聘问之礼存，则崛强之国不闻矣；宫室车之有等，则僭拟之风不起矣；号令赏罚之既行，则统御之权不失矣；文之秩然者常存，则世之泰然者常在。先王所以有贵于文也，后世动以末技视文，岂识文之所为文哉！

○与齿去角

颜师古《汉书注》：董仲舒策语云：牛无上齿则有角，其馀无角者则有上齿。参之其信然。按韵书角字注：人下用，音榘，头角上出也，触也，竟也；两点下用，音鹿，四皓名中角里先生，正同音。宋崔尝辨正二字，未释其义。余按《诗·行露》“谁谓雀无角”，陆氏注：雀有朱无角，且援东汉注云：角谓觜。故晦庵《诗传》作鹿音翻。董敬庵（云章）双峰谓同鹿鸟朱骨也。鸟有朱者无齿，兽有齿者无朱，此天有所分予也。盖从曾氏说（字书只有角字，无两点下用及丿用之字）。

○寺观藏

汉改秦典客官为大鸿胪，掌诸侯，归义蛮夷，古行人之官也。因设鸿胪寺待四方宾客。水平中，佛入中国，首名其居曰白马寺（以白马负经来，故号）。盖并缘鸿胪待四方宾客之故。此中国有寺之始，详其故寺，非佛得专。汉世官有九寺之目，刘昭注曰：寺，官舍也。《风俗通》：寺，司也。又曰：寺

，嗣也。理寺之吏，嗣续之中，则非独为佛也。观之义《礼运》仲尼与于蜡宾事毕，出游于观之上。盖鲁有两观，门旁高处也。《尔雅》释观为阙。孙炎曰：宫门双阙，悬法象，使民观之，阙居巍巍高处，因名象魏。谓之阙者，观法象则可阙去疑事。《春秋》晋楚必阝之战，潘党请收晋尸，筑为京观，封土，观示后人也。胡澹庵言：观有四，一曰朵楼，鲁两观是也；一曰藏书所，汉东观是也；一曰游观处，谢元晖赋属王观是也；一曰高可望，《黄帝内传》置曰始真容于高观上是也。今老氏居，疑本内传，详此观非老可专。凡高可纵观皆观也。至于藏，只贮藏之义，狐兔穴居州吕藏，老耽为周守藏吏，名柱下史，藏乃度书所。汉东观藏书，号柱下史藏室，书所在也。释道法其制度经，遂为二氏之私，今复以事祈禳，岂以经典所积，福可集乎？若铎钹，胡致堂谓本西夷乐，夷俗吉凶并奏，今华俗专以送终，不察夷亦以从吉也。

○圣贤纲常之变

娶妻必告父母，而舜不得告（《礼记》言舜三妃。注谓：天有妃星四，故帝尝有四妃，法天也。舜三妃，一娥皇，一女英，一癸比，独缺正妃，为未命于父母也。但舜娶尧三女，《世本》尧为黄帝玄孙，舜，黄帝八代孙。尧女与舜曾祖为类，孙祖匹配，岂不乱伦。余按：尧举舜曰：“明明扬侧陋”，曰“有鰥在下”，曰“虞舜侧微”。《孟子》曰：舜发于畎亩之中。《庄子》曰：尧举舜童土之地。则舜起于寒微，况别生分类《舜典》且云，故《世本》多谬，《史记》从而论世之氏族尽始黄帝，皆循习《世本》之误也）。有天下当传子，而尧舜舍朱均（《孟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皆曰：尧九子。《庄子》曰：尧不急子。汉代祖尧曰：尧长子。考监明之后舜世纪：舜子，《朝鲜记》云子尧舜子众如此，何来均一不肖，遂舍之，初意传贤，二圣之公心初不计其子之君否也）。君臣定分而汤武取桀纣，兄弟同气而周公诛管叔，夫夫人道之始而仲尼、子思、孟子皆出妻（孔氏三世出妻，见《礼记》、《家语》。《孟子》出妻见《荀子·解蔽篇》）。父子情之至亲而孟子不责善言，易子教之。后世昏庸之君不足论贤明，如汉文帝、唐太宗、宋太宗、理宗不足于兄弟，汉武帝、宋文帝、宋孝宗不足于父子，汉光武、宋仁宗不足于夫妇。

○送终不讳

世俗殓葬，羽毛鳞介讳近之，嫌人物溷也。按古不然，《礼记》丧礼最备，《檀弓》曰：天子之棺重水兕革棺被之，埋厚三寸。郑玄注：以水牛、兕牛革为棺一重。孔氏疏云：以次而差，公棺去牛用兕，侯伯以下水兕，皆式二皮能湿，故在里近尸。《丧大记》：大夫里棺用元绿，用牛骨钻。说者谓以绘贴棺里，以牛骨或象骨钻钉之。曰君大夫士盖棺漆外，各施衽束。束者，谓束以牛皮。孔子之殓佩象环盖，古者天子诸侯死，含以珠玉，以实口也。《周礼》

：互物蜃物，以共圻。郑玄注：以蚌蛤属为灰，置椁下御湿。《左传》：邾文公葬用蜃炭礼，熬用鱼腊或蚍蜉，皆不嫌人物溷也。

○封建限百里

封建，古以褒有功、崇有德也。犬牙相制，朝覲而上下之分明，聘问而与国之情通，且人主无私土地之心。周衰坏于兼并，遂至君弱臣强，侵陵不已。秦变以郡县，李斯辈因谓同姓属疏攻击如仇，不如守令，时其贤否而进退之。其后汉裂七国，晋封八王，皆肇兵事。或者遂谓古法不可用于今，不知汉晋之弊，与地逾制也。按黄帝画野分州，古言得百里之国万区（史言封建肇黄帝，而神农伐补遂、攻夙沙，伏羲时有纪侯、阳侯，则封建肇黄帝前）。《礼记·王制》、《子思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，地理志》皆只言公侯方百里。《论语》千乘之国，释者计以井赋方百里国。《左传》郑子产对晋曰：昔天子之地一圻，列国一同。自是以衰，白公子张言齐桓、晋文之始入，四封之内不备一同，勾践之地东西南北才广百里，商周肇封皆在唐虞，传至汤文亦已久矣。而汤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未之或改。后汉丁恭曰：古封建限百里，取法于雷，雷震惊百里，故屯卦震下坎上，曰利建侯百里，下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故唐虞称万国，益、稷州十有二帅。郑玄注：一帅领百国，州十有二帅，则每州千二百国，除王畿外，八州总九千六百国，余四百国在畿内，国各五十里，谓之采地（采者，采取赋税，自侯不得有其土地人民及不得世封。但《书·大传》言：采地之异百里国，以三十里为采，其七十里国以二十里，五十里国以十五里，其后子孙虽有陟黜而采地不与，使子孙贤者世守之，以祀其姑受封之人，岂故曰与抑以采地各制乎）。盖万国并建侯，多则势分，势分则易制，乃古防闲维持之深意（按神农封制，欲强本弱枝，海山至有十国，唐虞虑强国迫近，凡设国远大近小）。独二《礼》言侯制异诸书，《周礼》曰：公地方五百里，侯地方四百里，伯地方三百里，子地方二百里，男地方一百里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：鲁封七百里。然《孟子》言周公封鲁太公、封齐皆俭于百里，故鲁七百里之说或者疑为战倒侯者分谤之书，汉儒妄采之。《周礼》之制，释者亦谓周公设此以待有功，封建制行三年，一行修封之法，视诸侯功罪益削之，如《诗》“锡之山川，土田附庸”，锡山川土田，于周受命，皆是益封。又或谓周礼各国有大其数者，包附庸在其中。《王制》曰：五国为属，属有长，十国为连，连有帅，二百二十国以为州，州有伯，故附庸小国皆总属大国，其大比一国之大夫也。然则弊，汉晋非封建也。（公谓故侯国初封只言百里，后来渐大，皆是并吞，若百里国增至五百，须并四国方作得一国，宗庙社稷岂不劳动？泥小国例，古功臣之后移小增大，封制既行，地有分限，又何缘有馀地别为小国乎？余按：文王由方百里起，其后克须密，遂国于岐、渭之间，克崇，遂

涉渭改都丰，三分有二，何往非并，文王且然，春秋以来可知矣。故二《礼》说难据，信朱说为是。）古制既亡，后之所以统天下者，势而已，而势之强弱古今一，惟其人，苟上有明辟，封建而治，郡县亦治，上失其道，封建者亡，郡县亦亡，故言封建者息焉。

○兴创规模

事无大小，皆须先定规模，规模立则意向坚，意向坚则事功成。若泛图浪谋，断无有成之理，矧争帝王之资者乎？汉高争天下，先据关中为根本，任三杰司谋，战更无迁就。唐兴，晋阳亦先掩取关中，征战乃出，太宗规模都不出据形胜、拣人才之外，宜其光启二代也。刘先主未得孔明，流离转徙，一无所就，及孔明说以跨有荆益，遂成鼎峙。宋艺祖知五代之弊在君弱臣强，用赵普谋首削藩镇，施为建置，一洗姑息之习，卒安天下。晋宋偏安江左，皆正统，后父兄为虏，庙社为墟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当事克复无可疑者，而晋祖清谈，规模不知立，宋徇和议，规模不能立。绍兴中张焘进言曰：今日事大体重莫如六飞慎勤。往者前临大江，继又退守吴会，朝夕所与断国论者，二三大臣而已，一纪之间凡命十四相，执政递迁无虑二十人，宜其和战纷纭，迄无成功，故焘直指以为规模不定人。以人臣事业求之，仲尼、子产初相郑、鲁，皆名国人之谤，及无终也，易谤以颂。韩信、孔明终身事业皆决于初见高祖、先主时数语。王猛见桓温不渡灞水，虽署以官而不就，亦其出处施为皆有素定规模也。

○分数明

古今以多兵败者，纣亿万臣败于武王三千，赵括四十万败长平，汉高合兵五十六万败彭城，三十万困白登，王恢三十万伏马邑无功，王寻、王邑百万败昆阳，黄巾百万败寿昌，曹操六十万败赤壁，苻坚八十万败合肥，隋九十万败辽东，唐九节度六十万败邺城。其以多兵胜者独秦王剪六十万胜楚，项籍四十万胜秦，此外多多益善惟韩信，伊川谓信是分数明（按信胜赵、胜魏，兵皆是分用）。近代陈学士规著《守城录》论靖康援太原之非，盖分数不明也。规谓初朝廷遣兵援太原二十二万，皆败绩，所以败者，兵二十二万直前而行，先锋遇敌者能几，先锋一不胜而却，后皆闻风而却，兵二十二万败正坐此，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、备战兵、运粮兵、才尼援兵。今且以五万为率，分为五十将，留十将护主帅兼听策应，内分二将才尼敌援兵，以二十将分地入敌境，捣其虚隙，以二十将前设伏于偏僻，伺候敌兵出抄，多则避，少则擒之，其贼自困。大概兵既分遣，则人力并用，假令失利，亦不至一齐败衄，此分数明之说也。当时张魏公帅川陕合六路兵四十万与虏战富平，始于环庆一路兵溃，诸军皆溃，然则分数不明，于是一齐败衄之患生矣。魏段超曰：众者在得众人之死

，人众而俱肯致死，于是不徒众矣。

○古将不专兵

上古寓兵于农，无事则耕，有警则战，侯国之兵各将以命卿，大事则会诸侯（卿视国大小为员多少）。故兵不聚而将不专，内难亦少。春秋晋作三军，某将上军，某将中军，某将下军，于是将始专兵，上之人稍失控御，末大不举之患生矣。后世惟西汉初制近古，兵皆取之郡国，赋以丁而不以田，每郡设守一人主政，尉一人主兵，兵随土宜取之，巴蜀、三河、颍川诸处出材官（以才力取），陇西、天水、镇安诸处出骑士（以骑射取），西北轻车，东南楼船，临淄手，荆楚剑客，每岁八月郡国会试，又随土宜课之，平地习车骑，山阻习材官，水泽习操船，有事征。诸屯所不通用则守尉贬，兵属天子而将无专权，故汉将少跋扈，至命将皆出临时。《通典》谓：汉有四夷侵轶，则从中命将，如伏波楼船下濑等，将军名号咸因事立称，事毕则省。虽卫、霍高勋，退奉朝请之不暇。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婴击匈奴，将丞相也。武帝元光二年遣韩安国屯马邑，将御史大夫也。文帝遣张武屯渭北，遣宗正刘礼军灊上，将九卿也。高后遣隆虑侯{穴龟}击长沙，文帝遣河内太守周亚夫军细柳，将列侯郡守也。将不专兵，所以亟拜亟罢，可诛可放，无一人负固揽权要上者，此制之善也。又汉将多迁宿卫，盖其出入殿庐，人主识其材武有素，如夏侯婴以奉车将，李广以骑郎将，赵充国、韩延寿以羽林郎将，卫青、霍去病以侍中将，所以汉将多良者，审而后用也。又设六郡、良家，以为取将之方（山西境）。置羽林、期门，以为蓄将之地，如京师南北二军（宫城内为南军，京城外为北军）。高祖初制亦番调郡国士为之，而不远戍，至武帝始召募，而更番之法废，昭、宣始远戍而屯卫之制疏。

○自古有死

世俗惑佛老者期不死复生，然孔子曰：自古皆有死。老子曰：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为节度。释氏经云：天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。况天裂、星陨、郡陷各迁，沙漠遗沧海之纵，岩穴著螺蚌之窟。乾坤且有毁时，人欲久不死，理乎？后世方氏言黄帝、老聃例不死。余考《易·大传》言：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氏没，而黄帝葬桥山。《庄子》述老聃死，秦人吊之，而县柳谷有老子墓。故近时刘潜夫诗云：无药可延黄帝寿，有人曾哭老聃来。则黄帝鼎湖攀龙之事，老子青牛上升之说，何往非幻？又释迦云：我今皆痛将入。《涅槃经》云：佛于桑树下右胁侧卧而化。《老子化胡经》云：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岁死于拘尸那城双林水下，葬于回尘山。他如彭祖七百，千岁，例以岁纪，亦同归于尽而已。况其事不经见，皆寓言裨说之录乎？《礼·外传》曰：寿者百二十，过此不死为失期，为妖怪。然则秦皇、汉武殆未知失期之怪也。唐牛僧孺曰：人以得其死

为寿，兵为刀死，刑为狱死，不耕织为馁死、寒死，老无依、病无托为孤死，舍是皆可言寿。老子亦曰：死而不亡者寿。则必有可传，虽死犹生也。

●卷五

○秦后六经

经焚于秦，《易》以卜筮独存，孔子言《诗》三百一十篇，《诗》亦全书（《汉?艺文志》谓风，讽也。以讽谓以讽人，盖歌《诗》以侑燕飨，春秋皆无，汉兴章句有因流传者）。浮邱伯受《诗》于鲁申公，申公高祖初人，则《诗》传汉兴矣。后苍为高祖定章程，而苍修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则《春秋》亦出汉初，二书今次序连贯，亦全书也。《尚书》初出伏胜口授，继出孔氏坏壁，颇多残缺。《礼》则传自高堂隆，今之《仪礼》也。逮河间献王好古，构求先秦古书，得古经五十六篇，并科斗文字，梁沈约因谓汉初典章简略，诸儒拓拾遗文片简与礼事相关者，编次篇帙，皆非圣人之言。《月令》取吕不韦《春秋》，《中庸》《表記》、《坊记》、《缁衣》取子思，《乐记》取公孙尼子，《檀弓》残杂《学记》出毛生，《王制》出汉文博士，今祖二戴文宣帝时人。若《周礼》汉文帝乐人窦公首献《周官》、《大司》、《乐章》，他如汲冢云武帝时出自山岩屋壁，成帝时刘歆校书天禄阁始列上其书。汉兴六经来历如此，考秦焚书之岁至高祖之兴，仅十六年，书虽萌芽，而挟书之律未除。武帝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，然后斯文始畅。但遭秦火，后儒于经各有馀论系辞，著子曰字。欧阳公谓非夫子亲书，必后世讲师所增（乾卦亦两著“子曰”）。《汉?艺文志》谓《尚书》有张霸之伪（唐李汉亦曰《书》、《礼》别其伪）。唐以李言《左传》非邱明者数人，朱文公折《诗》序各置，谓序语多与《诗》背（按《后汉?卫宏传》言：作毛诗序。则但小序出毛萇）。《礼记》则古今议其杂，《周礼》刘歆列上之时，包周、孟子、张林硕、何林已不信为周公书。近代司马温公、胡致堂、胡五峰、苏颖滨、晁说之、洪容斋直谓作于刘歆，盖歆佐王莽书与莽苛碎之政相表里，且《汉?儒林传》叙诸骆有传授，《礼》独无之，或者其详密，谓圣人一事有一制，意其果周公之遗，不知孔子于礼多从周，使周公礼书如此精详，当不切切于杞、宋求夏商遗礼，与夫逆为继周损益之辞。又自卫反鲁，删《诗》定《书》，系《易》作《春秋》，独不能措一辞《周礼》。即孟子生战国，周室犹存，北宫问周室班爵禄之制，孟子已有其详不可得闻之答。一圣一贤，礼乐所宗，周室无恙时已莫可考，而谓秦焚后周公礼书灿然完备如此，吾不信也。兼其中言建国之制与《书?洛诰?召诰》异，言封国之制与《书?武成》及《孟子》异，书设官之制与《书?周官》六典异，同之制作大抵出周公，岂有言之与行自相矛盾乎？又《左传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皆晚周书，三经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多见之援引，胡俱无一语援《周礼》

耶（朱文公亦曰：左氏记周制处甚详，鲁不及府史胥徒，《周礼》后紧要事亦甚多，而略不见之他书，果出自周公，当是草定未行书）？又参二《礼》语意相类处不一，其出汉儒无疑。但文字自成一家，可以配经，而中用字亦奇，歆子尝从杨子云学奇字也。

○《易》象物

易，变易也，多象物明理。书名《易》，旧说象日月，取阴阳变易为义。日月更晦迭明，盖变易之大者。陆司农推之物理，谓《象》之义出于象，《彖》之义出于彖（疑彖名茅犀，训羊面小角。知几：群出交、广土，人谓之猪。神象具十二生肖，亦能知吉凶阴阳），《易》之义出于易。东方朔曰：非守宫，即蜥易是也。秦、晋、西夏名守宫，又名蜥蜴，南楚名蛇医，东齐海岱名卢廛，北燕名祝挺，蛇形四足，色变不一，字象形。曰守宫者，《博物志》云：以朱砂饲之，色变赤，搗以志，女人终身赤不灭，偶则落。故曰守宫名此，盖以阴阳媾合则易，文非止象日月也，若乾龙亦象物之变。

○经文合一之始

《周易》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分配卦文之下始费直，《尚书》以序各冠篇首始孔安国，《毛诗》以序各冠章首始毛萇，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合为一始杜预。

○禹事舜

尧使鲧治水，鲧理洪水，汨陈其五行，复以命禹，禹胼手胝足之不懈，将以盖父之愆也。及鲧殛死，禹为鲧子，以情义处之，纵无说以全其父，疑亦不愆于其亲者，虽鲧以罪殛，禹无可辞，但人子之心欲处之而安，当以去之为得。或曰：舜不以鲧故废禹，公也。禹若为鲧故弃舜，私也。圣人天地之为量，不可以私心窥也。愚谓公私之辨可有，父子之伦不可昧。孔子曰：食夫稻，衣夫锦，女安则？为之圣人，处事但欲求之心而安。桃应问孟子：替瞽杀人则如之何？孟子答以弃天下犹敝屣。盖谓舜当此时，可以无天下，不可以无父，义有重于得也。噫！禹，吾无间然矣，父子大伦也，圣人当有说以处此。

○县邑

县邑二字古不通称，不同制，《周礼》曰：四井为邑，四甸为县。郑玄注：县，方二千里，县，自王城三百里外至四百里曰县。《周书》作雒篇曰：千里百县。谓县方十里。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注：邑皆四井。但《传》言邑多不同，如叔段请制曰：岩邑也。凡以地著皆称邑。郑人以随州蓼伐楚〈门斫〉廉曰：“日虞四邑之至也”，与夫“敝邑”之类。国例称邑，又曰：凡邑有宗庙，先君之主曰都，无曰邑。则初无四井限也。若温，栾豹之邑，范文子欲之，曰：温，吾邑也。昭五年《传》曰：韩赋七邑，皆成县也。《史记》言晋六

卿欲弱公室，遂以法尽灭其族，而分其邑为十县，各令其子为大夫，则县邑在春秋已相混。战国秦封卫鞅商於十六邑。按商於为宏农县名，则鞅封邑特宏农县六十四井地尔。周亡，赧王献邑三十六于秦武公，尝谓楚令尹子昭曰：西周之地绝长补短，不过百里，窃疑亦四井之邑。班固汉史剖析尤明，《汉书·高帝》曰：沛丰邑中阳里人。应劭注曰：沛，县也；丰，其乡也。师古注：沛者，秦泗水属县；丰者，沛之聚邑。又沛公入关，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，故知邑系于县，六年令天下县邑城。师古注：县之与邑皆令筑城。十二年上击黥布，还过沛，及去，父老空县，皆之邑奉献。县邑在汉初实为二，意其时井邑之制犹有存者。按商鞅变秦，并诸小乡都邑为县，县一令，而古制尽亡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言夏邑、商邑、丰邑。《易》曰：改邑、黄帝邑涿鹿、舜所居成邑，《论语》：十室之邑，千室之邑。师古训：聚邑是已指人众聚居处言之。《韵释》：郡者，郡聚也；县者，悬也，悬于郡之谓县。县系于郡，秦制明矣（《左传》哀二年赵简子誓众曰：克敌者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。则古县大于郡，而郡名亦不始秦）。又参上古先王惟以州统国，《尚书》：益、稷州十有二师。郑玄注：一师领百国，州十有二师，则每州千二百国。班固述井地法曰：五国为属，十国为连，二十国为卒，二百一十国为州。《礼记·王制》亦曰：州建百里之国。《周礼》以星土辨九州之地，封域皆有分星。郑玄注：凡州是大界，其中封国各有限域，是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之国散布九州之间。而州大国小也，故黄帝画野分州，言得百里之国万区，《易》称先王建万国，《书》言协和万邦。以见古但九州、十二州，而国则无限。周衰，列国转相吞灭，国之大者遂连城数十，战国通天下为七国，于是国之名大于州。秦惩封建，析国为郡，古三十六，汉晋以来递变而小之，复有郡国之号，州之名遂布天下，所谓国者，并所统州郡名之。

泮水辟ń

《泮水》一诗八章，五章为伐淮夷，发首二章述鲁侯莅泮之仪，仅第二章内“匪怒伊教”一语，似学校中事。泮水果为学校，作则当铺张黉序之制，颂说教养之美，推明仁义道德之原与人才兴盛之效。今皆不然，而释者例以学校明之，其说实肇于汉儒《王制》。《王制》曰：天子辟ń，诸侯宫。盖谓环水为天子之学，则泮水为诸侯之学。又以《诗》言献囚、献馘、献功，遂于天子出征之下系以受成于学，反释奠于学，以讯馘告等语。其实汉儒本释泮水、辟ń“本怒伊教”一语，后儒援以释《诗》，自唐陆德明始。不知汉儒泥于一语，通牵诸章之旨也。《孟子》言古之学惟曰校、庠、序，而《诗》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学。郑玄《礼记》注曰：者，班也，所以颁政教。窃谓释为班政之所则小大从公、饮酒、落成、事祖、事帝、献囚、献功、献俘、献琛所举甚宏

，不然何必事事自学出也。玄又谓：先贤指辟_n宗庙，亦非。盖庙为致敬鬼神之所，而学焉、飨焉、射焉，囚俘截耳，疮痍流血，黯慢甚矣，此皆非参之道理者也。《白虎通》曰：辟_n外圆内方，明德当圆，行当方。蔡邕《明堂论》曰：辟_n外圆内方，拟王者动作法天地，水环四周，譬德广四海也。不知泮水象诸侯行不当方，德不当广乎？其实辟_n虽明而于泮水则碍，皆《礼记》之说拘之也。胡致堂尝疑泮为庙，诗八章，戎事居三，非学明甚。则饮酒、誓师、俘囚、琛馘、施教，皆质之祖宗，理或宜然，但不能无郑注黯慢之弊。且谓辟_n亦非学，辟，君也，_n，和也。《诗?灵台》言辟鹿而其中述鸟兽昆虫得其所，鼓、鼓、钟、镛莫不均调，皆非学校中事（余考《虞书》命夔典乐，教胄子。《周礼》大司乐掌成均之法，以治建国之学政。商学曰瞽，宗古之学者，春诵夏弦。凡经著学事多与乐相关。汉初永设学士与讲偕者，令隶业太常，故知乐学为一，致堂似未详）。《文王有声》言镐京辟_n，《诗序》曰：武王卒，文王之代功。诗中述文王筑城作丰事，亦于学无与。又上章曰“皇王维辟”，辟为君无疑，释者例以辟_n为学，皆误于汉儒《王制》也（按先儒释辟雍为环水，谓壁体外圆内方，水绕如壁然，故辟以壁得义，因“振鹭于飞，于彼西_n”，指雍为水泽，不知君名辟，义又如何）。乡先达鲁宝漳（士能）尝言：《泮水》非颂僖公诗，其中多言伐淮夷，稽之《书》，伯禽尝征淮夷徐戎。《小序》曰：颂僖公亦误矣。又参《宫》诗，其曰鲁侯者指伯禽，曰鲁公者指僖公，《泮水》曰鲁侯只当为颂伯禽诗。

○汉儒言礼

汉儒言《礼》多不近人情，丧哭，一主于哀而已。《礼记》曰：齐衰之哭，若往而返；大功之哭，三曲不_レ哀；小功、缌麻，哀容可也。释者谓三曲，一举声而三折也；_レ哀，声_レ馀从容也。夫哭而为折声、馀声，是意不在哀，因哭为态也。如曰：始死，主人啼，兄弟哭，妇人哭啼，皆区分无义。赏罚当功罪而已，《表记》曰：夏道先赏而后罚，殷道先罚而后赏，周之赏罚用爵列。夫刑罚不较功罪而辨先后，其说已谬，至但论爵列，尤不通之甚。又曰：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，小言入则望小利，君命顺则臣有顺命，君命逆则臣有逆命。尤非所以为教。若《养老诗》述成王养老乞言之礼曰：肆筵授几，酒醴惟需。又不然，厚其禄赐，如孟子欲有谋焉，则就之足矣。今《记》曰：躬亲侍膳，袒而割牲，执酱而馈，执爵而馈，著冕持干而立。此直委巷之谈，宜乎后世行之惟艰也。

○士异

《礼记?王制》言秀士、选士、造士、进士皆秀民之目。《周礼》言上士、中士、下士、天子、元士则皆爵名。郑玄注：上士三命受位，中士再命受服

，下士一命受官。《大行人》注曰：命者五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爵者四：卿、大夫、士、小宗伯之职，赐卿、大夫、士爵，则侯诗曰：蔼蔼、王多吉士、维君子使。《王制》曰：天子之元士视附庸。故《周礼》士列府史上，盖府史只庶人在官者，而士则受命也，士受命则有禄代耕。诸侯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，中士陪下士食十八人，上士陪中士食三十六人。《中庸》曰：父为大夫，子为士。《诗》曰：凡周之士，不显亦世。士爵许嗣也。《檀弓》著鲁县贲父死，庄公谏之，曰士之有谏自此始，则士死可谥也。故经言士皆轶庶人一等，执技者不与士齿。汉爵一级曰公士，皆爵命之士，非特秀民也。《白虎通》曰：士者，事也，以才堪任事。《说文》曰：数始于一，终于十，推一知十为士。《汉?食货志》曰：学以居位曰士。详三士：《汉志》爵命之士，《说文》秀民之士，《白虎》通堪于任事之士。后世兵曰战士，技曰术士，老曰道士，尽皆堪于事之目也。若《虞书》司寇曰士师，《周礼》六士主狱，则士训察。

○息二训

消息之息，读者多以正训息。余考训有二：经中如《易》言不息则久，《左传》继好息民，《孟子》王者之迹息，皆训止。《周礼》保息六养万民，《孟子》日夜之所息与夫孳息、生息、蕃息，皆训生。《汉史?高帝纪》吕公曰：臣有息女。颜师古注：息，生也。《史记?货殖传》：亡者取倍称之息；陶朱公老，听子孙修业而息之；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；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，什之。《宣帝纪》：刑者不可息，三代夏以十三月为正息，殷以十二月为正息，周以十一月为正息。孔颖达曰：达阳生为息。《江陵国志》：在地有息壤、息石，在子城南，其地隆起，如状牛马之形，经夕如盖。土之息生不穷也。息训生，与消字反正适等。

○西北豪杰所产

古今多北并南，文王道化行于汝坟江汉，《诗序》曰：化自北而南也。邵康节以地气自北而南别天下治乱，岂南非特不能北，且不可北也？昔人言出粟东南，募士西北，盖谓西北风起，豪杰所钟。然春秋吴越抗衡上国，项籍以江东子弟八千横行天下，李陵以荆楚士喋血单于庭，赤壁周瑜胜曹操，淝水谢玄胜苻坚，桓温入洛走姚襄，刘裕缚姚泓、俘慕容超，陈庆之以取河南，皆未闻资之西北。但南人进取之志不立，才国于南，便以江淮为限界，荆楚为门户，讲守国之计而已，如孙权赤壁，晋室淝水，刘裕广固洛阳，俱未尝用破竹可乘之势，而权破操即止，晋退坚便还，刘裕且弃已得之长安。或谓中原易取难守，不知祖逖终身有拥兵，宗泽与汴为终始，岳飞恢复不已，金主役桧死之，张德远没身主战，名动殊方，观此则敌之者不专北也。刘表坐据江汉，无四

方之志，曹操得以窥之。汉高即封南郑，前史谓南郑险如天狱，而高帝曰：吾意亦欲东尔，焉能郁郁久居此乎？卒灭项羽。蜀荆邯曰：汉祖兵破身困者，数矣。然军败复合，创愈复战者，以前死而成功逾于却就而灭亡也。贾复亦曰：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，所保得无不可保乎？故图尧舜而不至者，汤武是也；图汤武而不至者，桓文是也。前世豪杰如此。惟周公瑾、诸葛孔明、张德远，而公瑾天不假以年，孔明用蜀，或谓不当弃荆州（蜀险可以自固，荆州则有可以窥中原、收吴楚之便），张德远则压于主势，不振也抑。余考李陵陇人，祖逖洛阳人，项籍、刘裕、刘牢之俱彭城人，周公瑾舒人，张德远成都人，岳飞邺人，独宗泽婺州人，凡有志事功多产西北，大概兵无彼此，将有勇怯。同一赵兵，赵奢将之则胜，赵括将之则败；同一燕兵，乐毅用之则破齐，骑去可用之则为齐所破。所以料敌者，料将不料兵，不畏兵多而畏将武。

○处置两得

处事有任理而行，成败听之于天者；有苟一时之安，成败徐为之图者；有不择利害不量彼此，以成败付之幸不幸者。余谓付之幸不幸，无所处置者也；苟一时之安，强于处置者也；任理而听其成败，胶于处置者也。若奸雄睥睨之秋，反侧危疑之际，胶则失于知双，强则不免遗祸，幸则存亡立判。欲我不失体，彼得无词，最难两得。尝读史数事，今请裁以己见，然后知古人不可及。唐德宗即位，锐意除藩镇，藩镇惮其威，淄青节度李正己愿献钱三十万，盖偿朝廷也。德宗欲受，恐见欺，不受，又逆其来意。时崔甫为相，请遣使就慰劳淄青将士，因以正己献钱颁之，使人戴上恩，又诸道闻之，知朝廷不重货，则正己大惧。宋真宗时西夏纳款，因夏国饥，乞粮百万，盖借恤灾觐宋也。时王旦为相，请具京师，诏彼自遣人来取。夏去汴悬隔，自取得不补失矣。西夏得诏，称朝廷有人。后元昊复叛，将纳款，先令贵臣野利以书通朝廷，朝廷复书，议所以称，或请名以太尉，丽，庄敏争之曰：太尉，国之三公，待陪臣以此，待元昊将如何？今野利书来，自称曰令，此其国之官称也，依此称之足矣（宋初与契丹讲和，或言称北朝，王叔公乞只称契丹）。绍兴中韩世忠守淮，以所部兵少，乞摘张俊部赵密一将助，俊疑世忠吞己，拒命不分。时赵鼎为相，拨御前杨沂中一将助世忠，而抽赵密入卫，俊遂无辞。又时陈规守德安，盗李横围城不解，久乃假乞粮规规，予之，继又指名索籍妓。妓虽未节，而大体辱矣。规命斩妓首付之，横大沮。此于古人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之意虽不相似，然执小义，妨大权，王通以为皇之不极，则捐一人活千万人亦权变之机，杀一贱妓而名流于敌，岂无可疑？近时孟无庵（珙）师荆房将某叛，事颇彰著，会卒白某者请帅府发其奸，无庵集佐属议，或请发兵，或请招安，无庵闻发兵语，一笑，问若何招安，又卒无善策。明日，无庵自批断云

：白某敢诬首将，实犯阶级，斩首，送本军号令。然房州激此，必钱粮不敷给，不时令于制司支钱米若干，本下军溲犒。一次卒首，五房叛将大安，溲犒既行，士皆当动。越数月，间蜀有警，调房将去援，因移其兵权置法焉。庙祀死卒于房，迫录以官，赏其妻子。不烦干戈，坐消一城之变。时应山李（庭芝）参其幕，言无庵不惜一人之命，以全千万人之命，真是帅才。余闻之应山客刘清臣。

○随时救时

宋绍圣间陈子翁有随时救时之说。当时童、蔡用事，偏主安石，一切是熙丰，鄙元，而宗元者多正人，子翁与选举前名尽取是熙丰者，而是元祐者率录于后，由是正类得获选，亦不忤当国者之意。子翁因曰：随时所以救时也。因思鲁人猎较而孔子亦猎较，东汉诸君子疾宦宦如仇而陈实独吊，张让、王敦叛晋而温峤缪综其府事，诸武易唐为周而狄仁杰肯为之臣，大抵子翁意也。方新法之行，康节门人欲投劾而去，康节日：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，明道知安石作不顺人心事，而肯为其条例司，此岂计从容后福哉？故论当时党祸，皆众君子激成，大贤之见真不同。《庄子》曰：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无咎，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无町畦。达之，入于无疵。又曰：就之不欲入，和之不欲出。二语尤有理（王临川云：郡公之不抗，不失为周公之同，孔子之诺仕，不害为阳货之异，亦此意）。

○地理

山川之气钟于人，经中惟《诗》“维岳降神”、“生甫及申”二句云然。近代朱文公于事莫不裁之以正，折之以理，独于葬地不斥不泥，采其说则谓道路所经，耳目所接，人有欲住不可住处，及聚落有宅舍，使山水环合略成气象。然则欲掩藏父祖，岂可都不拣择，以为久远安宁之虑，而率意为之乎？公盖即显明幽也。余窃谓山水清浊钟于人，关于土地，大气数不专一隙一坑之是非也。如燕赵多奇士，山西出将，山东出相，西北严凝，人多劲悍，东南温厚，人多文丽，古今皆然，特人禀赋有厚薄，功效因有宏窄尔。若必期力致，恐无此理，不然郭景纯辈当至今昌荣也。况人死形神相离，自身之枯朽不保，又何缘能荫及生人乎？古人审吉凶，便营建，其稽之卜，多为居止。为葬卜，独《孝经》“卜其兆宅而安厝”之一语。盖居止乃生聚所在，决须环合，则和气凝固，譬犹鸟巢林在枝叶稠密处，虽风雨飘摇而不坠，若寄命疏薄，则覆卵窥巢不免矣。所以古人不必泥葬地，各有深意。《礼记·王制》言墓地不请。郑玄注：皆受于公，民不得私。《周礼·地官》曰：族坟，又曰：四闾为族，使之相葬。至公墓则家人言先王之葬居中，以昭穆为左右，凡诸侯居左右，以前卿大夫居后（《礼记》：太公封于营丘，比及五世，皆反葬于周。注谓陪葬文武墓

。晋献文子言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。注：九原，晋卿大夫族葬处）。则古葬有定位，不得吉凶为去就也。唐吕才叙葬曰：援《礼》天子、诸侯、大夫葬皆有月数，是不择年月也。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，雨不克葬，戊午日襄事，是不择日也。郑葬简公，司墓之室当路，毁之则朝而崩，不毁则日中而崩，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。古之葬者皆于国都北，兆域有常处，是不择地也。隋文帝葬后曰：吉凶由人，不在于地，齐主葬父，岂不卜乎？俄而国亡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，朕不当为天子；若云不凶，我弟不当战没。司马温公曰：昔者吾诸祖之葬也，家贫不能具棺，自太尉（公父池）来，始有棺槨，则不及择兆可知矣。杨诚斋曰：京仲远上世皆火化，并无坟墓，每遇寒食望祭江干，而仲远不害为宰相。又《与李侍讲书》曰：郭景纯书出自东晋，然已前之葬何限，而未尝无富贵。洪容斋曰：景纯葬地能预知水之为陆，何不能预知凶而改吉，免死于王敦之非命乎？胡口庵《与罗尚志书》曰：九经十七史并不说富贵寿考由葬地。吕才云：长平坑卒四十万，非俱犯三刑，南阳多近亲，非俱逢六合。《礼记》曰：我死择不食之地而葬之。不去择阴阳向背也，观此则亲死不葬，必期卜吉，为富贵利达之资者，其惑可笑！

○衡

寸、丈、尺、引为度，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为量，古人以律制器，皆自黍积而十之，十而衍之，度量咸同。惟衡以二十四铢为两，十二两为斤，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，初不以十数拘。按刘歆说曰：一龠容千三百黍，重十二铢，两十二铢为二十四铢，故两之得名，十二铢倍之也。二十四，气之象也。十六两为斤，四时乘四方之数（春、夏、秋、冬、子、午、卯、酉、寅、申、巳、亥、辰、戌、丑、未），总三百八十四铢，备六十四卦全尽也。三十斤为钧，一月之数，总四百八十两（六甲一周三百六十日，半月一节，总八节，计一百二十日），六旬行八节之象也。四钧为石，四时之数，总一百二十斤，十二月之象也。衡之制数亦精矣。若铢、两、斤、钧之义，铢者惟细可殊异也，两者两十二铢而名也，斤者名也，钧者均也，石者大也。权主智，智流动于不拘；衡主礼，礼齐一，故不易。

○魂魄

《左传》郑子产论伯有之厉曰：人生始化曰魄，阳曰魂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，是以精爽至于神明。先儒释魄附形之灵，魂附气之神。魄灵谓如耳目、视听、手足、运动、声音、啼呼，一魄具一灵也。魂神谓之精神、知觉，所以使之视听、运动、啼呼者也。故魄，白也，体质具而各明白也。魂，芸也，气呼吸往来芸动也。人生位高权重者，为其禀气浓厚，倘死非正命，必有未尽之数，不散之英，盖魄虽死而魂不散，凭依为厉。容有此理，故传者于韩原之战秦

获晋惠，推以为申生之厉。晋景疾在膏肓，药不可为，推以为杀赵同、赵括之厉。后皆益以得请于帝之语。余以事理推之，神怪谓必无，不可青天白日和平或为疹疾苦楚，怪何尝无之（《抱朴子》曰：夏宜长而荠麦枯焉，冬宜凋而松柏茂焉，盛阳宜暑，而夏或凉，极阴宜寒，而冬或温，皆物理之变怪不常者也）。故双峰饶氏释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章谓：此等事谓有则无从执着，谓无则阴阳变化，造化百端，故圣人只不言。此论近于人情，但如《左传》必事酬报人，似太神。况伯有死于带段，实子晰之谋，何伯有之厉不报晰而急杀段。申生之缢，实骊姬之谮，同、括之死亦庄姬之谮，何不报二姬而仇惠、景？春秋臣弑君者三十六，而不闻报其臣，比干、子胥之徒皆以忠受戮，而不闻报其君。故《左传》之失也诬。（曾宝潭尝谓：宋之制作粹于汉唐，曾无逆天害人之事，而靖康太宗之后，德理宗之后，俱为北狩，乃有汉唐所无，盖方太祖疾危，屏人独召太宗，已而太祖以柱斧击地，好为之，烛影下遥见太宗若为逊避之状，故旧疑太宗杀太祖。理宗居潜，济王已位青宫，及宁宗大渐，史弥远复援立理宗，济王遂不得立，死。或者二宗殄祀，犹罚晋弊韩之说，太祖、济王亦有请帝以报之理。余窃谓太祖果欲报仇，不应迟之几世而济责，以当首泄之弥远。亲老、亲眷、翁旧尝将太祖柱斧遥见之疑质之，上高阳兰坡先生起莘坡谓：江左宋齐抽杀同气者，后皆不昌，太宗果欲不应，其后八叶天子且多令主，治且几二百年，但即位后德昭、德芳俱不得其死，又受天下于太祖，更不还其子孙以天下，则太宗之失也）。

●卷六

○阙疑

宋儒释经高出前古者，以不袭汉晋以来训诂旧足迹，及溺于讖纬巫怪之说，考其同异，正其讹谬，析之以理。然亦有过处，寥寥千古，焚于秦，杂于汉，所谓六经多未全之书是也，而必证三代之是，则几于凿。独朱文公尝著阙疑之说，盖夫子作经赞，《易》自伏羲而序，《书》自尧舜而下，删《诗》自汤文而下，修《春秋》自桓文而下（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孝子之诗：华黍崇邱；由庚由仪。岁时之诗有其义而亡其辞，汉儒皆缺不录）。《典》有五而逸其三，《坟》有三而不存其一，皆就其可知者录之。左氏志怪颇多；《春秋》关于人事则书；《论语》弟子记善言，于鬼神曰：敬远，又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；于死生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，与夫罕言命。凡茫昧不可知者不究论也。子贡号明敏，而曰：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皆不以臆说强通为学。颜、闵圣门高弟，可法于后世只是不迁怒、不贰过、箪瓢、陋巷、不改其乐与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，非是常人全所不能者，故圣人训戒有多闻阙疑、不知为不知论，皆晓人以平实之学。《孟子》七篇之书，虽多援古而述尧舜之道

，曰孝弟而已，正救齐梁不出仁义二字，及论古制则但举其概。滕问井田曰：此其大略也；北宫问周室班爵禄，曰：其详不可得而闻；论《诗》曰：以意逆志；论《书》曰：吾于武成取二三策。皆就其可据信者述之，所以诏万古为法言。《史记》，汉儒采取于坑焚之后，谬妄固多，然疑而未定，辞例曰盖曰、或，如舜葬苍梧，盖三妃未之从也；周公盖附；孔子盖寝疾七日而没（《易系》十三卦制作皆云：盖取诸某卦；《孝经》论天子诸侯之孝皆曰盖，指士庶人之孝独指之曰此，释者例谓盖为疑辞。刘元曰：盖犹梗概也。刘歆曰：盖者，不终尽之辞。皇甫侃曰：盖者，略陈如此，未能究竟也）；鲁人或谓之齐衰，或曰大功，诵可也之类皆疑辞，缘周衰礼坏，杂以诸侯僭制故耳。自近事亦不敢指的为论，而况妙出人事之外者乎？后之学者穷天地，索鬼神，辨风霆，訾古始，皆未达圣人阙疑之旨也。《庄子》曰：天地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邹衍著书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，杨子云曰：迂而不信。司马后生为学便高谈性命。欧阳子曰：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，而阙所不知，慎所传之惑世也。朱文公于《易》有疑，亦谓上无关于义理之本原，下无资于人事之训戒，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之。斯言足警谈玄索怪者矣。

○读书致用

胡致堂曰：人主读书与经生学士异，经生学士则辨疑解惑，使传授不差；人主之书则在致用。然天生人才以维斯世，读书致用不特人主当然，圣贤述经之精义，无非鸣道之大略。杨子云曰：学，行之上也。又曰：君子事之为尚。古人之学无所不讲，圣门弟子必以四代礼乐论，学《诗》必责使于四方而专对，称许子路冉求各曰从政，《周礼》六德、六行外曰六艺，伊尹乐尧舜之道曰尧舜君民（先儒说伊尹乐尧舜之道曰：钦明文思，理恭允塞。道之体也。明德亲民，协和万邦，平章百姓。道之用也。凡尧舜所以治唐虞者，尹耕莘时尽讲究来，故出便能以天下自任，放伐之学至兵法之学。王临川谓古党庠序之教，兴礼、乐、政、刑，士素讲之精，故皆足为天下国家用。苟不可用天下国家者，不教也。如射御亦男子事，苟无疾病，无有去射不学者也。故学校以射，祭祀以射，宾客以射，凡礼乐俱寓以射，故居以为大卿，出则将大军，比闾族党之师皆伍两卒旅之师，后世惟以为无赖者之任，而学士大夫轻眦之。乃弊精神于课试文章，及隶于仕，始卒然责以天下之事，故平日之教只以坏事。《慈溪学记》文谓：古乡射、饮酒、合乐、尊贤、劳农、囚馘等事，皆当学之平日，所学政拟他日之用，不待以政学也）。又尝推之皋、夔、稷、契生文字仅有之世，虽无书可读，而尧、舜稽古皆以多言善行为世法程；文武之政布在方策，则其书非直言语也；张子房圯上一编，颠赢蹶项；诸葛孔明读书但观大略；马伏波少授《诗》，不能守章句；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。隋苏威曰：读《孝

经》足以立身、治国。而数君立节皆不同，宋赵普二代相业，各用《论语》之半，盖昔贤各知用书之要，不在徒为章句也。故学贵知要，不在贪多，用贵适时，不专泥古，然后为善读书。《论语》说安昌侯张禹受禄保位，《中庸》称天下胡公，乃后世托经文奸，《庄子》所以有《诗》、《书》发冢之议也。若近时理学诸贤，于心性切切究论，又未免有刍狗事为之弊，倘不经世，与记诵词章，均为无补，故书益多，效益寡。

○先天太极一理

《先天图》总六十四卦为一圆图，先儒以为心法也。玩图当自心始，图中心白，太极也。其外左阳画三十二，右阴为三十二，两仪也。又其外十六阳十六阴相错为四，四象也。又其外八阳八阴相错为八，八卦也。又其外八方为十六，十六分为三十二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，而卦备图成矣。明道谓加一倍法者，此也。朱文公谓：本是小变成大，到那大处又变成小。变成大者，中心白圈积成大圆图是也；大又变成小者，图成而六十四卦备，一卦只管一事是也。故曰只是个盈亏消息之理，小则必大，大则复小也。康节玩图，每事怕太盛，须看得此理透。濂溪图太极，只是散布《先天图》，发明此理。其上白圈先天中心，太极也；其次黑白相错一圈，白阳动，黑阴静，两仪也；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曰动静互根成四象也；又其次木、金、水、火、土各以圈布，曰五气顺布，四时行焉者；坎、离、震、兑包乾、坤、艮、巽而成八卦也；其下二圈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万物化生者。八卦分为十六，十六分为三十二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，各正性命之象也。《先天图》是会万为一，太极图是散一为万，是或一理也。周子察先天精，故图太极妙。近时兴国冯亿可说二图，最明。其辞曰：《先天图》，心学也；《太极图》，性学也。《先天图》总万为一，以为天地造化、万物万事皆主于心；《太极图》散一为万，以为天地造化、万物万事皆摄于理。惟其总万为一也，故两仪、四象、八卦、六十四卦统体一太极，其在人则心之谓也，所谓天向一中分，造化于心上起，经纶是也；惟其散一于万也，故二气、五行、乾男、坤女、万物化生，物具一太极，其在人则性之谓也，所谓天下无外之理，而性无不在是也。然而心外无性，性外无心，是或一道也。是故理无与于象，而观象则可以明理，所以有贵于图也。《先天图》之为象也，如众星之丽于天而共辰也，如三十六辐之周于轮而凑毂也，如万矢之围的也，如聚材之聚于根，万而一也；《太极图》之为象也，如木之根而干，干而枝，枝而叶也，如水之源而派，派而流，流而委也，一而万也。人能观《先图》之为象，而得此心之所以为心，则居中而运四旁，处静而制群动，两仪、四象、八卦、六十四卦之生在彼，而乾、坎、坤、离、震、艮、兑、巽之体在我，所谓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此心之为也。人

能观《太极图》之为象，而得此性之所以为性，则无不备，无有不善，无物不具，无时不然，阴阳、五行、万物、万事虽纷纭乎无穷，而健顺、五常、人伦、事物之理莫不为之管摄。所谓天地合德，日月合明，四时合序，鬼神合吉凶，此性之为也。二图该说心性理既明备，图亦灿然。冯名亿兄弟皆第进士，开庆己未悉戕于兵云。

○蜡腊异祭

《史记》秦惠文王十年初腊，郑康成、蔡邕因谓腊即周蜡祭，和峴亦曰：蜡者，腊之别名。余考《玉烛宝典》云：腊祭先祖，蜡报百神。则蜡与腊异，蜡祭因飨农以终岁勤动，而息之也。腊者，猎也，猎取禽兽，祭先祖，重本始也。二祭寓意不同，所以腊于庙，蜡于郊。唐贞观初丑蜡百神，卯祭社稷，辰腊宗庙。开元定礼，始蜡、腊同日。宋初蜡、腊犹分，其后依和峴议，三祭同用戌日，岂以先秦无腊，准古只尝蜡一祭乎？

○井田

周末开阡陌，罪商鞅，又谓秦并天下，李斯尽坏六国井制。然鞅特秦一国之佐尔，而鲁税亩、郑邱赋，滕使毕战周井制，孟子说齐梁制民之产，则诸国井制俱紊，难专罪鞅也。其实尽坏，又不起斯也。近代儒先如伊川、横渠皆尝有志井田，然叶水心谓其法繁密，非一世可行。自黄帝至成周，封建制定，诸侯皆家传世守畎浍沟洫，民守而田之，故历唐虞三代如一日。后世郡县制行，吏且数易，井制能一朝定乎（《孟子》言夏五十而贡，殷七十而助，周百亩而彻，皆什一也。朱文公谓先王疆理天下，畎浍沟洫具有成制，若五十更为七十，七十更为百亩，则古制尽废，岂不劳攘，故疑《孟子》言难拘。又况地有肥瘠不等，倘一拘于五十、七十、百亩，阔狭定制，岂不偏颇，古人当别有权衡）？又上古田在官，今行井制须夺民田归官，然后贫富可均，人情能保不骚然乎？兼畎遂沟洫环田为之，地之不得耕者甚众，今世大陂长堰，因高为原，视下成隰，波及千顷，较彼不为徒劳乎？上古生齿未繁，计口授田，犹或可给，后世生齿日众，设遇歉岁，官发既空，仓廩亦尽，啼饥犹自不免，在官之田能遍给乎？按今中原陆地居多，详《禹贡》除荆扬外，无非陆田。冀曰厥土白壤，兖曰厥土黑坟，青曰厥土白坟，徐曰厥土赤埴坟，豫曰厥土惟壤，下土坟垆，梁曰厥土青黎，雍曰厥土黄壤，独荆扬曰厥土惟涂泥。释壤者曰：土无块，释坟者曰起曰肥，则七州土皆高肥，独荆扬涂泥可为水田。又参经言黍稷多于禾稼，兵食俸给例以粟计。《周礼·职方氏》别九州，亦荆扬专言稻，徐州别诸种色。则中原水田无几，盖异荆扬。而《禹贡》一书，千古地理之证也。但沟遂浍洫费地既多，致水又劳，不知古人何乐此也，想明井画外因早备尔。

○牛耕

古以牛引重任载，次则供祀，六经载、祀外无言牛服耕者。《周礼》牛人掌养公牛，以待国用。政令曰享牛、求牛、膳牛、犒牛、奠牛、兵车之牛，亦不及耕。盖古人尚耦耕，耦者，人力两相佐助共发地通畎亩。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《诗》曰：十千为耦，千耦其耘。《礼》曰：以岁时合耦牛耕。贾公彦《礼疏》谓教民牛耕自汉赵过始。按过为搜粟都尉，创代田之法，始言用牛犁，二牛三人。但予考孔门弟子冉伯牛、司马牛皆名耕，以牛释耕，周末已然，似不始汉也。

○卜决疑

近代工《易》者三家，而各不同。康节《易》主数，伊川《易》主理，晦庵《易》主卜筮。《易》经羲、文、周、孔四大圣之笔，后世阴阳占验之书有《易》似者哉。三代而上事之神者，一倚卜而亦不专徇焉。舜专位于禹。首曰：惟先蔽志，昆命于元龟，孔氏释：志定然后卜，故必朕志先定，询谋佥同，然后曰鬼神其依，龟筮协从。《洪范》言龟从、筮从，必曰卿士从、庶民从，又曰谋及乃心、谋及卿士，是人己之意见合，复假卜筮断之，乃古人审重之志也。周公都洛，决择于涧东西，亦是宅中之志素定，而涧东西则审尔。卫文徙楚邱，升堂降观，始曰卜云其吉，皆非卜而后居也。所以卜，但曰决疑。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述蓍龟之神皆数百言，至备述见梦元王之事。而《庄》记仲尼之言曰：神龟能见梦于元君，而不能避余且之网，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，不能避刳肠之患，如是则智有所困，神有所不及也。其神龟无几矣。汉武帝聚占家问某日可娶妇，五行家曰可，堪舆家曰不可，建除家曰不吉，丛辰家曰大凶，历家曰小凶，天人家曰小吉，太乙家曰大吉，辨讼不决，至以状闻吁已见。人谋之不详，而欲一倚占候，鲜有不惑者，此褚先生所以拳拳于日者后也。

○佛入中国

《后汉?西域传》云：明帝时佛始入中国。按《汉武故事》昆邪王杀休屠王，以其众来降，得其金人之神，武帝置之甘泉宫，祭不用牛羊，惟烧香礼拜，帝使依其国俗祀之。又时作昆明池，掘得黑灰，东方朔曰：可闻西域道人。则前汉时佛流中国矣。况帝事四夷，枸酱、竹杖犹入王府，又方事神仙，佛以超度为术，张骞辈肯贱佛书乎？刘向《列仙传序》言仙者一百四十六人，而七十四人见佛经。向成哀时人，其言如此，则前汉有佛经矣。向又曰：予览载籍，往见有经。洪庆善因言周时久流释典。按《列子?仲尼》篇曰：西方之人有圣者焉。详御寇郑人，在孔子后，孟子先其时已说西方圣人，则佛传中国晚周也。就后汉言之，光武闭玉门、谢西域，佛岂有不通者，何必待明帝迎而后有耶？《通鉴》著其始于明帝，盖本《西域传》，岂以帝者尚佛自明帝始，固特本

《西域传》表之邪？

○豚犬斥子

豚犬斥子，详语意疑贱之之称。按二字出《越语》，范蠡欲速报吴，使国民众多，令国人女子十七不嫁，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，生丈夫与酒三壶、犬一，生女子与酒一壶、豚一，盖幼之之事。《论语》六尺之孤，《周礼》国中七尺，野外六尺，皆不从征。亦谓幼者六尺年十六，七尺年二十也。

○迂阔

田文以鸡鸣狗盗之客脱一时之急，苏氏谓道德礼义之士则能救之于未危，无用于客也。盖六经道制治于未乱，隆古君臣崇礼尚义，思患预防，所讲明、所设施动为久长远大之图，无急利近功之意，凡逆节乱萌室之平居，不待著而为之，地故治安长保。后世务求近效，旁蹊捷出，行险侥幸，幸而集事则曰：吾不赅彼之深谋远计而功业以就，不知一有疏虞，横溃四而不可支，此叔世所以乱日多而治日少也。儒本六经言，往往张皇于安平之日，及事至而为之图，必推述祸原乱本之所在，就其端萌而图之。舍经行权又所不屑，故见儒之迂阔乃远大之谋谟、深长之思虑也。余谓时君世主仓卒名知务者，闲暇多迂阔，儒者仓卒似迂阔，而闲暇则知务也。

○祭求阴阳

祭与际同，人与神际也。人死魂气归天，属阳，体魄入地，属阴，故祭所以求诸阴阳也。古人灌用郁鬯，按郁鬯，香草。以鬯酿酒，加郁和之酌，则酒气氛扬上下，求死者于阳也；灌之地，求死者于阴也。祭者无所不用其情，或死者之可格也，殷人求诸阳用声乐，周人求诸阴用郁灌，乐为阳，礼为阴也。程泰之衍《繁露》谓：秦汉以前，五岭未通，祭用郁鬯（《记》云：天子鬯，诸侯蕙，大夫芝兰，士萧，庶人艾）。五岭通，旃檀之类行，上国郁鬯遂废。然则今神事尚香火，求诸阳也。《尔雅》：祭天燔柴，祭地瘞埋，与夫日食击鼓、雩舞女巫皆随阴阳施之。郑玄释曰烟，亦以气上通也。

○周公瑾

周瑜事吴，世第以赤壁战奇之。余按三国与权颉颃者曹操、刘先主二人，而皆入瑜计度中。方先主依权，瑜请徙置吴宫馆，女色以豢之，分关张各一方以事攻战。临死又表权曰：刘备寄寓，有似养虎。而权不从。曹操赤壁败还，瑜计权取蜀，结韩遂、马超于关中睨操后，还据襄阳蹙操，北方可图也。权亦不从。二说皆中曹、刘肯綮，使权从之，更假瑜以年，功业当超赤壁数倍，先主之帝、操之篡可复许乎？瑜捷赤壁年二十四，死才二十六，此虽天死，则亦足矣。

○司马懿

诸葛孔明、司马仲达相际一时，孔明前后六出伐魏，而仲达不敢西向发一矢。孔明用草创仅存之蜀，而仲达抚操丕积强之魏，人才不待较而知矣。然尝闻石埭其令君曰：仲达谲，虽不如孔明正，而仲达高于料敌，斜谷之役，懿谓诸将曰：亮若勇者，当出兵依山而东，如西上五丈原，诸军无事矣。已而亮果登原，遂以败闻。亮遣使至懿营，懿不问军事，问使言亮，曰：食三四升，罚二十以上皆亲。懿曰：诸葛孔明食少事烦，其能久乎？已而亮果卒。相持既久，懿知亮锐于一战，但坚垒困亮，虽遗以巾幗而不辱，且谲为辛毗制己不露怯战之机，使亮堂堂之阵更无所施。李左军之策不行于当日之陈馥，而行于异时之司马懿，谓懿不智，可乎？及亮以丧归，懿按行亮之营垒曰：天下奇才也。亦有为而发，时有所忌者在行，懿谓孔明如此奇才尚困于吾，彼不逮孔明者当如何？盖借此形彼也，凡此皆仲达谲处，史未究见，故没不书。石埭读书最博，与僻无不搜根，未叩所忌为谁。

○事非智力所及

东坡叙两汉之变曰：高帝平天下，所忧者韩、彭、英、卢而已。四王相继扑灭，及吕氏之祸，则由后族，吕氏既灭而楚之忧几至亡国。方韩、彭、吕氏之祸，惟恐同姓之不蕃昌也。至其为变，则又过于异姓。文景之世以为诸侯破弱，则汉百世无忧，至武帝诸侯之难已衰，匈奴之患方炽，又以为天下之忧止此矣。及昭、宣、元、成之世，诸侯既无足忧，匈奴又已成事于汉，然卒至于中绝不救，则所不虑之王氏也。世祖既立，上惩韩、彭之难，中鉴七国之变，下悼王氏之祸，于是尽侯诸将不任以事，裁减同姓之封，黜削王公之权，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。及其衰也，宦官之权盛，党锢之祸起，士大夫相与游谈，以为一日诛宦皆、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，于是外召诸将，诛宦官无遗类，而董卓、曹操因以亡汉。所忧者凡六变，而乱与亡辄出于其所不忧。数语尽汉曲折，余尝因是合古今世变论之，秦革封建、限匈奴、焚诗书，虑至悉矣，而祸反出于揭竿之戍卒。魏制母后不得临朝，禁御诸王有同奴隶，而奸臣窃鼎。历晋、隋如出一辄。唐惩安史之乱，倚重藩镇，而藩镇卒为祸胎。宋惩五代之弊，削弱诸侯，而前后两困北狩。由此观之，天下事殆非智力所及也。

○《史记》世系

子由《古史》讥司马迁《史记》轻信而疏略，今以所记世系求之，其言黄帝生昌意，昌意生颛顼，颛顼生穷蝉，穷蝉生敬康，敬康生句望，句望生乔牛，乔牛生瞽瞍，瞽瞍生舜，自黄帝至舜凡九世。及叙禹系曰：黄帝生昌意，昌意生颛顼，颛顼生鲧，鲧生禹，去黄帝止五世。禹继舜兴，何舜远而禹近也？叙黄帝至汤凡十七世，汤至纣又二十九世，通四十八世而叙黄帝至武王但十九世，武王后汤六百年兴，去黄帝乃止二十世，何纣远而武近也？后之谕世系

者多本《史记》，殆未考迁之谬也。

●卷七

○一体具体

子游、子张、子夏皆有圣人之一体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而微。晦庵《集注》：一体，一肢也，具体有其全也。又曰：体，段也。皆就身体言之。双峰饶氏曰：吾道所谓全体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也，具体而微者，五者皆几焉，特未到至处，各具一体，则仁有余者或义不足，礼而得者或信而亏，盖云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之说，视肢体之说尤明切。

○《左传》纪人名

《左传》纪人名既名字并举，又或族、里、爵、邑、谥、号错布一事之事，如称士会曰随武子，又曰随季，又曰士季；称却伯曰驹伯，又曰献子；称荀林父又曰桓子；称先又曰彘子；称公子吕又曰子封；称裂又曰子帛，此类不一。后来杜子美作诗，爵、名、里、字亦备著，如曰杜陵、曰杜曲，著地也；曰臣甫、曰子美者，名字也；曰拾遗、曰省郎，著爵也。盖取法于《传》而以《诗》参之。《文王有声》诗称文王曰王公，又曰王君，曰皇王，亦备著一诗。先儒释云：词之不同，以见美之不足，反覆备咏，诗之体也。

○豕虱

势不足倚曰冰山，乃唐张彖鄙杨国忠之言。李堪鄙二张复曰海市蜃楼。按蜃，大蛤也。《韩诗外传》云：蜃能吐气为楼台中，春夏间见。《文昌杂录》著登州每晴霁，海之烟雾中有城阙、楼阁、人物、车马、鸡犬往来之状，盖蜃吐气为之，旋复消灭，登人谓之海市。东坡诗谓所见皆幻影是也。二喻本出《战国策》，曰：城狐社鼠。《庄子》复譬豕虱曰：豕虱择疏鬣、白以为广宫大囿，奎蹄、曲隈、乳间、股脚自以为安室，利处不知屠者，一旦鼓臂布草燎烟火，而已与豕俱焦也。冰山诸喻所习用，若豕虱则少援引者。

○《庄子》

文章设喻则深婉，而于喻最难，至一字数喻尤难，独《庄子》百变不穷，姑即明白者著之。如喻身用之厚曰：子见牺牛乎？衣以文绣，食以刍菽，及其牵而入于太庙，虽欲为孤犊，其可得乎？又曰：吾闻楚有神龟者，死三千岁矣。王乃舒而藏之庙堂之上，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？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？又曰：祝宗人临柩说彘曰：吾将三月豢汝，十日戒，三日斋，藉白茅，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，汝为之乎？为彘谋者曰：不如食以糟糠，借之牢都之中。三喻意同而事异。喻不可语道之人曰：有鸟止鲁郊，鲁君悦之，为具大牢以飨之，奏《九韶》以乐之，鸟乃始悲忧眩视，不敢饮食。又曰：《咸池》、《九韶》之乐，张之洞庭之野，鸟闻之而飞，兽闻之而走，鱼闻之而下。喻斫

壤真性曰伯乐治马，曰陶者治埴，曰匠者治木。喻陈言不可用于今，曰古人糟粕，曰已弃刍狗，曰舟不可陆，曰狙猿衣周公之服，曰丑人学西施之颦，曰迹，履所出，而迹非履。喻精一之守曰：痾痿承螭，曰津人操舟，曰吕梁蹈水，曰梓庆削锯。各数易说，每易每奇。若庖丁解牛事曰：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。林竹溪谓如画出一屠牛人。砉然响然，奏刀砉然。如闻其离析牛体之声。导大窍，批大；技经肯綮之未尝；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；每至族，视为止，行为迟等语则牛身之骨节理络、屠者之难易伸缩皆著之笔端，岂不为千古文章之妙。广大郭象谓《庄子》言大如鹏，徙九万里而六月息，极天下之大；如蜗牛之角能容蛮触之战，极天下之小；言久谓冥灵以五百岁为春秋，大椿以八千岁为春秋；言近则朝菌不知晦朔，蟋蟀不知春秋；言古则行填填，视颠颠，卧居居，起于于，如标枝，如野鹿，无为之象可掬；言后世则蹇{薛足}、是跋、澶漫、摘僻、屈折、悬是、结卓、鸷鹗、卷抢，囊作为之态备尽；言子贡之富则轩车不容巷；言曾子之贫则正冠而纓绝，捉衿而肘见，纳履而踵决。各臻其妙，自谓瑰伟亡诡可观，信哉！但陋仁义礼乐而偏道德，诋訾尧舜以来之圣人而崇老子，舍弃人事一付自然，所以得罪名教，为异端之学。

○古铜代金

《舜典》金作赎刑，《吕刑》罚百鍰，皆释铜。汉罚用金，赎死为铜四百一十六斤，唐赎死为铜一百二十金。按《禹贡》：扬州贡金三品。铜与其一，故铜罚例曰金。汉赐臣下诚用金者，直书黄金。考古金多无如汉高祖予陈平四万金，赐家令五百斤，慎夫人赐袁盎五十斤，宣帝赐韦贤、黄霸各百斤，赐疏广受二十斤，太子加赐五十斤，赐高祖功臣后百三十六人各十斤，岂为天下国家用，故亦不为天下国家惜乎？若饰土木言金，无往《西都建章赋》曰觚棱栖金爵，《三辅故事》：著金爵铜凤长安门，《甘泉赋》曰金铺交映，杨雄《解嘲》曰历金门，注亦曰：门旁立铜马，因号金门。古帝者富有天下，犹以铜代饰土木，后世琳宫梵宇，例饰赤金，何也？

○龙门

禹凿龙门导河，意穿其山之遏水者而已。水李氏记其事则不然，谓同州韩城县北有安国岭，东临大河，上建禹庙，乃禹凿山通河水出处也。河自古长城外南注中国，至安国岭下凡千馀里，两岸尽壁峭立，大河盘束怒郁石硖间，至此方山间喷风扬雾，如万雷鼓天而下。《庄子》“悬水三千仞，流沫四千里”盖写此。禹像冕服豕首，祭讳用豕，用则大风拔木发屋，灾被百里，观此则暴鳃点额，亦见鱼力之上莫支水力之猛，而禹所以神也。若上流乃古朔方，处党项之里。宋苦西夏，尝有陈熙河据西夏上流，于舟顺流下，出会州腹攻灵夏

者。朝廷下其议，熙河漕臣李复奏曰：契勘黄河过会州，所见精山石峡，险穿自上，垂流直下，高数十尺，船岂可行至西？妥州之东大河又分散流，谓之南山逆流，数十里方再合，逆流水浅滩碛，不胜舟载。朱文公谓《禹贡》言贡赋之路曰：浮于积石，至于龙门、西河，会于渭。则古来此处河道固通舟楫矣，又若此何也？余窃谓兴灵以外之河古当狄境，自《书》记雍州贡道之后，狄之窥中国者何限，曾未闻有导河入渭、者，则龙门上流行舟必难，复之说疑有据（按河出葱岭、于阗，合流东注菖蒲海，去玉门、阳关三百馀里，潜行地下，至积石出，故禹导自积石，自积石千里而东，千里而南，至龙门凡三千余里）。

○战国说士

叶水心曰：周之盛时京师有学，比、闾、族、党、乡、遂皆有学，三岁资兴，诸侯贡士，进得仕天子，退得臣诸侯，故其时有秀士、进士、俊士、造士等。自厉王无道，周法浸坏，宣王之复未几，又乱以幽王，驯至平王东迁，京师之学先隳，诸侯贡士之典亦阙，士绝望于王都，下者为商贾负贩，高者俯首为陪臣，然尚用于诸侯也。其后诸侯亦不取士，士之无归者降为大夫、家臣。孔门弟子皆为之，独颜、闵以不仕见推。至战国诸侯互相吞灭，日寻干戈，及遭离乱，为家臣既无主，退又无以自业，于是放荡四出，仗口舌以要时君，虽孟子大儒，亦千里见梁，且语勾践以游重轻，平原辈资士以重其国，几数千人，士之变诈纵横辈至，以口舌重轻人国，列国之主为之拥先驱，侧行避席，时可知矣。至秦此习未改，于是坑夷之祸起焉，其实皆因于士之无归也。

○乡举里选

封建不复，里选难行，缘古者王畿外其地皆以封诸侯，王城二百里外又责之都鄙，天子所治只六乡六遂二百里之间，诸侯封国乡、遂、比、闾、族、党之内，塾、庠、序之教行，故行艺之考察可知，耳目之采取亦易。《周礼》选举之说曰：闾胥（立此为闾中士为之），凡春秋祭祀役政丧纪众众庶书其恭俭任恤者，族师（上士为之），月吉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，党正（下大夫为之），正岁书其德行道艺，州长（中大夫为之），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，纠其过恶而戒之，乡大夫（命乡举之），三年大比则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。盖人之贤否，非久与居莫辨真伪，久与居者惟邻里乡党，故党庠序乃审察人才之要（按：古〈广羊〉、序皆乡民行射、饮读、教法之所，事已则反于学塾。汉学校不立，士与讲论者令肄业太常，后世以来始有越乡违家、群居聚食就学者）。后世井邑既亡，学校又废，郡大者绵地千里，如汉委郡国察孝廉，郡守拜罢不常，不能熟其人之贤否，往往滥举者多。魏郡置中正九品一人考德行，亦只取信口耳。其后任爱憎、通货赂、取阀阅，职名中正，实为奸府。

元魏惟简年劳，才否不辨。然汉公府辟举之法，尚近古郡县，属吏掾曹许各辟于其长，经郡县辟者，五府吏辟，经五府辟者，公卿始得推选。故士修于家，声闻达于乡闾，则辟书交致，至县令以上始赴尚书选调，一人之身阅历者众，汉吏多得人（周官人之法：论之乡里，告诸六事，而后贡以王庭，示不取信一人）。隋唐来易以词华设科，行艺已搁置矣，然犹察时望录之。至宋置棘糊名，则德行才否一切不辨，士之得失权衡于命之有无，特假词华彰施之尔。愚谓科举流泛，封建不复，选举难行，若只徇时论取人，则王莽未得汉柄，折节为恭俭，虚誉隆洽；器殷浩未出，天下皆谓深源不起，如苍生何；王安石初年，天下推其文行莫与为比，堪充选举，虽国皆曰贤也，而竟如此，又何哉？要之毁誉难凭，苏湖以经义治事，边防、水利、置斋，实取人之规，虞廷、纳言、试功一节，实审才之实。盖人各有能有不能，就其能之著而取之，真才出矣（按孔门四科论人，赐达，由果，亦不专主文章德行，则徇时岂不谬与）。后世取人但言语一科，不知世固有坐谈则胜，行之实事则阙者，礼乐、讼狱、财赋、兵机素未尝经，则选以官，事多废，而岁月淹久，循资格又付以断国论，谋王室，当方面，而人之堪不堪乃不问也，所以政以人弊，国以人亡。

○老彭

事惟近于人情者可信。传记述彭祖、老聃，各有诡异难凭之说，年皆数百。今撮识始终，彭祖姓名铿，封彭城，故号彭祖，以斟雉养性事尧，仕夏为大夫，仕商为老彭，事周为柱下史。《彭祖传》云商世已传三百岁，《列仙传》云丧四十九妻，亡五十四子，寿七百。又云八百。而《书》独以为彭祖得之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。其谬盖易知也。如《列仙传》所云，彭祖但寿其一身，不能延长其妻子，其仙亦陋矣。老聃，皋陶后，《说苑》著皋陶士师为理官，因以理命族，古字理、李通用，故《左传》行李、行理无二。夏商时已有李氏。姓氏书李，新旧《唐书》乃皆谓老子生李下，遭乱，饥食木子得生，因姓李。葛洪《神仙传》又谓：老子无父母，姓李皆附会妄说也。按老子生周宣王四十二年，母名之曰元禄，字伯阳，甫生能言，生时皓首，方瞳长眉，干九尺，耳七寸而参漏，故复名耳，字聃，邑于苦之赖（亳州卫贡县，县东有赖乡，即老子生地，有桐。《汉志》以老莱子、老聃为二人。按《庄子》书孔子问礼于老聃。《高士传》云孔子至楚见老莱子，时已二百馀岁，班衣戏母侧，所问皆礼事。二老传皆曰楚人，又莱，先贤以为老声之转，窃疑只是一人）。仕桓、庄，出为柱下史，仕简、灵，世为守藏吏，平王世著《道德》，孔子没后十九年西入秦，历流沙，化胡成佛，见秦献公，又后孔子百馀年。其寿以为二百七十，又曰四百四十，又曰不知所终，然县柳谷水面有老子墓（余按：老子著《道德经》，清净无为，外无半语及神仙，《庄子》之书致尊老子，亦不言其为仙

，至晋葛洪著《神仙传》始列老子于仙。昔之推黄帝者曰寿三百，大戴《礼》述宰我问孔子云：黄帝人也，何以能三百年？孔子曰：生而民利其德百年，死而人期其神百年，久而人用其教百年。窃疑彭、老子寿犹孔子论云，特传记神异焉尔）。

○治贵审时

论秦政、王莽曰：秦焚《诗》、《书》以立私议，莽诵六艺以文奸言，殊途同归，俱用灭亡。盖谓书不适用读书与不读书也。魏鹤山尝叹孔孟著书未及行，尽其辙轳历聘，熟谙世故，又洞识前古，使其获用，弛张必当。至秦大肆暴，经皆出于汉儒，掇拾先王制度，杂以秦汉，汉舛谬甚则胡制，即王贾马笮注多是以后王仪文臆说三代令典。故经著义理纲常，万古不易，其建置纤悉，随时之宜可也。夏礼而杞不足征，殷礼而宋不足征，孔子时二王之后犹存而皆云然，后乎孔子者文献又可知矣。韩魏公规荆公新法曰：古今异制，贵于便时，《周礼》所载，有不可施于今者非一（程子曰：经焚，礼书多出，汉儒不可一一追复），后世眩于太平六典之名，执于周公制礼之说，一用于王莽，再用于后周，三用于熙宁，而治卒不可致，不知三五制作皆出圣人，而唐虞禅，夏后殷周继，忠质文异尚，子丑寅建立已各不侔，何尝殷必循夏之迹，周必袭殷之制，况事久必弊，弊久则更，岂有执而不通之理？汉崔《政论》曰：济世拯时之术，岂必体蹈尧舜乃理哉？期于补疑阙壤、支柱倾邪、随形裁割、措斯世于安定之域而已。孔子对叶公、景公、哀公问政各不同，所急异务也。俗人奇伟所闻，简忽所见，焉可与论国家大体哉（后世言三代永固以封建，不知禹之天下非无封建，不三世而太康失国，幸而再集者，少康之贤明也。幽王之天下非无封建，一无道而四夷交侵，幸而复国者，宣王之修攘也。春秋诸侯之弊极矣，周以微弱乃载柞数百，岂诸侯于周真有一日之力哉？徒以各争强大，不能相质，周幸而传尔。秦变以郡县，而弊以苛暴。汉易以宽仁，而制于权臣。晋弊于权臣，隋弊于盗贼，唐弊于藩镇，往往国之亡皆有弊，善治者亦惟救偏补弊而已，无拘说也）！又曰：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褒齐桓，懿晋文，叹管仲之功矣，岂不美文武之道哉？诚达权知弊也。此论足以尽美三代之蔽矣。余尝谓唐虞治道，万古冠冕，究其设官，惟内有百揆、四岳，外有州牧、侯伯，职之可纪。昔禹平水土，稷教播种，契敷五教，皋陶为士，与夫垂工、夔乐、伯夷秩宗而已，何尝琐屑如《周礼》哉？矧治道贵安静，设官既冗则巧拙杂进，天下始病矣。司马温公曰：叔向有言，国将亡必多制。明王之治谨择忠贤而任之，法制不繁而天下治，及其衰也，百官之仕不能择人，而禁令益多，防闲益密，上下劳扰而天下乱。汉唐而下，君道虽不尽纯，而汉文景以恭俭致太平，唐太宗以仁义致太平，有宋以儒道致太平，则亦惟其人而已，不在尽循古

制也。《酌》颂成王曰，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安天下。汉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，而宣帝曰：汉家自有制度。苏子曰：事若可行，不必皆有故事。若俗所不安，人所不悦，纵有礼典明文，无补于怨。故履不必同要之适足，治不必同要之通时。又曰：通其变，天下无弊法，执其方，天下无善教。

○将老

秦始皇取荆，初疑王翦老而怯，后卒将翦而克。汉宣帝将七十馀之赵充国遂平羌。光武将铄翁之马援遂定蛮。晋邓艾平蜀，王平吴，年皆七十。他如吕尚八十遇文王，百里奚七十干秦缪，晋重耳六十二反晋国，郈食其六十二遇汉高帝，裴度、郭子仪身益者，国益重。盖经历多，思虑精，举措审，往往以老得之。张南轩尝评充国之将曰：将之失从负勇而悛谏。充国曰：兵难喻度，愿至金城，图上方略。其不忽事如此。将之病患急近功，充国屯田为久计，图其万全；将之病患好杀，不恤百姓，充国图坐消西戎，使百姓安焉。此岂少年尚气贪功者所及哉？

○帅职

南轩帅荆，遗晦庵书曰：某受任上流，军卒责都统，财赋责总司，吾帅臣专以固结人心为本，使人有尊君亲上之心，则以守固，以战克矣。兵、财，帅大务也，而民又最焉，其论识可谓约而事要矣。

○服食为本

禹别九州，冀为王都，独不言贡篚，近王畿曰甸服，甸为天子治田，赋专出谷。盖王畿地大人众，四方根本所在，急在衣食，故畿内百里赋纳总（禾本全曰总），二百里纳车至（刈禾器），三百里纳秸（半藁去皮），四百里粟，五百里米，凡以食为重也。兖、豫、青近王畿，兖贡蚕丝，豫贡绵、纴、纡、纆，青贡盐、丝，凡以衣为重也。徐州之贡宝玉玩好而已。《洪范》八政先食货，《豳?七月》周公陈先公风化，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以民事，皆谆谆农务，以此见王者富有天下，亦不可一日忘情于衣食。

○江河淮汴

天下转漕之水其大有四，曰江、河、淮、汴。河可聚西北之漕，江可聚东南之漕，汴引河入淮，实江湖脉络，可聚中原之漕（按洛以入河溢为滎。《史记正义》。曰：滎水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，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于楚，即官渡水屯。详此则汴古已有，后世以为始隋，非也。但前贤明此水不一，或谓上名鸿沟，下名官渡。张华谓鸿沟、官渡各一水。胡明仲谓汴、鸿沟、官渡为三水。张伯谓：滎引河东南。注：至大梁浚仪分二渠，一为官渡，一为鸿沟，汴别为渠。今汴自西而东，鸿沟横亘南北，但三国袁、曹相拒官渡，操曰：悠悠黄河，吾其济乎？则官渡自黄河）。其余小水随地

所出，俱达江河，备著《禹贡》。淮出桐柏山，溯汴北通河，而南不通江，故《禹贡》述江水沿于海而后入于淮。《左传》谓吴夫差始通江淮，由是四水通济（《孟子》曰：禹排淮、泗而注之江，然《禹贡》禹平水土之书，果通江淮必述之矣。兼古封国各有限域，以唐虞五服制考之，淮且居荒服外，况江表乎？故《孟子》之说可疑。春秋吴凭陵上国，至北伐齐与中国之盟会，乘便取捷，盖通江淮之始）。凡水，水力不同，舟载亦异。唐刘晏转漕给关中，初概以航运艰阻百端，后察江船不可用于淮，淮船不可用于汴，汴船不可用于河，遂随岸置仓贮载，因相水之宜用船，运遂无阻。河至龙门扼底柱险，复资陆运入渭（按唐运避三门之险，开三路于八里始济）。渭浅深不常，隋兴，凿渭自口兴东至潼关，凡三百里，名开通河，然后关内之运通利。唐以来潼关有变，河汴不通，则江运溯汉，入武关以达长安（按：汉水、邓州计六七百里至武关，至洋川始陆运出扶风）。但汉上流滩险，不若河渭之易。唐末及朱梁初都洛，后梁以洛运艰改都汴，汴中据江河，水陆都会，资用富饶，而处势平旷，天下有事乃四战之冲，须以兵固，所以古今言王者之宅，必曰长安、金陵，盖以运便而险塞也（长安襟山带河，沃野千里，地产多可富国，古号陆海。金陵前控江淮，后引瓠越，左通荆襄，右达吴会，外则长淮沃壤千里，桑田鱼盐之利甲天下，内则交、广海错之珍尽东南贡，江左第一形胜。宋之南渡初，李伯纪、胡安国进计，皆请措置荆襄为根本。按荆襄地夷旷，胡五峰尝谓欲退守江南则襄阳不如建邺，欲进取中原则建邺不如襄阳，二公盖为进取计也）。

○张道陵

《汉书》著张陵字辅汉，光武建武十年生，天目山得道，善以符治病。桓帝永寿元年于灵峰白日上升，该百二十岁。而邵伯温《闻见录》著汉建安十年曹操破张鲁，定汉中，鲁祖父陵，顺帝时客蜀，学道鸣鹤山中，造作符书惑百姓，受其道者辄出米五升，时谓之米贼。陵子衡，衡子鲁，以其法相付授，自号师君，其众曰鬼卒，曰路酒，曰理头，大抵与黄巾相类。朝廷不能讨，就拜鲁汉宁太守，镇汉中。观此则张陵非异人也，道家今祖陵为天师，初只泛号，唐始定封也。

○对独说

程子曰：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。朱文公广为一中又自有对之说，又曰：乾尊坤卑，不可并立，盖尊无二，上意也。以类推之，君对臣，必君令臣行；父对子，必父召子诺；夫对妇，必夫义妇顺；天对地，必天包地外；阴对阳，必阳生阴畜；日对月，必月受日光。此对而必归于独，可言也。若中国对四夷，君子对小人，而耳目、手足之对若之何一之？冯亿可曰：阳一阴二，邵康节

有是言，然三纲之正，九畴之叙，虽夷狄小人必藉是以立，是数者非中国君子莫致之，则中国未尝不为四夷所利赖，君子未尝不为小人之也。若手足虽对，然不左如右之便。耳目虽对，而耳不两听而聪，目不两视而明，则亦无害其为独也。于父子尊卑不并立之说有矣夫。

●卷八

○天即理

讖纬之学未兴，古人自信多托之天，尧舜让贤，俱曰：天之历数在尔躬。汤武之兴，曰天命弗僭，曰天一德，曰天其以德民，曰天矜于民，曰天必从之等语，往往借天为训。朱文公谓事不出于人则出于天，天即理也。凡合于理之自然，非人私智所为者，皆谓之天。桀纣之暴如是，东征西怨，南征北怨，三千臣而同心，八百侯而毕会，乃是人智力不可得而争者。汤武顺之则天，逆之则人，其谓之天不诬也。《左传》曰天诱其衷，曰天夺之魄，夫岂有诱夺之迹哉？行事顺理而兴，殆天启之，行事逆理而亡，殆天丧之，天且不违权于理之逆顺。《孟子》曰：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。先儒解天因舜之行事，示以与之之意，尧舜子不肖，便见天不久尧舜之天下，启贤能继，便见天欲久禹之天下，故曰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。禹治水，彝伦攸叙，箕子曰：天乃锡禹。《洪范》、《九畴》，亦谓禹能顺水之性，不失高下之宜，盖天锡以知九畴之叙，故无逆水之失。汉儒不审，乃拘于洛书龟背水文多少之较（详《书·洪范疏》），岂真知天者？况太古文籍未生，天果以龟文示人，亦未必有所谓不一名字三十八字之详也。又按《易·系》，孔子只言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即无龟龙之说。汉世纬书起，始曰龙负图，龙负书，殆汉儒增也。兼古人言灾祥多卜以人事，纬书尽益以神怪，禹观河见白面长人，殷白狼衔钩沈璧于洛，而黑龟兴之书，黄鱼双跃，周赤雀衔书，白鱼入舟皆《礼纬·稽命微》之辞，故讖纬皆起汉儒。

○仓颉

仓颉制字，宋衷、皇甫谧辈俱言颉黄帝史官，不知伏羲居黄帝前，已言作书契，不应先有书契，后有字。且管仲言古三王以前封禅者七十二君，皆纪号泰山。《庄子》亦言十三代之封，有纪勒者千八百馀所，其纪勒必皆字也。晋索靖《草书论》：仓颉既生，书记是为。《尚书疏》张揖云：仓颉为帝王，生禅通之纪。《春秋元命苞》叙帝王之相曰：仓颉四目。则仓颉者，伏羲前一帝号也。故蔡邕、曹植皆称颉皇，吕不韦称仓颉亦曰史皇氏（世谓字书为史书），则谓为史官者谬也。开封府浚仪有颉城，《论衡》云：学书讳丙日。以《五行书》言，仓颉死丙寅也。

○轩辕黄帝

《庄子》著轩辕氏后始有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、黄帝氏，《六韬》亦著轩辕氏在骊连氏、赫胥氏之间。轩辕，自古帝王一号也。古币亦有轩辕、黄帝之分，轩辕币始作货，黄帝币又作布，则轩辕、黄帝为二，又轩辕以车得名，轩辕睹转篷之风法制车轮，轩，车横木，辕，车直木，因以为号。黄帝见大蚓曰：土气胜，土色黄。因号黄帝。司马迁不详，乃曰：黄帝名轩辕。后人从而讹，执古为信，《庄子》文古《史记》（按《河图》：黄帝名轩，又曰：封降禅德祖黄轩。《论语》考曰：轩知地利。则黄帝单名轩，非重名也）。

○陶唐、殷、商、荆、楚

陶地名国始颛顼，尧先居陶，后封唐，故陶唐并称。汤初兴商丘，后盘庚迁殷，故名殷。荆楚共一，本名熊绎，初国于荆，号楚（春秋初例称荆，公后始称楚）。至秦襄王母名楚，讳复称荆。

○尧舜病博施

天不能长春而不冬，当而不雨，日月不照覆盆之下，生长不施霜雪之时，虽天地之大，犹有馀憾。尧舜其仁如天，岂不欲衣帛食肉均于老幼，而养有所不给，故五十衣帛，七十食肉，王政必为之规；岂不欲疲癯、残疾、鰥寡、孤独均获仁遂，而禀气不足，不能移其赋受之偏；岂不欲穷发之北、不毛之地均入抚绥，而风气所限，不容不听之要荒之外。故博施济众，尧舜亦病，秦皇、汉武乃欲威服荒远，以示无外，岂不谬哉！

○豫让

智伯无后，豫让杀身以报，非了死生之分者不能。然人臣事君，救过于未萌，上也。及临事而正救焉，次也。听其君之自是自非，付其国于自存自亡，而曰：吾能他日为之死，斯为下矣。豫让义士，智伯以国士待之，智伯不可谓不贤，让不可谓不遇，而智伯贪三晋之地，疵测韩魏之反，张孟谈启韩魏之攻，巧文辩慧而甚不仁，让曾无一语与其间，犹谓让之忠于智伯乎？逮其死也，始吞炭漆身，求杀襄子，为忠君子，不能不恨其晚也。昔齐景公问晏子曰：忠臣之事，君如何？对曰：有难不死，出亡不送，公曰：难不死、出不送可谓忠乎？对曰：言而见用，终身无难，臣奚死焉？谏而见听，终身不亡，臣奚送焉？言不用而难死之，是妄死也；谏不用而亡送之，是伪送也。故忠臣者尽善于君而生，不蹈恶于君而死。让谓其死将以愧天下后世人臣怀二心者。吁，怀二心之臣视让诚愧矣，以让视婴独不愧乎？故予于让是其死，不是其生，取其节，不取其智。

○饮器

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为饮器，汉建元中匈奴破月氏主，以其头为饮器。《史

韵，饮器》：饮，音荫。《汉书》韦昭释：禅也，盛酒器。晋灼曰：饮器，虎子属溲便，褻器也。颜师古引匈奴破月氏王头共饮血盟为证，谓饮酒器。如颜说，贵之也。且死骨凶秽，又恶人头颅，岂俎豆可宜乎？溲便释盖似之，万见春亦是晋释，但名虎子未详。

○射日补天

羿射十日之语见《庄》、《骚》，俱谓天有十日，射之。但尧时羲和君之子名羿，十日、九婴、大风、封豕、长蛇等皆顽凶为民害，尧命羿杀{穴契}窳，射十日，激大风，戮九婴，驱封豕、长蛇，而民害息。则十日者，非天之日也。共工氏触不周山，折天柱，绝地维，及女娲补天之说见《列子》。按共工氏霸九州，实太昊之臣，恣睢跋扈，亾扰天纪，女娲灭之，四土复正，万民更生，此女娲补天立极之迹也。炼石补天果人力能与否？事不经见，皆当理决。血流漂杵，《孟子》且曰：尽信书，不如无书。矧《庄》《列》谬妄之说，荒唐之言乎？

○经解

六经之道至夫子而集大成，夫子之道至晦翁而集大成，诸家经解前后不一，自断定于晦翁然后一出于正。后学倘非经指授，则泛滥诸家，其谁适从。今经解有昔贤品题，其当者曰：《易》有伊川《易传》、《大易粹言》，《系辞》则柴侍讲集解；《书》有东莱《说林》、少颖解；《诗》有东莱《诗记》、晦庵《诗传》；《周礼记注疏》晦庵取之，而王荆公、王昭禹《周礼解》，方博士、陆农师、马博士《礼记解》，晦翁俱以为当。又尝言荆公经解有益后学，《春秋》胡文定于褒贬之例尤严，《传》则东莱《左氏说》为最也。后学倘循是索之，不至以多歧亡羊矣。

○玩物之戒

汉文《却献千里马诏》曰：吉行五十里，师行三十里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？宋武碎琥珀枕，遗北征将士曰：能瘳金创。萧道成治齐，期黄金与土同价。唐太宗还林邑鹦鹉曰：鸟兽怀土，亦与人同。皆有超人识度也。近世大贤吕文穆却献二百里鉴曰：吾面子大，安用照二百里鉴？王文正旦嗤弟百万买玉带曰：自负重债而欲使观者称好，不亦谬乎？有以砚润售孙侍读甫者，孙曰：一日得担水才直三钱。古人达理，不为玩好如此。国初人宝李廷墨石，昌言至不许人磨，或戏之曰：子不磨墨，墨将磨子。有人咏李廷墨云：一墨足支三十年，但恐风霜侵发齿。非人磨墨墨磨人，瓶应未罄先耻。文谷制墨，必用高丽煤，前辈谓世无二子，墨终不乏用，人固愚尔。

○夏后氏

经书称夏皆曰后氏，殷周皆曰人，班固《白虎通》曰：夏禹受禅为君，故

称氏，殷、周征伐得天下，故称人。则舜曰有虞氏，亦以尧禅尔。

○大城多兵

古封建法行，井地制定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之国随提封广狭出车乘多少，故有万乘、千乘、百乘之别，诸侯大不可陵，小不可僭，所以治安可久。周东迁，古制坏，诸侯各以力胜，王室不能为之制节，小大始紊。至春秋国自为政，齐创内政，寓军令，晋作被庐之法，鲁作邱甲城，过百雉，俱不可以先王之规律之矣。至战国齐以技击强，魏以武卒奋，秦以卫士胜，孙吴辈出，贵势利，尚诈谋，古制百不一存。故赵奢与田单论兵曰：古者四海万国，大城不过三百丈，人多不过三千家，以少战足矣。今万国合为七国，战，国必具数十万，食能支数岁，千丈之城，万家之邑相望也。而欲以少战，可乎？在奢已叹不能循古，况去古又远者乎？后世不审强弱，动欲仁义饰兵，恐不为汤武，而为宋襄、陈馥也。故欲徇古制须封建。

○武士不恤

郟食其掉三寸舌，下齐七十城，亦奇矣。韩淮阴激于蒯通一语，随以兵蹶其后，更不计食其利害，卒使身膏鼎镬。唐初颉利归命，太宗遣唐俭慰抚之，李靖、李谋曰：今诏使在彼，虏必自宽，若遣万骑袭之，不战可擒。张公谨曰：使者在彼，奈何？靖曰：唐俭不足恤。遂勒兵夜发。宋绍兴间兀术入寇，韩世忠驻兵扬州，奉使魏良臣过扬，世忠置酒相待，杯一再行，更牌沓至，良臣问故，世忠诡曰：有诏移军中江郡，召撤爨班师。良臣方去，世忠麾军踵其后，设伏大仪镇，良臣至虏，虏问世忠动息，良臣以所见对，兀术乃大发，引趋江，遇伏，战败还泗上，责良臣卖己，欲烹之，良臣好词得免。旧传已□□□□□□帅自蜀入援，舟次金口，扼敌不得前，亟遣将与岸战，战方酣而帅舟已取。盖兵尚诡道，蝼蚁万命，取决一时，不容自己。然好战嗜杀之人，多出残忍待之之方，亦须识时量势，身在其间，则在彼者固莫测，而在我者亦未可知也。

○过百为寿

《庄子》及《左传》杜预注皆有上寿、中寿、下寿之别，孔颖达疏：上寿百年以上，孔安国传《洪范》五福曰：寿，《传》曰百二十年为寿。盖本《老子》：人生大期，百年为限。过百而增，是谓上寿之寿。按《礼记》：人生十年曰幼，学；二十曰弱，冠；三十曰壮，有室；四十曰强，而仕；五十曰艾，服官政；六十曰耆，指使；七十曰老，而传；八十、九十曰耄，七年曰悼，百年日期，颐。王荆公注自幼、弱、壮、强、艾、耆、老等下皆著读点，其下学、冠、有室、而仕、指使、而传自为句，总上十事，各十年一目，寿为过百之目，亦有理。

○豪杰不苟就

古豪杰皆不轻用其身，伊尹三就桀。《鬼谷子》著太公三入商朝，三就文王，然后合。故孙武兵书著吕尚、伊尹于《反间篇》，以皆往来迟回二者间也。张子房圯上一编，屡以说人，始说沛公。马援初游陇、汉不从，盛陈陞卫之公孙述，而从袒帻迎笑之光武。袁绍礼郭嘉甚，至嘉去之，及见曹操曰：真吾主也。张宾见石勒曰：吾历观诸将，无如此。胡将军乃提剑诣军门。王猛闻桓温入关，被褐诣之，温不渡灞水，遂去不就，后宁事苻坚。晋屡征谢安不起，桓温征，始赴之。盖小人之仕在济其欲，君子之仕在行其志，于是可观豪杰之志矣。或劝东汉魏桓就征，桓曰：今后宫数千，其可损乎？厩马万匹，其可灭乎？左右权豪，其可去乎？干禄求进，所以行志，而若此出何为哉？遂以隐终。大概士之有志于时者，熟察世故，胸中皆有素定之规，度其人不足与谋，万钟于我何加焉。东坡尝谓淮阴终身事业，一见高祖而决之；诸葛孔明用蜀，只隆中初见刘备数语。范文正公天圣中上《万言书》，欲致太平，考其平生所为，无出此书者。司马仲达号盛雄，初亦韬隐，后就征曹操。胡致堂谓孔明躬耕南阳，既不从难与争锋之曹操，又不附可与为援之孙权，独委身流离颠沛之刘备，且三顾后起，则措身之审，又非徒较强弱而已。

○三教

三教各植门庭，互有诋訾。儒者辟天堂、地狱、轮回、懺悔之非，据理而论，非过攻也。若二氏自相诋訾，则释氏云：摩诃迦叶下生世间，号曰老子；老氏云：老君遣关尹骑白象下天竺，于净饭夫人人口中托生为佛。人云老耽入秦，西历流沙化胡为仙，此皆二氏各以求胜之论也。至二氏于儒教，《庄子》首言孔子问礼老耽，释氏《佛地经》云：宝轮王下生，号伏羲，吉祥菩萨下生，号女娲，如意菩萨下生，号孔子，月明儒童下生，为颜子。韩子《原道》谓佛者曰：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，本此。南景福二年易澡水县南孔子祠为寺，以孔子适楚尝经之地，复改为儒童寺，岂孔子真佛派也？吁！不能诃其谬，过矣！又从而溺焉，岂不甚哉！《古今论》著周《素异记》云：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井泉溢，宫殿震，恒星不见，太史苏繇占为西方圣人生。此周书纪佛生之异也，则又安有前唐、虞、夏、商预托生为伏羲、女娲等理乎？况《春秋》书恒星不见于庄公十年甲年岁，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，周纪亦附会无稽之谈也。陈大建五年恒星不见，史占为主不严，法度消，天子失政，诸侯暴横，国亡之象，又岂生异人之祥乎？

○耘耔

《毛诗》释耔曰雍本。《汉志》释耔曰附根。谓代田之法，一亩三川，广深各尺，播种川中，苗生叶以上，稍耨垄草，因又壅土附根，每耨辄附，比盛

暑，垄益高而根益深，能耐风与旱，故所种实茂。大概除草附根则草腐，根原因以肥润。耘，乃耔之利也。今农家习之而不知。

●卷九

○星土

古以星正时，未占灾祥，春秋始有焉。然燕为析木，赵为大梁等说始战国邹衍之言，《左传》及之。故昔贤疑《传》为战国时人作。班固《汉书》直以秦、魏、周、韩、燕、齐、鲁、宋、郑、卫、吴、楚十二国分配二十八宿，遂为古今不易之占。但封建法行，唐虞称万国，夏、商各二三千国，周之初封亦一千八百国，春秋时国名见经传者一百二十四，星则止于廿八，春秋末十二国上与列宿参，何也？又晋在春秋为大国，战国韩、赵、魏分晋则晋裂为三，今十二分野中不应赵、魏而缺晋，至指鹑火为周地，厉封镐，西周固为丰镐，其在洛阳又隶何星乎？魏陈卓于十二分野中复别以度数，言星一次三次为天之一度，言天一度直地三十里，古制九州，州方三千里（尧五服制），则一州之广仅当天之一百度也，故昔贤谓班固以国直星之说，不若《周官》保章氏州配之说为正。

○孔子不述礼

古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为六经，孔子删《诗》、定《书》、系《易》、修《春秋》，正雅颂，而《礼》无的书，故汉以来诸儒但言五经，今二《礼》皆出汉儒。先儒因谓制礼王者事，孔子无位，不敢作。又曰：礼以义起，难立定制，经多合礼义，言者谓礼当临时以义断行之。如三代忠质文异尚，子、丑、寅建正随时损益，事固有古宜而今不宜者，况人性禀不同，仁或柔，义或刚，圣人因礼节文，使得其中，故曰礼因人情。《礼记》述孔子言礼有多为贵、少为贵、大为贵、小为贵、文为贵、素为贵之辨，至羔豚太牢之祭名求其称，则礼亦求其当而已。汉儒二《礼》皆欲补圣人之道，但未折衷于圣人，记不免杂，礼不免凿也（如历代乐名曰《六茎》、《五英》、《韶》亦不同，汉唐以来曰《文德舞》、《武德舞》，皆随功德之异名名。乐主和人心，圣人不能强之，必同所主者，雅正而已）。

○击壤

尧时老人击壤事见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及《列士传》。王充等说考击壤只当为蕢桴土鼓之义。按诸书解壤字，《尚书·禹贡》：黄壤、白壤、黑壤，孔安国《传》曰：土无块。《韵释》：柔土也。《周礼》辨十有二壤，郑注：壤，和缓之貌，《梁》：日食内壤、外壤。壤，伤也。而《国策》蚁壤亦谓泉穴地出土。独《艺文》及《风俗通》指击壤为木戏，谓壤木为之前广后锐，长尺四寸，阔三寸，未戏先侧一壤于地，远三四十步，以手中壤击之，故曰击。切

意古人淳朴，未必为此。

○田猎

春、夏苗、秋、冬狩，四时之猎皆曰田，字与田亩之田同。王昭禹释《周礼》云：获者取左耳计功与获利于田同，为之围与疆理同，犄角鸟兽与耘同，度可杀而不可乱，所以猎亦曰田也。

○五行寓数

五行：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天三生木，地四生金，天五生土。五行相生次第，有生于无，著生于微，数皆以微著为次。水最微，居一；火渐著，居二；木形实，居三；金体坚，居四；土质重，居五。若成数则皇甫侃以为金、木、水、火皆资土以立，犹仁、义、礼、智必以信而存，故一得五而成六，三得五而成八，二得五而成七，四得五而成九，朱文公河图说实祖之。

○诗从寺

诗，古人言志之辞。孔颖达推其始于蕢桴土鼓之世，盖有乐即有节，音节者章句之祖。圣人删取为经，以人情触于外必动于中，因美刺形焉。上之人采以参己政之是非，求合乎众之所与，故可以兴，可以观，所以有补治道为经也。王临川谓诗制字从寺，九寺，九卿所居，国以致理，乃理法所也。释氏名以主法，如寺人掌禁近严密之役（《韵书》：寺，音侍。诗初注音皆如字），皆谓法禁所在。诗从寺，谓理法语也，故虽世衰道微，必考乎义理，虽多淫奔之语，曰思无邪。后之诗直者伤于讦，美者近于谀，甚至增淫导欲，夸华斗靡，岂诗之旨哉？康节云：自从删后更无诗，以无维持世道之诗也。近代惟杜子美诗为诗史，知道者犹以不济事少之。故真西山选诗，取于民彝世教有补者。至孔子删《诗》而无自作之诗，商赐可与言《诗》，孟子长于《诗》，例皆无诗。苟无所益，徒主言语，无取也。

○制币

祭祀用币，皆一丈八尺为度。按一象阳，八象阴，寓阴阳数，鬼神之道，阴阳不测也。《礼》：聘礼，帛用二丈为端。则寓偶数，色尚玄纁。玄，天色，纁，熏，地色，天地偶合也。

○莱

《周礼》遂人颁田里之法：上地，夫一廛，田百每，莱五千晦；中地，夫一廛，田百每，莱百每；下地，夫一廛，田百每，莱二百。莱郑玄释郊外谓之莱，休不耕者。盖大国从造都鄙，凡言莱谓不易、一易、再易之地。不易地，岁岁可耕者；一易，闲一岁而耕；再易，闲二岁而耕。赵过代田亦是视地肥瘠更代田之。他经释莱，但泛曰草。

○伊吕、周公之将

三世为将，道家所忌。盖兵家多尚诈力，绝人命，凶狠贪残，所以道家忌之。若吴起、韩彭辈身戮族夷，且不终世。然伊吕、周公亦尝为将，子孙有国，与商、周等。盖不尚诈力，但与世平乱除害也。秦、隋、曹、马南北五季，皆是遂其篡夺，卒不永祚。汤、武、汉、唐非不用兵，祚延千百，亦其取天下为民除残也。此可见兵非美事，用非得已，宜其为幽冥所忌。

○宫府一体

孔明《出师表》曰：宫中府中，皆为一体。朱文公尝推明之曰：昭烈父子以区区之蜀，当吴魏之全，盖天下十分之九倘于其中，又于公私自分彼此如两国然，则是以梁益之半，图吴魏之全，内之所出日有以贼乎外，公之所立常不足以胜乎私，是此两国者又自相攻，外有邻敌之虞，内有阴邪之寇，国亦危矣。以亮忠智，为蜀谋不过如此，可谓深知时务之要。春秋鲁谋叛晋，季文子曰：国大臣睦而迩，于我未可以贰。王猛劝苻坚勿伐晋曰：上下安和。权翼亦曰：臣辑睦。乃知邻敌谋入国家，亦视其有乖争之隙。匈奴患汉元成之威，孰与高武呼韩邪卒臣事者，五单于争立故也。此孤则见折，众则难攻，吐谷浑所以有折箭之譬。

○奸雄入科目

汉以孝廉取士，而孙仲谋、曹孟德皆举孝廉。唐重进士，而黄巢屡举进士。

○兵势缓急

燕慕容恪常言兵势缓急之宜，曰：若彼我势敌，外有强援，恐腹背患至，则攻之不可不急；若我强彼弱，无援于外，力足制之者，当羁縻守之，以待其弊。兵法十围、五攻，此也。魏武帝曰：食少兵精宜速战，粮多卒众宜持久。予观古人去国远斗之师，皆以不战困衄。盖兵必资粮，兵愈众则粮愈不给，愈远则粮愈不及，故坐困得策。况战争攘夺之世，民不得耕者众，而师旅数起，又非担石可给，故馈饷最急。又民以食为天，苟欲立事，必多得人，而人非食不众（汉高拒楚，始终据荥阳，以敖仓在也。唐初李密起事，说翟让据洛口仓。王世充据东都亦为洛口仓，后虽不终，而一时皆取胜）。赵充国计兵一人一月之食为米二斛四斗，汉量未考与今量如何，如计兵万人一月食，人日二升，今量为米六千石。宋隆兴初传金兵于河南者十七万，韩魏公曰：且未论人粮，以十七万，一月马草计之须二百一十万，而驴骡驮载安能为继？所以左车策赵，韩信亦高之，但拘于守不免自困，故左车深沟高垒，不与敌争，所以为奇兵也。充国、魏公测兵必测粮，可谓工于知兵，岂虚声所能济哉？

○王荆公

荆公《万言书》论教养人才与制禄久任之道，古今无易也。正史略之，殆

非不以人废言之意。其归老蒋山，往来乘一黔直蹇驴，或告以笏輿便者，公曰：不忍以人代畜也。第宅舍为寺改筑，仅庇风雨，后至税屋以居，舍宅虽口义，异乎贵盛而甲第争雄者，以山谷谓公不溺于酒色财利，一世伟人也。且有荆公六艺学妙、处端不朽之句。温公谓介甫行义文章，节节过人。又谓金陵平生行止，无点污神宗聪睿。每事景慕三代，不肯为凡主，故惟荆公书以动之。惜乎！众君子不合，遂至引用小人以误国，所谓大体既差，细美勿论是也。

○英雄不死

晋公子重耳遍历诸国，艰阻备尝，卒霸晋。沛公屡危项羽，范增切切杀之，卒兴汉。刘玄德在三国，孙、曹谋臣周瑜、荀皆请早图，中间败于吕布、困于当阳，刘之不死者不能以寸，卒帝蜀。燕慕容垂降苻坚，王猛、权翼皆请谨其条笼，卒复燕。增、瑜、猛事三君最信重者，于此更不能入。他如桓元妻识刘裕，慕容绍宗知高欢，隋文帝、唐高祖皆以相表为时所忌，赵方面大耳，免于周世宗，皆未尝无驱除之心，数人悉全身济大业。又如曹操就擒于吕布之战，宇文泰坠马于季穆之扶，高欢逸身于贺拔胜之掣，韩信得释于滕公一言，往往濒死而生，盖天将兴之，谁能废之，殆非智力所及也。

○倡乱

陈胜乱秦，张耳、陈馀谓立六国后，自树党且益秦敌。杨元感乱隋，李密请乘炀帝在辽，急趋高丽扼海岸，使不得还，高丽闲之，必蹶其后，则腹背受兵，天下可抚而有也。黄巢乱唐，未逾年江浙、淮甸、东都、长安兵祸皆遍，唐智不及谋，勇不暇施，镇戍皆散，盗贼满天下，唐卒以亡。三人倡乱，所谓盗亦有道也。但余考多缘人主失乎人，不在敌之众多也。故七国叛汉，敌非不多，然高祖、文帝之法制未变，七国易于扑灭。穆王西游，徐偃称乱，然文武之德泽未斩，辙还而周室再祚。盖人心未去，故奸谋之不行。若秦、隋季世，思乱者众，唐末君昏，荡不可收，故曰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，又曰衣弊生虬虱，肉腐生蛆虫，自然之理也。

○以攻完守

城守虽以逸待劳，而拘于圜土则困，馈不继则饥，将有不攻自溃者矣。故善守者必以攻。周宣中兴，截彼淮浦，王师之所守有在矣。而曰如飞如翰，如江如汉，如山之苞，如川之流。则守不废攻也。战国韩赵被兵，孙武救之，皆疾走魏都，故曰解乱不控拳，救斗不□□也。汉高守荥阳，拒项羽，方荥阳之守未备，先遣羽齐梁反书，使羽力分于彼布越紓我，其后守荥阳，既用则南出武关，引羽救兵以休荥阳、京索间，且使韩信得辑河北、收山东，而汉有天下大半，徐还荥阳，则汉守完而羽地狭矣。垓下之围，天下之兵丛焉，羽安得不亡？太率好谋能听，功也。景帝时吴楚七国反，周亚夫亦先委梁饵吴，而身出

武关制之，又攻其所不备也（宋末儒帅当边寄者多尚城守，王登帅，荆柯竭以诗云：一圜土里作规矩，以此平戎计恐疏。我欲守株难得兔，彼专灭水易枯鱼。直须日日论军实，也要时时才弃散虚。赦出河南二万卒，便从石勒上条书。登大是之。灭水枯鱼谓扰耕牧、徙人民也）。

●卷十

○天干地支

阴阳家以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名天干，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名地支，其配甲乙木，丙丁火，戊己土，庚辛金，壬癸水，寅卯木，巳午火，申酉金，亥子水，辰戌丑未土，干支皆分配五行也。然十干配五行，合而类五；十二支配五行，合而类四。五，阳数，属天，故奇圆为天；四，阴数，属地，故偶方为地。天始于一，终于九，地始于二，终于十。又奇函偶，阳包阴，天统地也。支本十二而干则十，支，地也，干，天也。二气错综，万物化生，故分阴分阳，必曰动静互根云。

○古乐

《书》称《韶》乐之感曰：戛击鸣球，搏拊琴瑟以咏，祖考来格，虞宾在位，群后德让，下管鼗鼓，以祝笙镛以间，鸟兽跄跄，《箫》、《韶》九成，凤凰来仪；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宋子京谓此后夔推美舜德侈言之，非真有凤凰、兽舞也。盖乐作之朝廷郊庙，有宫室之严，有阶陛之阻，有营卫之密，凤、兽山林物，安得至此鸣舞于群后众宾耶？君祖考来格，亦岂俨然见之乎？又夏王懋德，山川鬼神亦莫不宁，鸟兽鱼鳖咸若等语，说者亦谓夸美圣德之辞。《周礼》：吉乐一变致羽物川泽之示，再变致羸物山林之示，三变致鳞物丘陵之示，四变致介物出示，六变致众物天神，又云六变天神降，八变地祇出，九变人鬼礼。《史记》述师旷鼓琴曰：一奏玄鹤二八集门，再奏延颈鸣，舒翼舞，复鼓云从西北起，大风至，雨随之飞廊瓦。其后晋国大旱，赤地三年。汉武用乐甘泉，亦有此等语。余尝谓古乐固不敢知今乐，但晋魏以来明音者多矣，未闻有此仿佛，何耶？想亦史氏诗辞，或圣人德动天地、行通神明所感，不专乐也，不然经史之论荒矣。

○梦卜

六经信梦卜，其语不一，予谓凭以决细微可矣。将相系国安危，才否未谖，但参梦卜，可乎？高宗梦傅说，俾以形求，一旦胥靡惟肖，置诸左右，爰立作相，更无疑议。尧举舜侧微，询四岳，试诸难。舜传禹，验之治水，委之征苗，参之历数，徇询谋龟卜而后定。高宗以一梦立相，何易也？后世因有奇才不次用之者，然多见之抢攘猝急之际。若齐桓相管仲，以鲍叔为之先。汉高将韩信，亦以萧何荐。其贩缯屠狗之流，皆识其有一长，始乃举用，未闻以想像

决也。《史记》著文王取太公，亦决之猎卜。然《孟子》言太公之出曰：太公避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盍归乎来，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其出实太公就之。又曰：若太公望、散宜生则见而知之，以亲闻道于文王也，岂有不平曰师资太公之才德，而徒以一旦飞熊之形象乎？则卜载归之说，史迁无谓也。《尚书·君篇》曰：有若虢叔、闾夭、散宜生、泰颠、南宫括则文王之丑臣也。至武王子有乱臣十人，说者始益以太公，《诗》述武王牧野之战曰：惟师尚父，时维鹰扬。则太公持以韬略，为武王兵师，迁未详也。假梦卜神其入，不知昧于圣人审重之旨也。或又谓高宗识傅说，武王识太公，而众人未知，故假梦卜进之。余谓此后世君臣相诈之术，非所以论圣贤一体之君臣也。

○圜扉

古圜土、圜扉，按圜，圆也，圆中规，规圆主仁，矩方主义。狱名圜者，欲吏以仁心求其情，乃仁以义断也。圜土，周狱名，历代名狱各不同，夏曰均台，殷曰里，秦曰圜圉，汉曰若虚，魏曰司空。

○名犯圣贤

后世讳犯古人不一，若圣贤名姓例不避，则通矣。唐尧、虞舜帝王冠冕，而汉有唐尧为吏，梁有虞舜官太常，荐明堂议。成汤殷之盛王，而汉有成汤（按：汤名履，初兴亳汤阴，因以地号曰成汤，犹言成周，然犯虽非似名，而与圣人相犯，亦不雅）。颜回，孔门高弟，而晋有颜回为羌帅。《书》两伯夷（一虞秩宗，一谏武王），《论语》两南宫括（一问羿，一乱中）。共工氏霸九州，而舜时垂官共工相类。曾参杀人而孔门曾参见疑。羿善射，一帝誉之臣，一有穷之君。然则汉以来两龚遂、两京房之类无怪矣。

○服节

《易·系》言：上古丧期无数。《尚书》言百姓如丧考妣，三载。则三年丧唐虞时然矣。《礼记》言服制法象天地。盖齐斩三年，则气历一闰期，象岁一周；大功九月，更三时则物已成；缙三月，则一时之数，法天也；小功五月，象五行，法地也。故曰天地则已，易矣，四时则已，变矣，岂不送死有已，复生有节。按唐虞前吉凶无二服，《郊特牲》曰：太古冠布，齐则缙之（皇氏谓鬼神幽暗，故齐则缙）。郑玄曰：三代下冠衰始异，唐虞以上吉凶皆用白布。孔氏曰：三代以来，吉礼制始不用齐冠，故夏毋迫，殷章甫，周委貌，各以冠别，而白布专为丧冠。

○社稷

《礼》：社，祭土，其神曰句龙，以治平水土也；稷，祭谷，其神曰后弃，以教稼穡也。地广不能遍敬，故封五土为坛而祭之；谷多不能尽祀，故聚五谷为单而祭之。然独祀粟者，以首种为百谷长。《尔雅》粢盛亦释稷。土神之

祀于家，曰中二，屋开其上取明，《诗》曰陶复、陶穴是也。其中穴明，雨四二之，因名室中曰中二，后世易为屋漏。朱文公谓当于屋中祭之。

○九夷

孔子生衰周，历聘不遇，固是道大难容，亦是诸国各有世臣把住，如鲁三桓，齐田氏，晋九卿，不容圣人插手。况世臣皆有无君之心，孔子得政必所不容，故辙环不遇。圣人知道不行，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曰：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。曰：乘桴浮于海，曰欲居九夷。此岂真欲弃中国归九夷哉？盖深叹中国无可与有为之人也。九夷，《李斯传》：惠王用张仪之计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汉中，包九夷，制鄢郢。谓为楚地。孔子尝聘楚，使九夷为楚地，即之甚近，何以叹为？按《汉书》班固《地理志》指九夷为元菟郡，《书》宅夷之地，箕子始封之国，今屑高丽。范晔《后汉?东夷传》言东方之夷有种，天性柔顺，易以道御，至有君子不死之国。且援应劭《风俗通》之言曰：夷者，抵也，言抵天而好生，万物抵地而出。岂圣人厌乱思治，欲得柔顺易以道御之国居之乎？详叹意，其九夷只当如汉传所指。

○矢字

矢非但兵械，《左传》文公十八年叙襄仲杀惠伯曰：杀而埋之马矢之中。《庄子?人间世》曰：爱马者以筐盛矢，以辰盛溺。《史记?赵奢传》云：赵使者毁廉颇曰：与臣坐，顷而三遗矢。《三国志》吴主遣取藏中蜜，蜜有鼠矢。魏高欢微时，然马矢作靴。唐安庆绪炊马矢以食。东坡诗：但寻矢次觅归路，家在牛栏西复西。皆此矢字。

○创业之主诚直

成汤放桀曰：予有惭德，恐来世以台为口实。汉高祖骂儒生曰：乃公于马上得之。及其病，却医曰：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益？隋文帝不许立碑颂功德曰：徒为后人作镇石耳。皇后崩，议葬地，帝曰：吉凶在人不在墓，吾家墓地若云不吉，我不得为天子，若云不凶，我弟不当战没。唐高相隋，国柄归己，群下请加九锡，曰：我秉大政，自加九锡，可乎？且自尊而饰让，心窃羞之。宋艺祖削平诸国，谕南唐曰：江南亦有何罪，只是自家著他不得。江南徐铉为李煜陈子事父之说，艺祖曰：汝谓父子为两家，可乎？又曰：不须多言，但天下一家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乎？飨太庙，有司陈礼器，曰：吾祖宗宁识此，亟命撤去。皆诚直不事讳饰，故朱文公谓艺祖气象刚明正大，宜其言若此，岂同曹孟德、司马仲达贻讥于石季龙也。

○文武取人

古今仕宦之途曰戚宠、曰赏粟、曰世泽、曰吏劳，而惟文武取人为正。然

唐人言能文不足佐时，善射不足克敌，要在文吏察其行能，武吏观其方略。汉武初读相如赋，恨不同时，及用之，终文园令，知其才不堪也。吴起将战，左右进剑，起却曰：一剑非将，事在运权制谋，不取一夫之勇。噫！文不经纶，武昧方略，弊也久矣。

○度才

人之才各有限量，裨谏谋野则获，谋邑则否。孟公绰优于赵魏老，不可为滕薛大夫。百姓之事蠡不如种，敌国之事种不如蠡。玄龄、如晦善断，姚崇知变，宋持正，黄霸长于治郡，劣于为相。魏夏侯渊长于设变，短于总众尔。朱兆将兵过三千则乱。晋殷浩、唐房、宋王安石初皆才望炳著，及登要地，例以虚声误国。故桓温谓浩为令仆，足以仪刑百僚，督师非其任也。韩魏公谓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馀，为相则不可。大概今之用人者，惟以年资计考，不复审量其才，往往受弊，不思古以夔典乐、陶作士、弃播种、夷秩宗，此皆唐虞明试博询，度其才之所宜，任之终身，所以世道称治（王临川曰：皋、夔、稷、契在唐虞皆终身一官，不使更任，其有降陟，亦特以禄秩而已）。汉文景并美成康为吏者，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，此岂有资叙年劳哉？武帝举霍光辅昭帝，官荣位显者，何限独拔一奉车郎不以资论也。谢安当淮淝之役，独任一谢玄，不以亲嫌也。

○御小人

赵广汉治颍川，吏俗朋党，不可施治，广设〈缶后〉，使相告讦，由是奸党散落。张敞治京兆，合境多偷，敞求偷长，赦其罪，令致诸偷自赎，由是无偷。唐高宗幸东都，命御史魏元忠检校盗前后，元忠取赤县狱盗一人，释械以从，倚以诘盗，比及东都，不亡一钱。此三事皆就其党制之也。宋西方用兵，初命宦者监军，牵制主帅，多失，朝议改选，仁宗问于夷简，乞诏官长自保伍其属，后有功罪同之。明日官长自请罢宦官。盖使中阉自请罢，则异日无覆出之恶，且不归怨于我。文潞公为相，日穿漯渠，会仁宗不豫，司天言渠不利之故，后议改穿，公请遣前言不利司天相之，司天恐他日所穿别有妨，已当其咎，乃更言前穿方位无碍。此二事务就其人制之也。元初司马温公为相，矫王介甫之失，弛差役，京尹蔡京希新旨，五日尽改之。使温公当时改作尽以此策待之，则异日绍圣纷纷，不致诸君子独当其咎也。伊川曰：作新人才不难，变化人才亦易，时诸人似皆可用，且人岂肯甘为小人？若宰相用之，为君子，孰不愿为君子？此等事不可教他门胜吾曹，故人才在君，相变化之尔。侯仲良曰：若然，则无绍圣间事也。即是观之，古今肩面更张，失变化人才之机也。

○东南国势

杨诚斋言于绍兴曰：以全楚为家，吴越为宫，此楚庄、阖闾、子胥、种蠡

所以强霸用武为根本；西控全蜀，南拥荆襄，北据长淮，此高帝、先主、孙仲谋、杨行密所以兴起之地；沧海限其东，三江五湖绕其南北，六朝所恃以为固而不可兼得者也；引巴蜀之饶，运关中之粟，市西戎之马，而号召荆楚之奇才，此汉高所仰以为资者也。有是数者以为资，而乃不能以自存，是挟千金而忧贫，有孟贲之力而怯弱避人惜哉！

○荆襄

荆襄地要，考之三国可证。方曹操、刘备、孙权割据，各欲占取荆州。故先主方有荆州，鲁肃说权取荆州曰：荆州与国邻接，江山险固，沃野千里，士民殷富，若据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资也。武侯初见先主，便谓荆州用武之国，蜀尝假荆矣，又争于吴，吴卒图关羽，全取荆州。其后荆、襄阳、南乡入魏，荆南郡、零陵、武陵入蜀，江夏、桂阳、长沙入吴。《禹贡》今荆之地遂裂为三，吴得荆之西，守夷陵，而北不得襄，卒无以图魏；魏晋有襄，并吴卒自襄始。危骊塘尝著论曰：得江陵则可以窥襄阳、固巴蜀，失江陵则无以保武昌、兴九江（武昌处沅、湘、洞庭众水之会，故吴、晋、宋、齐、梁为盛。九江处江西、番阳、彭蠡众水之会，故晋以来皆藩住二郡，宜蔽全吴）。得襄阳则可以通巴峡，缀关辅，失襄阳则必须保巫峡、护江陵，襄阳两失则天下事无可言者。余按：江水原岷山，出夔峡，江为长江上流。孔明谓荆州利尽南海者，此也。蟠冢导漾，东流为汉，出兴洋，襄阳实众水上流。庾翼谓进可以扫秦赵，退可以护江流者，此也（汉水至武昌下与江水合，失汉上流则水路中流不可守，失江中流，江陵上流之保遂为虚。襄阳蔽江陵，又杜汉入江中之要也）。吴陆抗尝言：上流有警，乃社稷安危之机，尝倾国拒之，非徒侵陵小害也。近代以堕甑视襄，岂特出孔明、庾、陆诸人之下哉？建炎南渡，李忠定、胡安国切切荆襄，盖深虑也。

○前定

大数皆前定，成王定鼎，卜世三十，卜年八百。始皇盛时，预识亡秦者胡。王莽未篡，夏良贺言汉历运当中衰，扬子云《太玄》言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夭（高祖至孺子婴二百一十四年）。隋文临御，卜葬者说言三十为三千，二世为二百。晋牛继马后之符，元帝、郭璞推江东与中原分合，至三百年当复合。唐李淳风言武氏杀唐子孙。宋兴，已有“过唐不及汉庚申”及“寒在五更头”等说（旧传太宗卜世于陈希夷，希夷曰：寒在五更头。又有□□□□□□□，风雨萧萧欲曙天，莫道五更天便晓，□□犹怯半更眠。因此宫漏增为六更。按宋以庚申起运，至理宗景定元年，历五庚申，越十七年，末宋亡，而希夷五更头之数信矣。五庚申后又十七年，岂半更眠之兆耶？元延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，帝乃宋少帝赵显子）。

○冥官历

赵清献公平生所为，夜必衣冠焚香，拜告天地。范文正公每寝，即计一日饮食之费及所为之事，必求称之。司马温公曰：吾无过人者，但平生所为，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。《东坡志林》有死而复生者问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，冥官曰：子宜置一卷历，昼日之所为，暮夜必记之，但不记者，是不可言、不可作也。又记前辈诗曰：怕人知事莫萌心。余谓赵、范、司马之所为，如左监右史之在侧也。贤者之所为尚如此，若《志林》所谓冥官历，我辈当各置一卷。

○月受日光

《天文志》言月不能自明，资日而明。京房曰：月与星阴者也，有形无光。先师云：月体似镜，其照处明，不照处暗。张衡曰：日譬火，火外光；月譬水，水含影。故月光生于日之所射，月暗由于日之斯蔽，当日则光形，就日则光尽。洪容斋《五笔》述太史刘孝荣之言曰：月本无光，受日为明。沈存中《笔谈》曰：月形如弹丸，受光如粉涂，月去日近则光渐消，渐远则渐生明。又曰：凡天地之光皆日也，如星亦受日光。朱文公注《楚词》援沈说且谓月初生，日在其傍，故光侧，人见如钩；日渐远，则斜照而光渐满。又援王晋说：日月生明之夕，人望之则人在侧，但见一钩，至日月相望，人处其中，方见全明，如有能凌倒景往参其间，虽弦晦亦复光其全明。详诸说则月光常满，人立有偏正，因见光有亏盈，非既死复生也。余尝因是验之，日没天晦，知天倚日而明，取盆水置赤日中，光辄印置阴处，动静随之，水受日光可推月光资于日矣。星受日光之说，亦尝验之，德乙亥六月朔日蚀，既昼晦，星独朗然。日蚀光既，星光自若，何耶？岂宋历告终，光固有常变之异耶？

○文尚喻

古人立言皆取象，盖即粗可以明细，因事可以识天理，故词每以喻而显，《诗》之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可证已。若《易》龙、马、龟、牛、鱼、狐、鸟、隼、鸿、雉、虎、豹、狗、豕、啄、羝、羊、鼠，则鸟兽备也；瓜、杞、兰、竹、木、茅、枯株、莽、葛、ぱ、枯杨、蒺藜、丛棘、硕果、苞桑，则草木备也；户牖、藩庐、屋、床、几、枕、尼、舟、车、鼓、舆、轮、复、斧、匕、鬯、瓮、缶、鼎、弧、矢、、簋，则器用备也；日、月、冰、霜、云、雷、风、雨、涂泥、陂、险、渊、田、谷、、园、丘、陵、陆、井水、泉石、阶衢、城隍、郊沙、泥穴，则天地备也；服饰则簪、圭、襦、裳、囊、ひ、带、履、束帛、朱纓；身体则口、耳、目、鼻、牙、颐、<九页>，而腹、发、肤、臀、拇、腓、每、辅、颊、舌、股、肱、心、眇、跛、足、趾。

○儒者生杀

儒者未尝不羨长生，而其要在省嗜欲，定形性，老氏之吐纳修炼所不计；儒者未尝不恶杀生，而其要在远庖厨，循礼制（天子不合围，诸侯不掩群，大夫不取は卵。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庶人无故不食珍。老者五十衣帛，七十食肉，与夫豺未祭不田，獭未祭不渔，草木黄落不入山林，皆节以礼）。释氏之持斋奉戒所不取。